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

William I. Thomas
Florian Znaniecki

[美国] W. I. 托马斯 [波兰] F. 兹纳涅茨基 著
张友云 译

人文与社会译丛

刘东 黄平 主编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HUMANITIES AND SOCIETY SERIES

人文与社会译丛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

[美国] W.I.托马斯 [波兰] F.兹纳涅茨基 著
张友云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部移民史经典／（美）托马斯(Thomas,W.I.),(波兰）兹纳涅茨基(Znaniecki,F.)著；张友云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3
(人文与社会译丛)
书名原文：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ISBN 7-80657-008-X

Ⅰ.身… Ⅱ.①托… ②兹… ③张… Ⅲ.移民,波兰裔-历史-美国 Ⅳ.D771 2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8125 号

登记号 图字：10-1997-26号

书　　名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
作　　者　[美国]W.I.托马斯　[波兰]F.兹纳涅茨基
选　　编　[波兰]E.扎列茨基
译　　者　张友云
责任编辑　刘金源
原文出版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6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4.75
插　　页　2
字　　数　97千
版　　次　2000年3月第1版　200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008-X/I·009
定　　价　9.2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编的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唯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

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决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逐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像，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引　言

埃利·扎列茨基

一个新的历史学派——社会史学的发展，使上一代人对美国历史的理解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鉴于以前的史学家侧重研究权力的高层现象——政治、战争、高级文化（high culture），社会史学家则试图把历史视为一个表现冲突的舞台。一些社会史学家寻求“自下而上”地书写历史，换言之，就是去理解由普通的男男女女——奴隶、农民、工人——进行的种种斗争在历史上留下的形态。另外一些社会史学家则侧重于阶级关系，如奴隶与主人之间或资本家同工人之间的关系，如何塑造了历史。无论在哪一种情形下，社会史学家们所关注的都是重修历史以突出普通的男男女女在其中的作用。

学者们进行如此尝试已非首次。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进步时代”，美国的改革者和知识分子也曾试图了解处于急剧变化中的美国工人阶级以及城市里贫穷的移民。他们的研究采取诸如新闻报道、“丑闻曝光”、政府调研、撰写小说与移民传记等表现形式。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表现形式来自一个新兴的大学学科——社会学。威廉·I.托马斯（William I. Thomas）和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Florian Znaniecki）合撰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是这一学科的奠基之作。该书于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间分五卷出版。它对美国的思想和社会政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末期。

在"进步时代"，外来移民给许多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个严重问题。首先，这一时期移居美国的移民数量巨大：在许多城市中，占人口多数的要么是移民，要么就是移民的后代。一些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人感到他们自己国家的文化、宗教和种族同一性已经受到威胁。外来移民大部分是产业工人，公众因此常把他们同工会主义和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这一群体还因多为穷人而涉嫌犯罪、社会解体、特别是家庭解体等问题。此外，因为他们依赖政治党派的帮助以谋求就业机会、住房及必要的救济，一些进步人士便认为政治腐败与外来移民有关。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是最早研究移民文化及其社会组织的著作之一。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不仅正确评价了外来移民对美国文化的潜在贡献，还试图从移民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尝试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发明了一种新的社会调查方法——生活研究法(the life study method)。这一方法的精华在于让外来移民自己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在方式上，他们要么有偿约请外来移民来参与，要么是查找他们讲述自己生活经历的文献资料，特别是信件。此外，《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开始了对欧洲移民活动的首次真正横跨大西洋的探索，对欧洲和美国移民活动的来龙去脉同时进行研究。这一探索把《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同约瑟夫·巴顿、克尔比·米勒及波兰的约翰·布科夫奇克(Bukowczyk)[1]

---

① 约瑟夫·巴顿：《农民与陌生人：美国城市中的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和斯洛伐克人，1890—1950》(Josef Barton, Peasants and Strangers: Italians, Romanians, and Slovaks in an American City, 1890—195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克尔比·米勒：《移民和离乡背井的人》(Kerby Miller, Emigrants and Exil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约翰·布科夫奇克：《我的孩子也不了解我：波兰美国人的历史》(John Bukowczyk, And My Children Did Not Know Me: A

等社会史学家的近期研究成果联系在一起。

该书的主要作者威廉·托马斯是典型的第一代美国社会学家。他出生于一八六三年,有农村(弗吉尼亚和田纳西)和宗教(基督教卫理公会)背景;他最初在德国学习文学,一八九三年来到芝加哥学习社会学,攻取第二个博士学位。芝加哥大学拥有全美最好的——实际上也是唯一的——社会学系。对托马斯来说,赫尔豪斯(HullHouse)几乎同大学一样重要,那是美国最著名的聚居点,他讲课和就餐都在那里。托马斯经验丰富,善于处世,待人友好,他穿着考究,喜爱高尔夫,在各种社会潮流中都应对自如。在政治上,他热心于为妇女争取选举权、娼妓改造和促进公民自由。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写作始自托马斯的第一本书《性与社会》取得成功之后。《性与社会》从人类学的角度阐释了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此书给同期的一位慈善家海伦·卡尔弗(Helen Culver)留下了深刻印象。卡尔弗也是已经捐赠给赫尔豪斯的那笔财产的继承人。这次他又捐赠五万美元以使托马斯"能够在欧洲和美国对一个移民群体进行研究,尽可能找出他们的家庭习俗和规范同他们对美国的适应与不适应之间存在何种关系。"[②]《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是献给卡尔弗的。

尽管善于处世,托马斯还是把自己视为一个外来移民。他在一九二八年的一份自传体陈述中这样写道:"我生在旧弗吉尼亚一个闭塞的地区,距铁路二十英里,类似十八世纪的社会环

History of the Polish American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② 托马斯引自赫伯特·布卢默:《对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评价》(Herbert Blumer, An Appraisal of Thomas and Znaniecki's "The Polish Peasant in Europe and America", New York: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1939),第103页。

境，因而，我感觉我已经历了三个不同世纪的生活，逐步向更高级的文化区域迁移。"[3]托马斯相信，从传统的乡村文化移向现代都市文化的经历，就其实质而言是带有普遍性的。不管是青年男女离开美国的农场去都市寻找工作，还是一个美籍非洲人离开南方农业区迁向哈雷姆或芝加哥，也不论是一个波兰青年来到匹茨堡的一个钢铁厂工作，还是一个意大利家庭离开家园到布法罗的罐头食品厂谋生，在所有这些情形下，人们都是将一种结合紧密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抛到身后，而去努力适应一个更为个人主义的、更具竞争性的世界。

托马斯的初步计划是对来自南方、西印度群岛及西非的移民进行比较研究。[4]然而，在一九一三年，他遇到正在华沙从事移民研究的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因从事波兰独立活动而一直被禁止教学)。兹纳涅茨基比托马斯年轻十九岁，是一位哲学家。第二年，兹纳涅茨基来到芝加哥，为托马斯担任翻译工作，并说服托马斯把波兰移民作为其唯一的研究对象。兹纳涅茨基先就这一开创性工作所应采取的方法写了一个长篇论述，他们二人由此达成了联合著书的协定。[5]

---

③ 威廉·I.托马斯：《我的生活》(My Life)，引自卡拉·卡佩蒂：《离经叛道的女孩和不满的妇女：一个社会学家讲述的故事》(Carla Cappetti. Deviant Girls and Dissatisfied Women: A Sociologist's Tale)，载于《种族》(The Invention of Ethnicity)，维尔内·索罗斯(Werner Sollors)编(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第124页。

④ 卡佩蒂，前引书，第104页。也见托马斯致罗伯特·E.帕克的信，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罗伯特·E.帕克选集》(Rober E. Park Collection)，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收集。托马斯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资料。

⑤ 参阅莫里斯·贾诺威茨：《威廉·I.托马斯论社会组织和社会人格，论文选编》中的《序言》(Morris Janowitz. Williams I. Thomas on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Social Personality. Selected Papers, Chicago Phoenix Books, 1966)，第23—27页。罗伯特·比

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研究对象是大约二百万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一〇年间移居美国的波兰人。拿破仑战争期间，波兰曾被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瓜分。《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主要同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或议会波兰相关，从这一地区移民出去的多数是年轻未婚的男性劳动力。如果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研究的是奥地利波兰或普鲁士波兰，他们可能会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因为这两个地区的特征是全家一起移民。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议会波兰的农业是由各个庄园分片负责，强制农民义务耕作，村庄的土地共同拥有。一八六四年那里发生了一次农民暴动，与美国废除奴隶制几乎是在同时。与此相呼应，俄国人也废除了强制农民义务耕作的制度，给贵族以赔偿，把公地分给农民。这些措施让农民得到了土地，也使乡村面向商业性竞争。铁路和轮船业的发展进一步把波兰农业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使脆弱的农村卷入世界经济的潮起潮落。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所研究的那一代农民是最先经历发达的货币经济的一代。伴随这种货币经济的还有人口压力以及土地的分割与集中。[6]

尔施泰特：《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论人文主义社会学》(Robert Bierstedt, Florian Znaniecki on Humanistic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9)，第1—15页；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作为一个合作主义者的威廉·托马斯》(William I. Thomas as a Collaborator)，《社会学和社会研究》(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第32期(1948)，第765—767页；威尼弗雷德·劳申布施：《罗伯特·E. 帕克：一个社会学家的传记》(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67—76页。

⑥ 参阅斯特凡·凯涅维奇：《波兰农民的解放》(Stefan Kieniewicz, The Emancipation of Polish Peasantry,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9)，第4页；J. 罗斯：《19世纪晚期的俄属波兰》(J. Rose, Russian Poland in the Later Nineteenth Century)，见《剑桥波兰史，1697—1935》(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Poland, 1697—1935)，F. 雷德韦等编(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1)。

在波兰人开始向外移民之际，议会波兰已成为沙皇俄国工业发展的中心。华沙是连接俄国和西方的国家铁路系统上的枢纽。波兰纺织工业的中心罗兹市，是世界上工业化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在不稳定和竞争把剩余人口推出农村的同时，这些城市开始需求更多的劳动力，德国与丹麦也出现了报酬较好的农业就业机会。一位历史学家把这一阶段的斯拉夫移民概括为"一个农民无产者，在乡村甚至整个世界漫游，寻求农业和工业的就业机会"⑦。《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发现绝大多数波兰移民在来到美国之前已经移居过其他欧洲城市，从而驳斥了认为前工业化社会中的农民都是唐突地直奔纽约的成见。

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问世之前，对移民的研究多数属于"社会普查"，只堆积数据而不分析其根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称此为"常识社会学"(common-sense sociology)。其基本方法就是偏于道德说教和指责穷人。例如，《匹茨堡调查》就写到："你想见识一下什么叫娱乐吗？……你只需偶然光顾一下霍罗，在那儿你会看到瓦解社会的力量多么令人不可抗拒，而进步的力量又如何被萎靡不振和自私自利的社会风气拒之门外。"⑧

---

⑦ 维克多·格林：《罢工中的斯洛伐克社区》(Victor Greene, The Slavic Community on Strike,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 1968)，第26页。也可参阅卡洛林·戈拉布：《波兰人在费城的经历》(Caroline Golab, The Polish Experience in Philadelphia)，载于《宾夕法尼亚的种族经历》(The Ethnic Experience in Pennsylvania)，约翰·博德纳编(Lewisburg, Pa.: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3)，第39—73页；以及戈拉布的《迁入地》(Immigrant Destination)(Philade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77)，第48—49页，第93—94页。

⑧ 弗罗伦斯·拉铁摩尔：《三项关于出租房子及其责任的研究》(Florence Lattimore, Three Studies in Housing and Responsibility)，载于《匹茨堡调查》，保罗·凯洛格编(New York: Survey Association, Russel Sage Foundation, 1914)，第5期，第124页；第6期，第351页。我的讨论来自大卫·马察：《变得离经叛道》(David Matza, Becoming Deviant,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69)，第17—24页。

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则试图通过调查个人与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社会问题。他们主张,关键性的观察单位不应当是政府,而是家庭、邻里及其他社区纽带。他们对波兰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是这个国家被异国占领,而且其改革运动也是在地方进行的。联系到二十世纪初期美国的具体形势,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既反对持自由放任主义的保守派也反对"进步派"(progressives),因为保守派主张所有问题都是个人的责任,而进步派则认为政府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他们认为,社会变革的关键是群体,而不是个人或那些政府中的专家。

为支持这一论点,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努力表明使波兰人凝聚在一起的首要因素是社会纽带。在波兰的传统中,人们企盼面对面交流和得到社区承认,并且被这种企盼所驱动。波兰农民只是很缓慢地才学会了用经济头脑思维,即:讨价还价、交换和从他人那里为自己谋利。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分析农民在波兰期间和移居美国之后转变为讲究经济理性的工人和市民的过程。他们强调,个人为适应与他们相关联的社会群体而改变,而群体自身亦在改变。最重要的群体是家庭,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在此处指的是扩大了的超越核心家庭的种种关系。

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里,群体是贯穿全书的重点。首先,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证明旧的社会是由社会恐惧(social intimidation)维系着的,即使这个社会已不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当人们变化时——当他们进行农业现代化,开始考虑给妇女权利、学习文化知识,或努力戒烟时——他们要靠他人的协助才能使这些变化得以实现。当他们迁移时,他们是以群体而不是以个人形式,而且他们保持同家乡的联系。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宣称,社会上出现的解体现象,如犯罪、虐妻、经济活动不讲信

义，是个体遭到孤立的缘故。他们认为美国的社会工作收效甚微的原因就在于只着眼于个体而没能借助社会群体的力量。最后，他们确信，来自波兰和其他国家的移民对美国有着特殊的贡献，即把他们的群体感带给了美国，在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看来，这是一种比民族服装或音乐更为重要的贡献。

一九一八年，《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的前二卷刚刚出版，托马斯就被联邦调查局逮捕，被指控为出于不道德目的而跨州携送妇女，触犯了缅因州法律。（托马斯引起联邦调查局注意的原因可能是他妻子的反战行为。）芝加哥大学解雇了他并停止出版该书，所以，该书的后三卷是在波士顿由一个不起眼的出版社出版的。托马斯从此再未谋得大学中的稳定位置，兹纳涅茨基则回波兰去教书，一直到一九三〇年。[9] 托马斯的被捕使这本书的价值未能马上得到认可。然而，《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连续数十年都是对美国社会科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具有最深刻影响的一本书。

受《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鼓舞的一代社会学家被称为"芝加哥学派"。他们不仅在芝加哥大学教书，还把该城的货场、劳工运动和外来移民聚居区当作社会学实验室。与把外来移民美国化的主张相反，芝加哥学派认为城市中的种族聚居区对保护外来移民具有重要作用。在咖啡馆和轮船公司做工度日的波斯单身汉，希腊人的公寓房，以家庭为单位的西西里人聚居区——这些和其他聚居区一起，构成了一幅外来移民生活的镶嵌画。一位社会学家写道：在社区中，移民们找到了"一个社交世界……，有名有份，在群体中扮演角色，……找到回

---

⑨ 关于托马斯的被捕，见兹纳涅茨基：《作为一个合作主义者的托马斯》，第765—767页；芳申布施：《罗伯特·E. 帕克》，第67—76页。

应和安全感。”[10]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们把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分析扩大至黑人和亚洲人。例如,E. 弗兰克林·弗雷泽把北部黑人遗弃家庭和离婚现象解释为是都市生活对家庭组织影响的结果以及南方农业区民间文化发展的结果。[11]

到第二次大战前,随着社会科学家们把注意力逐渐转向欧洲社会理论和定量研究,《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影响下降了。与此同时,这本书在最早写过美国移民史的史学家中间开始引起反响。在这些史学家中最为重要的是奥斯卡·汉德林。他把芝加哥学派关于种族问题的研究作为样板,写了《波士顿的移民》一书。他还以《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为样板写出了极具影响力的、集移民经历之大成的著作《离乡背井的人》一书(The Uprooted)。[12]

在《离乡背井的人》一书中,汉德林所关注的并不是移民群体之间的差异,相反,他努力去了解移民个人的典型性经历。仿效《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的先例,他展示了移民们如何运用他们的传统文化去和美国生存条件达成妥协:“参加了互助协会的人是要藉此逐渐适应美国的环境”,而不仅仅是为了固守他们的传统文化。对汉德林来说,适应美国环境的核心问题是个人自

[10] 哈维·沃伦·佐尔博:《黄金海岸和贫民窟》(Harvey Warren Zorbaugh, The Gold Coast and the Slum,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29),第128页、第134页、第140—152页。

[11] E. 弗兰克林·弗雷泽:《美国的黑人家庭》(E. Franklin Frazier, Negro Family in the United States),再版和缩写本(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66),第341页。

[12] 奥斯卡·汉德林:《1790—1880年的波士顿移民:关于文明教化的研究》(Oscar Handlin, Boston Immigration, 1790—1880: A Study in Acculturation, 1958年重印,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4),以及《离乡背井的人:形成美利坚民族的大规模移民的史诗》(The Epic Story of the Great Migration That Made the American People, Boston: Little, Brown, 1951)。

由和流动，是这些把移民变为典型的美国人。美国，汉德林写道，“是一块人们各行其是的土地。”[13]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写成的社会史，包括美国黑人史、劳工史和妇女史，都或多或少地把矛头指向汉德林的著作。对汉德林甚至对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来说，种族因素制约了外来移民向一个个人主义流行且蒸蒸日上的国家的融入。与此相反，美国最重要的早期社会史学家赫尔伯特·古特曼则认为，种族因素可以成为移民对阶级社会进行抵制或者表示不满的支撑点。[14]古特曼的解释为全新地看待美国现代史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古特曼以后的史学家们已经确立了波兰移民在美国工人阶级史上的位置，而这是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观点中所明显地缺失的。在此书的后记中，我总结了社会史学家们如今对波兰移民问题的看法和理解。

* * * * * * * *

我把选集分为如下四部分：波兰人的背景情况；农民的信件，它们记录了因移民带来的家庭生活的变化；美国的社会混乱问题，这有时伴随着移民活动而出现；种族问题的提出和美国的种族社区。本书是从上述五卷本选编而成的课堂教材。第四部分中的分标题是由我添加上的。

---

[13] 汉德林：《离乡背井的人》，第5—6页，第139—140页，第164—165页，第175页，第271—272页。关于汉德林，见马尔德温·A. 琼斯的《奥斯卡·汉德林》，载于《大师们：关于美国历史学家的若干论文》(Maldwyn A. Jones, Postmasters: Some Essays on American Historians)，马库斯·坎利夫和罗宾·温克斯编(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9)，第245—260页。

[14] 赫伯特·G. 古特曼：《工作、文化和社会》(Herbert G. Gutman,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Knopf, 1976)，第41页。

目　录

引　言 …………………………………………………… I

第一部分　波兰人的背景 ………………………………… 1

　神父的"忏悔" ………………………………………… 2

　写给社区报刊的信件…………………………………… 10

第二部分　农民的信件…………………………………… 22

　乌洛布列夫斯基家庭系列……………………………… 25

　马克威茨家庭系列……………………………………… 42

　拉克兹考斯基家庭系列………………………………… 56

　波尔考夫斯基家庭系列………………………………… 75

第三部分　美国社会的解体……………………………… 98

　迈耶的家庭……………………………………………… 98

　米切尔斯基的家庭 …………………………………… 109

第四部分　种族问题探索 ……………………………… 117

　美国波兰人社区 ……………………………………… 117

结束语 ………………………………………………… 133

第一部分　波兰人的背景

在文选第一卷中，一个波兰神父阐述了他如何利用天主教忏悔的力量影响他的教民的观念。他劝告人们尊重权威和私有财产，并就性和婚姻问题提供咨询。

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视此神父为一个没有思想的保守主义者，一心只要维护旧制度，即使这种制度已不再适应当时普遍的观念和愿望。为了与这位思维僵化的神父形成对照，他们向几家当地自办报纸的编辑寄送了一批信件，旨在倡导变革。信件的目的是要说明社区在变革过程中的重要性。这些报纸关注诸如耕作、园艺及家政方面的实际问题；它们也充当当时席卷波兰农村的民族主义觉醒运动的工具。这些信件宣传读书识字的重要性、教育的重要性、反酗酒吸烟运动的重要性和妇女组织在促进社会变革运动中的重要性。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关注的重点是个人的变化以及社区给个人所提供的支持。在波兰发生的这些运动同发生在美国进步时代的禁酒运动、学校改革运动及妇女组织运动有许多相似之处。

神父的"忏悔"

根据天主教教会的意图，忏悔不仅是为了获得宽恕而坦白罪过，也是根据天主教会所公布的基督教教旨规范信徒的日常生活的一种手段。……忏悔的内容涉及**性生活**、**家庭[及社区]生活**(夫妻关系，子女教育)，[大家庭和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经济生活**(开销问题，给佣人付工资问题，工作条件等等)，**社会生活**(在州里的生活——纳税及履行义务问题；阶级关系；同犹太人的关系，等等)，**国家生活**(波兰语言，民族感情，同民族敌人的关系)，**教会生活**(履行宗教义务)……

性生活。性的问题在忏悔中无疑是最常提到的……神父对规范夫妻之间的性关系享有巨大影响力……控制家庭人口已经成为农民越来越关注的问题。神父必须越来越经常地比回答男人们时更加小心翼翼地回答妇女们所提出的问题：在性交或者用药之后清洗阴道是否算罪？他必须教导她们，夫妻间的手淫、使用避孕丸或避孕套、清洗阴道都是不道德的，是有罪的，是违背本性的。若是问题比较严重，他必须进一步教导她们如何做才能保持良知的纯洁(只在规定的时间发生关系)。

让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在此我权且采取教会的立场)。

1. 一位妇女抱怨孩子们把她累坏了并说一位医生告诉她再生孩子会要了她的命。但是他丈夫仍不愿按她的要求停止性生活，还命令她在性交之前往阴道放避孕药。她困惑了很久，最后终于去找神父咨询……她不想死，但她既不能也不愿拒绝她的丈夫。神父此刻面临一个两难选择。如果他说那样做是有罪的，那位妇女仍将不顾一切地我行我素；如果他说那样做并没有罪，他就违背了道德法则和他自己的责任。

首先，这位神父应该对那位医生的决定提出质疑，并让这位妇女去看另一位医生……而后再询问她的丈夫是否认为他们的做法是无罪的。如果他是这样认为的，那么神父必须告诉那位妇女不要从道德的观点去同丈夫谈及这个问题，而应力图去影响他，使他能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对待他们的性生活……然后，他必须告诉那位妇女丢弃所有的顾虑，努力使自己尽可能地强健起来，并把夫妻间的性生活只安排在受孕可能性最低的时候(即两次经期之间的十至十四天这段时间，在行经前后各一周的时间内避免性交)，尽管这样做也并不是绝对的安全。[①] ……这样做的结果是正常的夫妻生活和更多的孩子。医生们经常是言过其实或者是顺着妇女的意愿来做决定。宗教的影响和对上帝的信仰通常能大大减轻妇女对分娩的恐惧……

有的时候，男人对能否在妻子怀孕时与之同房犹豫不定。尤其是农民，他们对怀孕妇女怀有强烈的性尊重。神父须告诉她的丈夫，最好是节制欲望，而且在头二个月尤要节制；但是，如果他实在无法节制，他可以，但要小心……

人们经常提出有关性生活频度问题。间隔多久为宜，性交时赤身裸体是否有罪；某些方式的亲吻和触摸算不算是罪恶，何时这样做便为有罪。惯例是，在夫妻之间，某些性虐待(不能自制)只是一种轻微的罪恶，如果……不防碍它孕育新生命的可能性的话……。

对待性偏常行为的制度……我个人在听取忏悔时的经验告诉我，在农民当中，手淫是一种很鲜见的性偏常行为，在农村尤其如此。在城市中，手淫的发生要经常得多……。目前，特别是在男青年中间，有一种很强的提倡性欲的正常满足的倾向和兽

① 注意这位神父的指导是错的：他提出的性交时间受孕的可能性最大。

欲的倾向。动物之间的交配通常刺激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子和十岁以下的女孩子去做类似的举动。这些越轨行为常发生在较贫困的农民阶层、日佣工人、仆人、牧民(以此为主)、青年和老人当中。相对而言,兽欲现象在乡村人口中颇为常见……。兽欲现象在人的青春期较为多见(百分之二至三),在性生活能力接近终止时再度较多出现(百分之一),而在人的成熟期则较少。而且,从事这类行为的几乎全部是男性,在女性当中则很罕见……。在我们的农民中鸡奸行为非常少,这种行为几乎只在小城市的青年人中以尝试的形式出现,至少我本人还未见到这种行为形成恶习。相对常见的是女孩子中间的同性恋,但也只是发生在城镇里共同居住的佣人们之间。这种现象通常伴有虚幻的激情 ……,方式也很简单。

故意堕胎…… 在城镇中比乡村中常见。就我所能进行的观察而言,出现这一差异有以下原因:严重的放荡不羁、松弛的道德观念、在城镇中抚育子女更加艰难、遮掩越轨行为比在乡村容易……。在城镇,堕胎行为更为经常地发生在已婚妇女中,在农村则多发生在姑娘们中间……。此外,在农村地区还有许多为实现堕胎而做的徒劳无益的努力,如求助于符咒和巫术等。

农村有大量非婚生子女是因为青年男女之间有更多的性自由,性关系更容易隐蔽,主仆之间有更多的亲密机会……,其他娱乐活动也比较缺乏。在非婚生子女的父母中,比例最大的是那些在庄园中、富裕农民家里、或官员宅邸中工作的日佣男工和女仆。

家庭[与社区]生活……人们忏悔的内容通常是夫妻关系问题或是给子女们树立了不良榜样的问题,但很少(或几乎从不)忏悔对子女教育的忽视。例如,一个农民忏悔他因妻子没有保持房间及孩子们的整洁、没有照看好牛就动手打她……神父就

教给他如何以友善的方式教妻子学会有条不紊。很明显，其手段要因经济条件的差异而不尽相同。有些建议非常奏效，比如建议他当妻子做到保持房间整洁、精心照料牲畜的时候给予奖励或者给买件漂亮衣服，要以身作则并且不要把所有事情都推给女人去做……。但是，最能影响孩子教育的还是告解神父(如果他愿意去做的话)。有一位神父精于此道。他懂得怎样通过迎合农民看待子女问题的经济眼光和激发他们为人父母的自豪感，唤醒农民心中掩藏的对孩子的情感。这位神父一点儿不含糊地做了以下的对照："啊哨，如果你的邻居因为你把自己饲养的牛马既收拾得很干净又不过度加以使唤而对你生羡慕之意，你不是很感自豪吗？你的儿子，也就是你自己形象的翻版，难道还抵不上一头牛吗？要是你让他吃饱喝足、尊重他、给他时间学习，待他长成强壮、聪明、勇敢的大人之后，难道不能给你带来更多的利益？更不须谈他是有灵魂的——灵魂可是上帝形象的体现。如果你对自己的畜牧场都感到负有责任，如果你想让秩序和公正支配世界，[如果你想]让你的田地、森林和牛群为你服务，你必须注意使你的子女渐渐地爱上这些土地、森林和牛群；你就不该打他们、骂他们、让他们过度劳作而由此厌倦生活和世界。"

一位农民承认常与妻子吵嘴。实际情况是这个男人喜欢去酒馆，而他的妻子不喜欢他这样，因为她爱钱。但是，他想要娱乐，"而且当一个人常与那些女人来往时，往往会传出一些不堪入耳的话来。""当他从酒馆回家时，妻子便口出恶言，他也以牙还牙，妻子丝毫不欲与他亲近，并且撵他出去洗净满口的酒味再回来。"一气之下，他便去和库玛、一个守夜人的妻子睡觉。有时一周一次，有时一周两次。完事后回到家，妻子有时会试图讨他高兴，而他却将她推开，甚至拳脚相加。

按照教会的法律，丈夫（或妻子）若与人通奸则失去向对方要求性交的权利，只有神父能使他重新获得这一权利。……神父须为他们找到一种妥协的办法，既能避免争吵，又能使他们的关系恢复正常；他必须迫使那位农民不再去酒馆（保证不去喝酒）并努力使双方都作出一点儿让步……

[神父在双方中间还扮演法官的角色。]最常见的必须由神父来决定的是那些形形色色的涉及家庭事务、并且要么太小要么过于隐私而不便上告法庭的案例——所谓"普通农民过失"，这是一个爱说俏皮话儿的农民给下的定义。在处理这些案例时，神父要做的并不仅仅是判定某事是很坏还是无伤大雅，并判处如何补偿。他通常还要进行正式的讯问，就当事双方的行为提问，对环境和情况进行调查，运用对质质询的办法研究事件的实质，最终判定谁有过错和过错的程度，以及指控自己的人（经常是他指控另一个人）应如何补救过失（道德和物质的）和建立起可以承受的、符合基督教教义的家庭关系。

这类争端的起因通常包括未经同意而使用了某物、自我主义、过头的所有权意识以及对一件物品的独占性使用；最经常的起因是搬弄是非和无意的粗俗行为。这类争吵常常很无聊地发生在女人中间，而在男人中很少见。男人间的争吵多是为了一件马具、一根绳索、一把镰刀，等等。有的时候，某一男人会偏袒某一女人，使全家处于"战争状态"。最典型的是涉及食物——面粉、谷物、腊肉、蔬菜——的争吵，这些尤其常在老年人与年轻人——父母与他们已成家的子女之间爆发……虽然我不能将此视为一条准则，但我依然能发现在许多情形下老年人是不对的，是他们挑起了"战争"。这并不奇怪。他们辛劳一生，把子女抚养成人，因此，他们乐于享用子女们的面包，而自己不去动手烤制。[做母亲的在女儿或儿媳不在场时就去拿她们的；做女儿的

发现后便进行报复。]……因此，他们之间相互抢夺。在忏悔时，神父必须听取双方枯燥重复的叙述，并进行调解使双方平息愤怒。有时，做女儿的未能将被窃物搜出，在这种情形下神父就要决定母亲是否要予以归还。这要取决于女婿或儿子的收入情况，以及老人同子女共同居住的经济安排……。

物质利益往往是争吵和友谊的起因，也是信仰和祈祷的内容。我曾见过一位妇女在忏悔时带钱作弥撒，为牛长得壮和母鸡多产鸡蛋而祈祷。后来证明，她这样做是出于对她妹妹的嫉妒……"女人对我说她利用自己的容貌……而我却宁愿尽心于我主耶稣，以求在各方面都胜过她。"后来发现，这个女人也曾试图卖弄风情，把时间花在梳洗打扮上而不是工作上……

我们的农民有一个特点，他们对于他人的行为怀有深深的不信任感，他们爱追究他人行为背后的隐秘动机并常常将他人行为归因于某些"看不见的力量"。此外，狭窄的兴趣范围一方面把他们的思想引向迷信，另一方面又导致他们对左邻右舍的事情过分关注。乡村中的流言蜚语恰恰是迷信和批判邻居及亲戚行为的混和体，农妇们无一例外都承认有过这种行为，甚至孩童们也明显有此趋向。饶舌行为引起中伤，通常被称之为"诽谤"，亦即传播关于邻居的令人生厌的消息。诽谤行为的背后不是嫉妒，就是仇恨，常常是由微小事件引发的——如谁占据教堂中的长椅；谁在联谊会或社区中占据上席；孩子们之间的争吵；拒绝两家联姻等——总之，都是由对社会地位的种种考虑而带来的仇恨。

运用神秘力量常被认为是获得成功的原因，借助于魔力或者魅力的情形都不鲜见。一个得罪了别的家庭的农民必须事先对这种后果有所准备。在大家庭中，这种情况特别常见。其动机通常是以物质收益为目的，如继承，等等。说来说去都是物质

收益……至于采用何种手段则似乎无关紧要。忏悔随时可做，但收益并非随时可获……这就是农民的生活理论，一半是犬儒门徒（无意识）的，一半是基督信徒的……充满着慷慨的冲动，同时也有冷酷的盘算……

基督教要求依照教义对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加以干涉，以保证对教义不仅要承认，而且要实行之……神父的任务一般是要让宇宙有序的概念（源于神圣的天意）在农民的头脑中扎根，并且使所有家庭活动或经济活动的运行与这一概念相适应。对待妻子、子女、父母和仆人的合适作法必须以这一伟大的宇宙和谐为基础，必须与之融为一体，与这种和谐相一致，以便一切都将有利于家庭自身（首先是对一家之长和他的妻子）和上帝的荣誉。在神父、同时也在农民的观念中，上帝的荣誉恰恰是蕴含在对这一秩序的维持和发展之中，这种秩序是向世界传播上帝意图的一种形式……这种讲授……在一个可能从未想过其社会责任的人的头脑中，传播一种关于生活中的吃、穿、消费、各种经济活动、整个私有经济体系、所有权理论等方面的重要观念。

最常见的例子是教导波兰农民懂得财产权利，懂得对国家或庄园也要持以诚实的财产观念，懂得要在经济上公正地对待仆人和他自己的子女。

于是，一位农民忏悔他曾从路上拣一些铁（铁路的铁轨或铁钉）。要知道任何一种铁和皮革都能构成对农民的不可抵御的诱惑，就是一位比较富裕的农民也会把它们拾起来，如果属国家财产……他就不会认为自己是在行窃，因为这些铁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共有财产［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国家即所有的人］。……对神父来说，教导农民把财产理论也适用于果园、草场、田地，特别是属于庄园或神父的果园、草场及田地，就像夹碎坚壳果一样困难……在忏悔室之外，农民们会这样回答："上帝

是为所有人创造这一切的"，还会说，"庄园主和神父已经很富有了，他们不会因此而受到伤害。"……在有些情况下，庄园要使自己适应周围环境。因此，例如，有一位拥有大片果园的庄园主不能制止贼到园中偷盗，甚至神父的影响力也不能阻止这种劫掠行为，那么这位庄园主就会对神父说："在忏悔时至少应向他们的头脑中灌输这样的思想，即他们在偷盗时不该折断枝条，损坏树木……。"

有的时候，一位喜欢侵袭属于庄园或社区树木的农民的忏悔是很滑稽的："我从树林中拿了一些木棒。""有多少？""大约五根。""是灌木枝还是粗木棒？"没有回答。"你用这些木棒做什么？""嗯，我修理猪圈，还为篱笆墙钉了几根桩子。"神父开始怀疑这是一桩颇为严重的盗窃案，并盘问"这些木棒"有多粗多长，[最后]问道："它们是原来就躺倒在那里的，还是被你放倒的？""嗯，我放倒的，它们的长度约有手推车的二倍。但它们是属于社区的，因此也是我的。"……属于庄园的树林也发生同样的情况，至于采蘑菇和浆果（即使是禁止采集的），他们甚至不做忏悔。万物首先属于上帝，其次属于人民，然后才属于个人的观念是如此强烈，以至鼓吹一种不同财产原则的神父的教诲收效甚微。"神父如是说是因为那适合他自己。"这些话很清楚地说明了在这个领域中神父同农民之间的关系……

神父的影响具有改良特点……在很多情形下，忏悔是一种针对酗酒、偷盗、不道德行为等社会罪恶的强有力的改良因素。[在整个波兰社会已有明显改进，特别是酗酒现象。]……当然，其他社会因素也起到一定作用，例如越来越多的反对酒馆的说教、社会组织和社会行动。但是这些因素只具备预防价值。若要清除这一根深蒂固的恶习，必须在普遍的社会活动之外加上忏悔——宗教信仰的力量——才能获得积极的结果。

忏悔的影响由于恰当的训戒和教导而得以强化。对顽固不化者也准备有驯服和转化的办法。但是，忏悔总是在危急时刻才做，而且即使是在个人单独忏悔的情形下，也未必会取得确定无疑的胜利。但不管如何，忏悔削弱了坏习惯的力量。忏悔所具有的这一不同寻常的力量根源于它作为一种寻常的心理活动及它的超越自然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这与对上帝的审判的恐惧、对恶习的不足耻感和对通过忏悔得到原谅的企盼联系在一起。告解神父的力量基于两种因素之上—— 他天赋的聪慧和影响他人的能力，以及忏悔者的信任所赋予他的魔力。行为的方式因神父个人的具体情况而不尽相同，取决于他的个人素质，也取决于习惯势力的强弱……几乎在每一个具体案例上，肯定会有差别……实际情形常常像是一场战争，醉汉参战是为杯中之物，而神父参战则是为了在肉体上和心灵上拯救他。然而，醉汉是只身作战或仅有少数几个朋友为盟，但在神父一边则是所有醉汉的家庭成员，不可思议的魔力，妻子儿女们(经常是很崇高)的祈祷和牺牲，教会的惩戒和排斥的权力，还有多数社区居民的意见……

一位不愿署名的加利西亚神父为著者所作。

写给社区报刊的信件

我正在寄出的是对我青年时期生活的简短回忆。其中并无有趣的冒险经历，但我认为，如若将其作为一个证据，证明只要一个人极为迫切又百折不回地追求某一目的，他最终将会实现全部或至少是部分愿望，对读者来说则不无意义。我是一个农夫的儿子，直到十岁时我才知道什么是字母表，或者说得确切一点儿，我只认识字母 B。父亲没有送我去上学。他总是重复这

样的话:"我们活了一辈子,不会读书写字,但我们活过来了。因此,你,我的孩子,没有知识也一样能生活。"没有什么比这更合我意了。于是,冬天里我同男孩子们一起滑雪橇,夏天则去放鹅。

一次,母亲带我去教堂。我向右侧看了看,见一个比我小的男孩正捧着一本书做祈祷。向左看,另一个同样大小的男孩也同样捧着一本书。我站在他们中间就像一个笨蛋,我回到家对父亲说我要读书,父亲却斥责我:"冬天谁去剥马铃薯,夏天谁去放鹅?"当时我哭了,因为我感到羞愧,我将长大成人,但却目不识丁。

有一次正在剥马铃薯皮,我从父亲身边溜开,去找一位能读会写的老人。我请他教我认读初级读本里的[字母],他同意了。我回家时心中盘算:"糟透了,父亲可能会痛打我一顿。"我真的挨了揍。父亲的拳头像雨点般落在我的身上,喊道:"乳臭未干的毛孩子,你难道不知道,老人们说过,谁要是学这些无聊的东西,他就会下地狱吗?"但我却是越来越频繁地偷跑出去学习。第二年的冬天,父亲不再禁止我,慢慢地,我学会了读书和写字。

当我十二岁时,我已读了一些书,但仅限于神话故事,在当时,人们在乡村最常见到的就是像《阿里巴巴》、《索伯尼高拉》(Sobotnia Gora)等等这样的书。有一次我在路边发现一本古老的历书。我仔细地看,在最后一页上读到在华沙有一份《斯威太兹那报》(Gazeta Swiateczna),人们可以订阅,每个星期天可以通过邮差收到它。我后来告诉一位邻居——他不是个年轻人,说:"你知道吗,在华沙有一份《斯威太兹那报》,每一个人,即使没有受过教育也可以读!"那个人对我说:"瞧,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孩子!竟然想要有一份报!"他对我父亲说:"你知道吗?卡姆,你儿子将会成为一名真正的老爷,他说他想订一份报呢。""嘀,

啃！”我父亲说，“可是他从哪去弄钱呢？”

过了些日子，父亲让我从放鹅转为放牛。有一次，一位放牧人告诉我在离我们村庄不远的西凯尼乌（Sichedniow），有一个名叫科尔泽克（Kurzec）的铁路值班员，他有《斯威太兹那报》。我立即将我放的牛托付给别人照看，急忙去找科尔泽克。我走进屋子时他问我：“你想要什么，我的孩子。”“我来看看《斯威太兹那报》是个什么样子，您好像订了这份报。”他把那份《斯威太兹那报》拿给我看。我开始阅读，爱不释手。好确实好，但我从哪里去弄钱订阅它呢？

我开始捆扎条帚，每把卖三个格罗希；我还编鞭子，用这种办法，我从春天直到圣约翰节一共攒下二个兹罗提。但这是不够的。我还能从哪里再凑点钱呢？撒开牛群不管去挣钱是几乎不可能的。有一回我正在森林中的居住区附近放牛。一位陌生人走过来对我说：“小伙子，你会认字吗？我想送你一本有趣的故事书。”我回答说我认识字，感谢他送书给我，同时，我还羞愧地要他给我一点钱。“你这个无赖，”陌生人说，“你要钱做什么？”我说是为订《斯威太兹那报》，但他却说：“大概是买烟抽吧？”“不！”，我喊叫说，“我已经攒了二个兹罗提，我还缺十五个格罗希，凑齐二个半兹罗提，木匠师傅已答应再给我二个半兹罗提，那就正好够订阅一个季度……我第一次忏悔时曾立誓我在满二十一周岁之前不喝威士忌，也不吸烟。”随后，那位绅士掏给我的不是十五个格罗希，而是整整个三个兹罗提，还有那本书。他说：“现在你有足够订整整一个季度《斯威太兹那报》的钱了。”我简直欣喜若狂，难以描绘。我立即请一个男孩子给编辑写信订《斯威太兹那报》，下一个星期天我的房间里已摆放了一份。村民们看到报纸后便立即说三道四起来，他们说只有老爷才能读《斯威太兹那报》，读报要花时间。但我毫不在意，径自以极大

的兴趣去阅读。

至今我已订阅《斯威太兹那报》有八年之久。我不再缺钱订报，因为过去六年来我一直是村中的林业员，靠一片十五摩肯的农田为生。我已十分习惯阅读《斯威太兹那报》，每逢星期日，我一手持餐匙，一手拿着《斯威太兹那报》。人们说阅读报纸需花费大量的时间。但在节假日不是有那么多时间既够做祈祷又够读报纸吗？……我认为，一个乡村农民比一个在学校已经受过启蒙教育的人更需要《斯威太兹那报》。我们当然能够用得上《斯威太兹那报》中的知识。的确，有一些报纸并不是人人都能读的，它们就像是用外文写成的[用的是书面语]。但我所说的是那种每一个普通人，即使并未受过教育，也能够读懂的报纸……我经常这样说："让我每天只吃一顿饭可以，但要我在有生之年停止订阅《斯威太兹那报》则不成。"

最后，我衷心地感谢乌兹尼科夫斯基(Wozniakoweski)神父，是他禁止我吸烟的。我从来没学会怎样让金钱随着烟雾消失。正因为如此，我能够订阅《斯威太兹那报》。我也要向科尔泽克衷心致谢，是他指给我接近《斯威太兹那报》之路。

《斯威太兹那报》，一八九八年第三十一期。

我妻子没有落在安东尼和简的妻子的后边……我成为《斯威太兹那报》读者的时间并不很久；一八九五年我才第一次得到它，当时，看这份报对我来说很容易，因为我妻子并不明白这份报纸是怎么回事。但是，当她看过一份以后，按她的理解，报纸带不来什么好处，她便开始吵闹了。因此，每当她吵闹时，我总得忍受一些侮辱。我要忍受奚落和诅咒："你会把脖子折断的！你要成为瞎子的，你这该死的报呆子！……你把两眼盯在[报纸上]就像乌鸦盯着一块烂骨头……"

这种吵闹和怨言不绝于耳。但我全可忍受，我从不为此咆哮，只是对她愚蠢的言辞报之一笑，当她闹个没完的时候，我常常避开，为她的不通情达理而感遗憾。但是，从一头牛身上，除去肉，你还能渴望什么呢？我并不感奇怪，因为她们的家庭中没有一个人会读书识字，因此，女儿长大也只会围着灶台转。

一年过后，又到了订报的时间，此时就连对妻子提一提此事都不可能！然而，去年一直借阅我的报纸的邻居对我说："我付今年的报钱，咱们一起看。"于是，就按他说的做了。

当我取来报纸开始阅读时，我妻子总是尽其可能大声地与旁人讲话，或者对我问这问那，以期最大限度地打搅我，我的朋友们过去常来打听《斯威太兹那报》上登了什么新闻。后来他们问我时，我就回答说："不知道。我读得太匆忙因而记不住许多，而且我必须尽快把报纸归还。但你们可以问我妻子。她可以多告诉你们一些，因为她走路很轻，专心留意每一件事，可以记得很牢。"

起初，我为此多次遭到妻子的严厉斥责。但当她不敢当着客人的面斥责我时，她感到不好意思和气愤，红着脸走开。渐渐地，在我读报时她变得安静了，并试图记住点什么以便别人问及时好做回答。因为妻子停止了斥责，我的日子好过了些。我开始给她读一些报上讲述的幽默故事和冒险经历，她多次开心地大笑不已。然后，我又给她读"圣人传记"(Lives of the Saints)，这种时候，她常被感动得流泪，哭泣得还不轻。我感到很高兴，因为她的头脑比过去清醒了，也开始爱书。

一八九七年秋，我从乡下搬到镇上。我买了一幢带花园的房子，但一切都已被原来的主人糟踏得不成样子。我必须按我自己的方式准备一切，为此我不停地参看我的文件夹，把房子里能改的地方都做了改变。然而，再次订报是必要的，以便完善我

在经营农业方面的知识。我问妻子是否同意订阅[那份报]。妻子答道:"可以,如果你想订。这样你可以在家中读报,用不着跑到镇上去浪费时间。再者,报上也登了怎样耕地种菜,这样我们在园子里和其他地方就什么都可以自己种。"她允许我订阅一八九八年全年的报,条件是我得戒烟。我同意了……

我收到《斯威太兹那报》就看所有消息,并告诉妻子怎样去做,该做什么,何时动手,而后,我们就开始工作。我们种醋栗,木莓,嫁接灌木;在园子里,我们修路,施肥,翻地,种植蔬菜。我还从神父那里得到一些花籽……听到别人把我们当做园丁时,妻子笑了,而且很高兴,因为他们赞许我们的工作,妻子把这一切都归功于《斯威太兹那报》。她开始自己学习,现在她读得不错了。就连我们五岁的女儿也开始认读初级课本,因为她妈妈强迫她这样做,为的是不要让女儿像妈妈以往那样无知。妻子也不再限制我用钱订报,不只是订阅《斯威太兹那报》,甚至可以买其他书籍,只要它们是有用的。我绝不无声地阅读!每当我读报时家中必须安静,妻子热切关注所有事情……

因此,读者们要善待他们的妻子,就像我一样;要仔细而明智地阅读《斯威太兹那报》,要现身说法地展示出读报的好处。女人要明白顺从有教养之人的规劝是何等有益……然而,如果你把报纸放在面前只顾自己去看,或阅读之后就将其抛在一边;如果你读报只为消遣,或者订报只是为在邻居面前炫耀,如果读过之后头脑中依然空白一片……那么,女人向你吵闹就毫不足怪了。

写给《斯威太兹那报》的信,已发表但具体出处无考。

我是一名乡村家庭主妇……我有三个很小的孩子需要看护。在建立幼儿园之前,我为照看这几个孩子遇到不少麻烦,无

法解决。他们总是同其他孩子一起在路上跑，对我的呼唤和威吓，毫不介意；他们干脆顽固地同我作对。有一次，他们甚至全然不理我的命令，跑到外边的街道上，过了一会儿，孩子们的哭叫声便传进我的耳鼓。原来是一个农夫撞倒了一个孩子，感谢万能的上帝，孩子没有受伤。由于总是为孩子们焦虑，我一刻也不得安宁。后来，上帝可怜我们这些不幸的母亲，遣使乐于助人的善良人提议在皮利卡(Pilica)建立一所幼儿园。幼儿园建起来了。我把两个孩子送进了幼儿园。他们在园里几乎待上一整天。他们学习手工，学习背短诗。最重要的是学习宗教，学习如何尊重父母和长者，如何懂礼貌。他们去幼儿园已有一年半，周围的人都称赞说："多么可爱又懂礼貌的孩子啊！就像小天使一样。"称赞是有道理的。他们遇到熟人时总要鞠躬，女孩还微屈右腿；男孩则脱帽致敬。

到了冬天漫长的夜晚，孩子们聚在我家(那些上幼儿园的孩子)，一些邻居也来凑趣。整个晚上我们都享受着孩子们带来的快乐。他们这个朗读，那个背诵，另一个展示她的手工作品，再下一个唱歌，等等。九点钟，他们都会离去，个个高兴愉快。这一年，在我的命名日那天，我的孩子们向我献上他们的贺词。听到女儿的朗诵是多么令人高兴啊！我多么喜欢孩子们的礼物！……

学校的老师们从上学的孩子们中挑选出几个声音美妙的教他们唱不同的宗教歌曲，我的孩子也在其中，现在，他们都在皮利卡的教区教堂的唱诗班唱歌。以往，男声部有的声音让人感觉粗劣难懂，现在，当孩子们唱起来的时候，教堂中一片怡人的气氛。三王节刚过，唱诗班就开始为我们表演了加塞卡(Jasel-ka)，也是由我们的孩子们表演的。这些小小年纪的演员，都把自己的角色扮演的很成功。听众不断地为他们鼓掌并予以夸

赞。

我们这些当母亲的感到十分惊奇，学校的老师们是怎样把这些原来既不听话、又不懂礼貌的孩子管教得如此有礼貌和顺从的呢？我们心中明白为取得这样的成绩他们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付出辛苦劳动和汗水；因此，我们在每一次祈祷时都乞求上帝为他们赐福。

写给奇亚勉卡的信，未发表。

在霍恰努威兹(Chocianowice)村还从未有过像九月五日(星期日)这样多的读者。我们的村庄的名字以“饮酒者增多”的标题上了《斯威太兹那报》。这一消息像闪电一样传遍全村。在这一个星期天，几乎每个人，老的少的，都知道了这一消息，并相互转告有人给《斯威太兹那报》写了关于霍恰努威兹村的事。诚实的人称赞写信的人，说他做得很对，另外一些人则诅咒他并扬言要对他实行报复，然而，最受感动的是那些卖酒的人。一位酒馆老板对这件事极为认真，他决定不再出售这倒霉的威士忌，而且确实也没有再卖；当有人前来买酒时，老板便对他说：“倘若我的名字被登在报纸上，我的买卖就别做了。”因此，每个来买酒的人都是空手而归，但钱袋却是满的，他们嘴里咒个不停，不是咒那个连伏特加酒也不卖给他们的酒馆老板，而是在咒那个给《斯威太兹那报》写信的人。酒馆老板这种做法的确不错，但他这样做的目的却只是为了让那些真想喝伏特加的人再次来恳求他卖些酒。

于是人们决心猜出谁是那个给《斯威太兹那报》写信的人，并决定一旦把他猜出来就绝不原谅他。嘿，经过一段麻烦之后，这个谜还真让他们给猜中了：“肯定是那个人写的，因为他订阅《斯威太兹那报》很长时间，他自己不喝伏特加，而且村里像他这

样的人仅此一个。"但他们没有把威胁付诸实施，可能是因为[酒馆老板]背叛了他自己的决定，又卖酒给他们，就像犹大一样。他为自己辩解说是为了维持生计，他的同伙们表示赞同。

现在我承认你们猜对了是谁写的信，你们说我不抽烟，也不喝伏特加，这一点不错，但我要把这些归功于《斯威太兹那报》，因为是它给我以启发。目前，只有我知道怎样去生活，怎样关爱我的波兰同胞，怎样铲除酗酒的恶习。你们还会说我在诋毁你们。但我从来没有过诋毁别人的念头，是你们自己诋毁自己。在《斯威太兹那报》上写得很清楚，半数以上的村民都是善良的，是诚实的。你们不愿加入这些善良诚实的村民的行列，难道也应归咎于我？我站出来公开反对我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酗酒……通过酗酒，你们成了祖国的敌人。因此，如果你对你的母亲，对波兰的土地，有一点点爱，你都应该同这些诚实的人们站在一道，高喊："让纵酒狂饮的恶习从我们村庄走开！"

写给《斯威太兹那报》的信，未发表。

[以下信件向我们展示了社区的支助对于个人的自我控制是多么地不可或缺，同时也展示了更为宽阔的社区是怎样取代基层群体的。]

一八八七年，我在《斯威太兹那报》上读到一篇题为"抽烟还是戒烟"的优美而又实用的文章。我专注地阅读了这篇文章，并且同意文中所言皆为实情。鉴于我本人曾烟瘾很大，每星期吸八分之三磅马霍卡(machorka)烟，这一事实迫使我对此事予以认真的考虑。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把烟戒掉"，我的理智向我大声疾呼，但是，究竟怎样才能戒除这一可恶的嗜好呢？

我努力劝说我的邻居们抛弃抽烟的习惯；我把善良明智的人们所写的有关戒烟的文章读给他们听。邻居们回答说他们戒

不掉，因为他们"对抽烟已非常习惯，在这上面花钱不算什么，因为那些不抽烟的人也没见富起来"。有的人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抽烟的人把烟戒了并把他用来买烟的钱存在一边，待他攒足九个卢布时，他买了一头猪并用他所有的粮食来喂养它，后来猪死了，那个人也处于饥饿之中。

但我还是成功地规劝了邻居中的一个最明白的人。我们把《斯威太兹那报》上的那篇文章又读了一遍，随着"一、二、三"的口令声，我们把烟斗扔到了地上。我们把贮存的烟叶抛进火炉，发誓要戒烟两个月，至少不去花钱买烟抽。我们恪守了誓言，但两个月过后，我们又开始买烟抽。然而，自那时起，我已经成了抽烟的敌人。我依然抽烟，但是仅仅是因为我经不住诱惑。我进了一家公司；同事中有人给我烟抽，我很难拒绝这种好意。但是，有好几次，我一下子就戒烟三、四个月，从春天一直戒到秋天……但是，没有一个邻居以我为榜样。冬天，他们每星期来我家闲聊两次，看着他们抽烟，我也拿起了烟斗。

去年春天，读了《斯威太兹那报》上登载的医生们关于抽烟有害的意见之后，我很受触动，并向邻居们做了解释，四月五日，我切切实实地戒了烟。在邻居们众目睽睽之下，我把烟斗扔进火炉，并说："你一直在燃烧，在摧残我的健康。现在我要征服你，你这个魔鬼。烧吧，从我的眼前消失，再不要看到你！"……有两个邻居允诺不再抽烟，但他们多少还有些犹豫……

与那些不读报的人相比，我们这些《斯威太兹那报》的读者虽然在数量上还很少，虽然分散在世界各地，相互间并不熟悉，但是我们可以勇敢地认为我们大家是真正的兄弟，因为我们已经在精神上受到陶冶，我们都受到了同一份《斯威太兹那报》的关爱。让我们以孩子般的信赖之心去倾听她的（《斯威太兹那报》的报字[Gazeta]在波兰文中是阴性词）忠告、她的剖析和她

的劝勉。认真思量一下吧，《斯威太兹那报》已经教育我们近十九年，向我们展示善与恶；我们已接近成年，已经能够自己决定前途，因此，我们弟兄之间要相互问上一问："到底是吸烟还是戒烟？"……

我根本不想写有关我自己戒烟的事，因为我并不想得到任何称赞；但我把这封信发出来是要作为一个例子，为的是激励我的读者们效仿我的做法……。如果邻居们或其他读者之间就戒烟一事能相互作出承诺就太好了。这样一种相互联系能够给大家以鼓励；若有同行者，每一个人都会更加快乐。

载于《斯威太兹那报》，一八九九年第三十八期。

亲爱的姐妹们：

我们经常在通俗报刊上读到要求我们的弟兄们参加社会工作和学习的消息。的确，这些要求是极公正的。然而，在谈到这些报道时，我们的心中多少感到有些痛楚，甚至是妒忌。为什么只召唤我们的弟兄们去工作，去学习？而我们女人就没有这种权利，我们就应该待在黑暗之中、就应该被排斥在社会生活之外？绝不！现在正是我们女人心灵觉醒的最佳时机。因此，姐妹们，为了国家的再生，让我们互相勉励，去工作，去学习……，作为女人，不能去工作和学习，甚至阻碍我们的丈夫去工作或学习，哎呀，那简直是一种耻辱。

在村庄和城镇几乎没有为孩子们设立幼儿园和学校，谁最应该对此感到羞愧？我们的消费协会和波兰人开的商店几乎都不成功，谁最应感到内疚？我们的丈夫不识字，孩子不上学，这是谁之错？我要肯定地说：只能是我们，女人。我们女人对幼儿园和学校并不关注，漠然地在消费商店门前经过，视之为可有可无，当丈夫和儿子花钱买纸张和书籍时，我们总是忿忿不乐，还

常常不送孩子们去上学，而且以微不足道的理由以及因一些别人也能做的琐事就把他们留在家中。如果儿子或女儿想去一所学校，我们总是以家中有活儿做为由，或作出家中没钱的样子去阻止他们……

我们的人民不幸、愚昧、软弱无力，生活在贫穷和屈辱之中。但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我们本可以避免这些不幸，许多人可以很容易地完全摆脱他们的痛苦与贫困。因为我们的土地大部分都很肥沃，地下蕴藏着大量财富，在这块土地上本来大有可为。然而，那些生来具有奇怪信念的人们为他们自己汲取一切利益，而我们，莱赫人的子孙、这块洒过我们父辈和祖父辈鲜血的土地的孩子们，遭受贫困，被人忽视，我们为了面包和工资而远离祖国、远离我们挚爱的波兰。我们，波兰的女人们，如果我们愿意，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去做，我们能够弥补这一切。我们不该夸口，但是，根据实际的情形，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丈夫是尊重我们的，并经常依我们的见解去做，或者为了得到安宁，干脆屈从于我们的要求，尽管并不都是如此。

在家里，或在社会事务方面，我们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如果事情搞糟了，其过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我们。但是，不幸的是，许多妇女不承认这种过错。我们通常对艳丽服装和帽子的关心胜过对社会及国家问题的关注，这很糟糕。就这样，我们在完全无意识之中对社会犯下了严重的过错。但是，这种无意识根本不能作为减轻我们过错的理由；正相反，它加大这种过错，因为这是失职的后果，是一种应该受到责备的懒惰行为的后果。总之，我敢说，也是一种嫌恶教化与进步所产生的后果。

《佐尔扎报》，一九一四年第十期。

第二部分　农民的信件

农民的信件是《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的核心部分。原书包含来自五十个家庭的信件，这些信件既表明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家庭解体，也展示了在移民过程中家庭重建的情景。仅仅是这些信件的存在便可以表明移民们使他们的家庭成员团结在一起，甚至他们在地域及文化上彼此分离之时也是一样。再者，这些信件也都是无比重要的人类文献。

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观点是，传统的波兰社区生活是被称之为"相互帮助"的家庭纽带连接在一起的，这意味着个人通过其在家庭中的地位来感受相互之间所承担的义务。他们认为，在波兰的村庄中，对经济方面的考虑不像对社会方面的考虑那么重要。市场的扩展和所谓"进取心态"(climbing mentality)的逐步形成，通过"个性的不断肯定"(growing assertion of the personality)使家庭发生变化。当这些因素造成家庭内部的冲突，例如，孩子们变得更难以控制的时候，它们同时也开创了个人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由乌洛布列夫斯基(Wroblewski)家庭写的第一批信件，说明了由于传统家庭的解体而造成的紧张状态。父亲，瓦乐利(Walery)一心只想再娶，根本不考虑整个家庭的利益。家庭的

所有成员,包括那些正在美国工作的,全都卷入了这一难题。

马克威茨(Markiewicz)家庭的信件是关于"攀登者的"。写信人的兴趣集中在两个儿子——瓦克劳(Waclaw)和马克斯(Maks)身上,他们均已移民美国。瓦克劳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和无神论者,而马克斯在经济方面雄心勃勃。依照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说法,货币经济的扩展导致了一个"新概念"的出现,"我们把其称之为生活水准:其实质蕴于一个人通过其收入来支配他自己经济活动的实力之中。"按照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看法,马克斯·马克威茨从农民变成工人的决定性时刻是他购买那只手表的时候。

拉克兹考斯基(Raczkowski)家庭信件的内容关注的是两个孩子对美国生活条件的适应。亚当(Adam)以他的新地位来维护古老的家庭团结的思想,并在他的姐妹们面前称王称霸。已经结婚的海伦娜(Helena)发觉没有那种在波兰时的由强有力的家庭和社区联系所提供的支持,她很难控制住她的子女。

最后,在波尔考夫斯基(Borkowski)一家的信件中可以看到,弗拉迪斯拉夫(Wladyslaw)已经移民,而且正准备把妻子也带往美国。我们只看到他妻子的信件,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她的余生都在期待他的召唤。他很可能已经再婚,尽管他对她担负着义务。正如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所指出的,她是软弱的,因为她是孤立的,因为他们在波兰时曾是城市居民。如果他们来自农村,社区就会迫使她的丈夫去履行他的义务,而反过来,她自己也会得到社区感情上的支持,直到她的丈夫履行了义务。

这一部分的开头是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对这些农民信件的概述,在对每一组信件的简介部分和脚注中,他们皆试图道明这些信件的意义。

这个波兰农民写了许多封长信。这是特别让人吃惊的，因为对于他来说，即便在境遇最佳的时期，写这些信，甚至阅读这些信都是极其困难的[原文如此]。这些信件的构思需要付出相当令人痛苦的努力，并要牺牲大量的时间。写信对他来说是一种带有礼仪性质的社会职责，而那些农民信件所依循的传统的、固定的格式正是它们的社会功能的一种符号。

所有的农民信件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基本类型的变体，其形式取决于其功能，而且总是基本一致，虽然是在逐步退化。我们称这种类型信件为“致意信件”(bowing letter)。

一般说来，致意信件是由一位已离开家庭一段时间的家庭成员写给家里的或由家里写给他的。它的功能是向别人表明尽管家庭成员已经分离，家庭的团结依旧存在。这样一种表达形式，只有在家庭成员开始离开他们的出生地时才显得必要；只要这个家庭的成员还在同一社区中居住，人们就会毫无疑问地一直假定这个家庭是团结的。整个家庭群体，在定期的或临时的会聚中表现出它的一致性，但是并没有哪一位成员必须比其他成员更多地表现出对家庭的情感，除非在某些不同寻常的场合，比如在他或她成婚之际。但是，离开家庭的个体会发现，同其他家庭成员相比，他自己处于一种独特的境遇之中，致意信件便是这种境遇的产物。在个人的、直接的家庭关系方面，没有什么和它是一致的。

依据功能，致意信件有其确切的文体结构。它以宗教式的致敬为开头：“感谢耶稣基督”，读信的人对此会回答以“世世代代，阿门”。这种致敬的话语既具有神秘的意味也具有道德的意味。从神秘的意义上来说，它消除了邪恶；从道德的意义上来说，它表明写信人和读信人是同一个宗教团体(religious community)的成员，而且从道德－宗教体系的角度来看，每一个团体

都是宗教性的团体。一种共同的对上帝的隶属关系，在全信中也可以用其他方式表达，但是致敬是最不可缺少的表达方式。接下来，是有关写信人的情况：在上帝的帮助下，写信者身体健康，事业正在获得成功，他祝愿看信的人和其他家庭成员也同样健康和成功。我们知道健康（与死亡的斗争）和生存构成自然和人类休戚相关的原因（只有精神上的团结才能获取力量）。最后问候，也就是向所有家庭成员"致意"；如果信件是写给离开家庭的成员的，那便是由全体家庭成员向其致意。如果家庭成员像现在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已经分散开了，那么信中应提及的全部家庭成员，至少也应包括现在居住在同一地区的所有家庭成员。

每一封信中都包含这些要素，即使在信的功能变得更为复杂的时候也是一样；换句话说，不论其形式如何，每一封信都是一封致意信件，是一种团结的表现。信中的各个不同的要素是可以按照计划进行安排的，例如，"向全体家庭成员致意"几个字可以取代长长的家庭成员名单，但是在所有家信中的主旨一直没有改变。

乌洛布列夫斯基家庭系列

乌洛布列夫斯基一家住在按人种聚居的波兰（ethnographical Poland）东北部，那是一个相对贫困的省份。这个家庭（我们没用其真实姓名）属于农民中的贵族阶层，受过相对良好的教育。至少从十五世纪以来，这个家庭就住在同一个村庄里。邻近的十二个村庄中居住的主要为同一祖先的后代，尽管他们的姓氏有部分不同。最初的社区可能大部分已被忘记。这一系列信件中的主要人物是瓦乐利·乌洛布列夫斯基（Walery Wrob-

lewski),他是大部分信件的作者。[这些信的主题关注的是]在继承权问题上,瓦乐利和他的父亲及兄弟们的关系。在这一关系中,身为长子的瓦乐利,作为父亲的对立面,在一些问题上也作为弗里克斯(Feliks)[他的弟弟]的对立面,他所代表的是古老的家庭团结的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家庭应为一个和谐的整体,父亲应该为这个整体谋求利益,而不应该谋求自私自利的个人目的——而且是正当的——根据这些原则,经济方面的问题不仅应在法律的基础上也应在道德的基础上加以解决。父亲新的婚姻使这一关系被扩大并复杂化了。继母不是孤身一人,而是另外一个家庭的成员,而且利益的对立使她无法完全融入丈夫的家庭中。相反,由于两个家庭不可能和谐共处,身为丈夫的瓦乐利的父亲,失去了同他自己家庭的一切联系,而被妻子的家庭同化了……父亲的基本特点是强烈渴望在有生之年过上一种属于他自己的生活,其一切行为都可以此为解释,尽管传统要求身为父亲者应是家庭理念(familial ideas)的负载者,而且在他因年高体弱而无法安排经济和一般家庭事务时,为了家庭的最大利益,放弃对这些事务的控制权。[1] 在与这一传统作斗争时,老乌洛布列夫斯基最终还是完全放弃了他在自己家庭中的地位,并没有作出更多其他举动。事实上,他成了一个陌生人,因而能过上一种不受妨碍的个人生活。

乌洛布列夫斯基家庭的成员

乌洛布列夫斯基　农民

克丽姆西娅　他的第三个妻子

瓦乐利　他的儿子

---

① 在这一点上,在他与弗朗西斯科·科兹罗夫斯卡之间有惊人的相似,只是有这种区别:作为一个女人的科兹罗夫斯卡,从未被要求作为其家庭理念的代表者。

约瑟夫 他的儿子

安东尼(Antos) 他的儿子(住在美国)

康斯坦蒂(Kostus) 他的儿子(住在美国)

弗里克斯 他的儿子(住在沙皇俄国)

瓦乐利·乌洛布列夫斯基从波兰写给在美国的弟弟们的信，最后一封信是约瑟夫写的。

亲爱的弟弟们：

[通常的问候和关于健康的一般状况。]十二月三十日，我收到你们十月二十九日的来信。这封信历时两月之久，很可能是在邮局中耽搁了，因为曾闹过一次罢工。先是所有火车停运了一个多星期，而后邮电服务业也罢工三个星期。“罢工”一词在我们的语言中用 bezrobocie 表示，而在俄文中用的是 zabastowka [“停止工作之意”]。现在，罢工这种事在我们这里经常发生，特别是在工厂中。工人们提出要求：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日，他们拒绝每天工作八个小时以上。现在一切都变得十分宝贵，尤其是鞋匠和裁缝……及至目前，在这个国家中也毫无秩序，整日不断的争取自由的喧闹仍在继续，因为在十月三十日，公布了有关个人神圣不可侵犯和新闻自由的最高宣言(Highiest Manifesto)。一句话，承蒙君主之赐，我们有了更多的自由，因为我们是国家的公民，而不像以前只是君主的臣民；现在，在我们的国家中人人平等。发表文章可以不受指责，因此人们可以更为直书不讳，只是所有这一切尚未得以确定。言论自由也是为最高宣言所规定的，因此各种不同的歌曲都有人唱，如“Boze cos polske…”。简而言之，感谢上帝，条件将会不坏，但依然会有许多麻烦，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没有和平，甚至还会发生可怕的事，

就像莫斯科和许多其他城市一样。[2]

一九〇六年一月二日

瓦佩

亲爱的兄弟：

……我们希望至少能在想像中和你们分享祝圣食物。遗憾的是你们很可能并没有祝圣食物，因为你们肯定离教堂很远。唉，这也在所难免。你们除了还记得我们的村庄外，大概不记得其他什么事情了。[3] 但是也许上帝能让你快乐地回来，那么我们将欢庆……

至于那笔钱，我收到之后会照你们信中所嘱进行处置；我会给父亲十个卢布，其余二百四十卢布由我保存，或者把它们放到某处直至你们回来。同时，我的孩子们感谢他们的叔叔对他们

---

② 1905—1906 年的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农民们的社会觉悟和对政治问题的兴趣。在此之前，俄属波兰人在这方面的兴趣都是人为地提高的，是由知识阶层的爱国主义鼓动而形成的。的确，农民们相对简单而又封闭的生活，加上俄罗斯国家的官僚体制，使得农民们很难理解在其自身真正的生活兴趣和一般政治问题之间有着何种联系。在一定限度之内，社区自治使多数日常生活中的问题都能得以解决，但是在社区之外，农民们对社会和政治生活便失去了影响力，因此，所有这些源于国家及经济体制——法律、兵役，税收，教育体制，官方语言，交流手段，天然和人工制品的价格——的现象对他而言，都是由一种至高无上却又不确定的力量所规范的，并且一成不变。他对它们的态度或多或少有点像对待天气一样——基本上是被动地听之任之，有时候也试图以祈求或赠礼的方式，影响它们对个人自我利益进行处理时的权力。1905—1906 年的革命向农民表明，这种被认定的秩序是可以更改的，是可以直接地并在其体制内被人类的意愿所影响的；同时也表明，许多显然抽象的问题同日常生活事实之间存在着未知的、未被预测到的联系。

③ 复活节的愿望，也就是心中想着同出门在外的亲属分享祝圣食物，明显地是在家庭成员相互分离的情况下，在这种家庭联系的团体节日所呈现出的特殊形式中，成为维系这种联系的手段。

的惦念和许诺。春天已到来了,但是尽管已经四月份了,天气依然很坏,每天都下雪。有些人已经看到过白鹳;它们在白[雪]上走来走去,一定非常苦恼。[4] ……

有关乡村的事,我已经告诉了你们我所知道的一切,尽管很简短,因为如果我写得很详尽,那么就需要许多张纸。现在,请告诉我们矿上的事情。通向矿井的地下巷道是如何修建的?里边有没有支柱?当煤被采尽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巷道是会倒塌还是依然存在?一句话,无论什么,我们都会感觉新鲜。[5] ……

瓦乐利·乌洛布列夫斯基

一九〇六年四月二日

亲爱的兄弟们:

……现在我告诉你们家里农活进展如何。先说弗里克斯(Feliks)吧,结果表明他无法同老爷子和睦共处。虽然他确实在干活——耕地、运肥等。简而言之,一切需要干的农活儿他都干,然而在老爷子的管理之下,是没法干活的。他自己要穿衣服,还要打扮孩子们,还要生活,但是老爷子连一分钱也不给他。一切都由老爷子自己把持着,甚至连能够提供的食品也不给他们。老爷子就是想用这种办法把他们一家人尽快撵走,然后他

---

④ 农民怜惜动物的一个例证。农民的故事表现出这种对动物的怜惜已发展到很高程度。

⑤ 此处,就像在其他许多相似的问题上一样,写信者的兴趣好像是纯粹客观的,就是说,它不被这一事实而决定:他询问的各种条件正是他的亲属们的各种生活条件。但是,其效果显然是构成一个新的理性生活的共同领域,并因此而保持住这一家庭的联系,不论其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将再次出卖他的[一部分土地],以供他自己和老太太之所需。这对他们两人来说足够了[这些土地足够他们吃上一辈子]。目前,他们之间争吵不休。“他们为什么要到这儿来?”然而,正是他自己要他们来的,因为他说过:“我出卖土地是因为家里没有人来耕作。”现在他却说:“随你们的便吧,你们愿去哪儿生活就去哪儿生活!”因此,弗里克斯要被迫去找一份工作,父亲将依照原来的方式继续经营农场,直到一块土地也没剩下。如果他很长寿,那么这种务农方式最终将会只剩下一个口袋和一根木棍,这也就是留给我们仅有的遗产,因为不存在与父亲和谐共处的可能性……

瓦乐利·乌洛布列大斯基
一九〇六年六月三十日

亲爱的弟弟:

……我曾经向你提过弗里克斯弟弟,提到他正在家中如何务农。现在我更详细些告诉你。就像我曾经告诉过你的那样,父亲曾把农田交由他管理,但这可能只持续了两三天。随后,父亲又重新把土地收归自己。随后开始的便是痛苦和争吵。弗里克斯抱怨他受了委屈,他失去了自己原有的工作,现在父亲又什么都不给他。他对我很有意见,因为是我写信告诉他父亲有意[将田地交由他去管理],但现在并没有给他,或者说曾经给过,又收了回去。我也因为他们的缘故开始有所抱怨,认为父亲的做法甚为不妥——朝令夕改。于是父亲又说:“如果是我错了,我愿把科普西奥维兹那(Kopciowizna)[农场的一部分]遗赠给他们。让他们耕作并帮助我,直到我临终,那时我将把这部分土地送给他们作为报酬。”我对此并没有更多的不同意见,只是说

我不能独自决定,因为我必须写信给你们,问问你们怎么说,同时等待回答。于是,我写了信,但我还没有得到回答,而他们也不等了。他们继续在家中争吵。弗里克斯抱怨他的处境悲惨,他要干足够多的活,却吃不饱饭——父亲什么也不给他们吃。弗里克索娃(Feliksowa)(弗里克斯之妻)一天数次跑到我家,每次都带来新的抱怨。后来,事情恶化到弗里克斯和父亲刀斧相见的地步。她频繁地跑到我家,先是说父亲要揍他们,继而又说他想要用饥饿把他们一家赶出家门。显而易见,对父亲的这些做法我不尽赞同。可是,我说的任何一句责备父亲的话,弗里克索娃都同样报告给父亲,[好像是]我在唆使她反对父亲,而且她却还在父亲面前说我的坏话。最后,他们所有的无赖伎俩和卑劣行径都暴露无遗……约瑟夫(Jozef)弟弟来我这儿,告诉我在他们同父亲争吵时,父亲揭露了所有的秘密,而且他自己也承认了。他说:"我亏待了其他的[子女],而立遗嘱把科普西奥维兹那的农场赠给你,难道这就是你的回报?"[6] 在此之前,一切都做得很秘密,我们一无所知,我是这样,约瑟夫也是这样。从那以后,我对一切有了另一番理解,我向弗里克斯指出了他们的一切卑劣行径,因而使他们将愤怒都转向了我。我告诉他们:"你们掠夺了我们大家的东西,因为你们是背着我们干的。"[7] 这下可把他们给激怒了。他说父亲严禁他们对别人讲。在索科利(Sokoly)交易会期间,他们以某种方式使父亲落入圈套,父亲便

---

⑥ 老爷子如此而为的目的,显然是要确保自己至少同一个儿子结成同盟,而这是用来对付其他儿子的,使他自己摆脱他的控制却不与之为敌。这说明这位老人感觉到自己的道德地位并不十分坚固,尽管从法律的角度而言他完全有权利随意支配他的农场。

⑦ 这种保密的做法特别有害,因为在经济损失上还加上了社会损失——对家庭团结的破坏。

以这样的方式把[土地]遗赠给他们。父亲去世之前,他仍拥有这一片土地;他去世之后,土地便归他们所有,这等于是父亲送给他们的礼物,农场其余的土地将被其他的孩子所均分。从那以后,他们不再在父亲处寄膳,昨天搬到了约瑟夫·皮拉特(Jozef Pilat)那里。以后发生的事情,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告诉你。我听说他们计划起诉父亲和我,以补偿他们所谓的损失。

……请来信谈谈你们对此事的看法。或许此信会被放入弗里克斯的文件夹?[可能你会同弗里克斯串通一气反对我,并把此件寄给他。]但我不相信你会那样做。

谨此,但我写的俱是实情。

瓦乐利·乌洛布列夫斯基

一九〇六年七月五日

亲爱的兄弟:

……现在我告诉你家里及同弗里克斯冲突的情况。如果你已收到我的信,便会知道这些同有关科普西奥威兹那农场的遗嘱有什么关系——他们是如何同父亲一起作出秘密安排,然后又如何同父亲争吵,他又是怎样搬到约瑟夫·皮拉特处居住的。目前,她和孩子依然住在这里,而他去了原来的地方寻找工作。他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因为我们都还在生对方的气。我曾对他说不该用诡诈伎俩处理此类事情,但他已经做了这一切,因此大家也都会知道。他以父亲禁止他向我们提起任何有关向他们遗赠[土地]的事情为由,替自己开脱。但是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在他的遗嘱中是否提到了有关磨房的事;很可能没有,那么我必须把它从那块地上搬走。父亲依然像以前一样经营农场——他雇佣别人帮助收割,并将收获的庄稼运出田地,但我不知道这

种状况还将延续多久。当老爷子去世之后,我不知道他会怎样经营农场。弗里克斯已经得到了他的那一份,如果老爷子不改变决定,他依然还会同我们一样得到均分的一份。我们该怎么办?我事先问一问你,我们准备怎么办?依我之见,他只应得到这一块地,不该再分得别的,父亲应在我们之间平分剩下的土地。你自己看吧……

瓦乐利·乌洛布列夫斯基

一九〇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弟弟:

……约瑟夫告诉我他也收到一封你的来信。不知他是否回了信,但他说现在不愿去美国,因为他在这里一切都很不错。现在,你想知道我关于下面这件事的看法:你是应留在煤矿,还是应回来,或者是去美国另找一份工作。那好,我让你自己做决定,但在我看来,现在就扔掉你的工作是危险的,还不如[我劝你]在美国先另外找一份工作,然后在春天的时候回来,或者这段时间你先暂留在原地,然后再回来。不过不用采纳我的建议。无论你做什么都会不错,因为我就怕你可能会同费洛斯一样,虽然我并不相信你会变得和那人一样的卑鄙。[8] 他现在由于自己的卑劣而不停地咒骂我。我也写信告诉他:"你如果要来,先仔细地考虑一下,以免将来后悔。"(而他[回答说]:"为了我的孩子们,我必须搬回故乡。")但结果如何呢?他剥夺了我们大家获得

---

⑧ 当提供咨询者的个人影响力很大时,他对其自己的咨询意见所引起的后果所应负的责任就特别大,因为,农民们看重咨询者的意见,同样看重咨询者的声望,而对意见的自身价值反而看得低一些。在现在这一事例中,瓦乐利咨询意见很有分量,因为他是大哥。

上地的份额，还不断地诽谤我和父亲。因为没有实践自己的诺言，老爷子是有些不对；但是他在遗嘱里遗赠给他的，甚至比他应得的还要多。而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我已听说他在给她（她妻子）的信中也污蔑了我，说什么他遭受苦难是由于我的过错。他为什么要污蔑我呢？是因为我把真情公布于众，以这种偷偷摸摸的方式行事是不公正的，每一个人都有权知道你想要干什么。

一九〇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弟弟：

……你的第二封来信我也收到了，从信中我得知你的不幸，你的手臂受伤了。

现在我首先想要告诉你的，是今年我想留在家里，除非有什么意料之外的情况发生。除去设计我的房子，我不会做其他的事情……弗里克索娃已经再次离开，去了他［弗里克斯］那里，把她的东西都卖给了约瑟夫·皮拉特。她把父亲给他们的牛也卖了，因为她住的是皮拉特的房子。她走得像只猪，因为在离开之前，她既没同我也没同父亲打一声招呼。那里［森林］正是她该去住的地方，同熊在一起，而不是同人。以前她就在有些方面像一只猿，住到那里后就完全成了一只猿。诚实的人都不会像他们那样行事。这是谁之错？他们那样肆意污蔑我和父亲！但愿上帝别因此而惩罚他们。他们要的只有财产和金钱，而对其他一切都弃之不顾。他们连去教堂和斋戒的事都毫不关心，只要他们能舒适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目前在我们的家乡依然有骚乱，有时是劫掠，有时是用炸弹和枪支杀人。

瓦乐利·乌洛布列夫斯基
一九〇六年十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弟弟：

……我收到了……你……二月四日的来信。信中你诉说了你的不幸，而且说我的信使你极不开心——也就是说我给了你致命的一击。相信我，如果我事先知道你接信时正处于那样一种境地，我在信中会什么事也不提，但谁又能预料情况会是如此呢？……如果让我说些责备的话，那就是你的来信导致我这样做的。你在信中说离开啤酒和威士忌，你连一天也无法过下去。于是，我才想到把你弄回来，我因此提出几点意见——也就是说那笔钱在这里会有用，以及会对谁[有用]。[9] 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你在汇款方面会有困难。我只知道，如果某人有钱并想汇出，而且也有人可寄，他就会去把款汇了，而且不会写信说汇款很困难，除非他并没有钱。但是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一切却极为荒谬。好了，别介意，你既已做了，就随它去吧。今天，就你现在的处境而言，我不想向你要求什么。但是你信中说你没带走任何财产，那你就错了。[10] 我也没有，很可能我们兄弟之中谁也得不到任何财产。我并没有从家中攫取任何利益。如果我想要一蒲式耳玉米，如果我想从父亲那里得到，我会像任何一位邻居那样向父亲付钱。而且，父亲的农场会出现什么情况，谁也不知道。就像我曾说过的那样，很可能我们之中谁也不会得到任何

---

[9] 瓦乐利可能是在向安东尼(Antoni)索要他欠的一些钱。

[10] 说他错了，是因为他这样说像是在暗示瓦乐利正在从家庭的共有财产中攫取好处。

东西……我们或许能够阻止这种情况发生，但是，我们应当共同对此作出考虑，因为现在正当其时……

瓦乐利·乌洛布列大斯基
一九〇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弟弟：

……关于我们的父亲，你在信中说科斯图斯（Kostus）建议他去美国，在那里，父亲可以和他在一起安度晚年。这样不行。虽然我并没有同父亲就此谈过，但我知道他不会去。他为什么要去呢？如果他不想独自一人在农场上工作，我们是可以供养他的，但是，他又怎能离开他的农场，离开他的谷仓呢？[11] 因为曾经照顾过你，科斯图斯应该得到赞扬，可是他自己的工作环境很危险，如果——上帝是不会允许的！——他发生什么事故，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在美国会是什么结果？这肯定不是明智之举。届时我们将不能给他以有效的援助，因为如果我们寄去十个卢布，你们在那里收到的只值五个，加之在这挣钱也很困难，而如果从美国向这边寄钱，你寄出的钱价值五个卢布，在这边可就价值十个了。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

瓦乐利·乌洛布列夫斯基
一九〇七年十月七日

亲爱的弟弟们：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一些新闻。咱们亲爱的父亲[带有

---

[11] 有些讽刺意味，意思是他太贪婪，太自私自利，无法离开他的财产。

讽刺意味]第三次结婚了。他娶做妻子的是克里姆西娅(Klimusia),或者应该说是弗朗西斯科娃(Franciszkowa)[弗朗西斯科(Franciszek)的寡妇]·皮拉特,这只母狗,这样叫她是因为她是来掠夺我们财产的。她的子女们并没有把她赶出家门,但她自己却要来瓜分我们的财产。当父亲付[钱]在报纸上刊登结婚启事时,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他是秘密进行的。听到父亲的结婚启事后,我们和约瑟夫一起径直去找他,试图以各种方式规劝他不要结婚。但他拒不接受,他一心只想结婚。我们也试图劝说那个女人不要同父亲成婚。正值此时,不知是什么人在万圣节那天打破了她家的窗户,她怀疑是我所为。她叫来了警察,并录了口供,一场官司在所难免了。我将写信告诉你事情会如何了结。不过她并没有证据来证明到底是谁打破了她家的窗户。[12]我也恳求过我们的神父来劝阻父亲不要同那女人结婚,但即使这样做也无济于事,因为老爷子执拗地坚持要娶她。十一月六日,星期三,婚礼举行了。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不过我看到老爷子从教堂回来,我就猜到了。第二天我们同约瑟夫一块儿去向这对新人道早安,问候他们,以便使他们从脚跟上都能体会到我们的感觉。[谚语:他们深深地感觉到。]老爷子明白他不能躲避,于是就许诺把小块儿土地给我们耕种,把河边的土地和乌兹科威兹那(Uskowizna)的留给他自己。这样,他这一次是摆脱了我们,但是"诺言只是小孩子的玩具"。我们是不会满足于许诺的,我们将尽可能地强烈地坚持要他白纸黑字地写清楚,这样做既是为我们,也是为了你们。我们不只是关心我们自己,也关心着你们,除非一切都被克里姆西娅拿去。她是一个诡诈[贪婪]的老太婆,因为她敢于在几乎是面对暴力威胁的情况下结婚。

---

[12] 当然是写信人或他的孩子们干的。

我将把今后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你们。我们想要父亲把一切都遗赠我们,每一样东西,并信守诺言,但我们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当然,我们把弗里克斯排除在外,因为他已经得到了他的那一份。我曾写信告诉你们,他和他的家人住在贾博洛诺乌(Jablonowo),跟我们也不见面。他在那儿住了四天就回去了,尽管我知道他请了两个星期的假。这也是一种卑劣之举。我们家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干什么事都背着别人,就像一伙贼似的……[13]

瓦乐利·乌洛布列夫斯基

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十日

亲爱的弟弟们:

……我没给你们写信,因为我在盼望来自父亲的消息。我们和约瑟夫不止一次地去看他,要求他划分一下农场,但他坚持不肯,拒绝为我们做任何事,而只对他的克里姆西娅言听计从。我们同神父一起去找他,而后又独自或同别人一起去过,但都于事无补。[14] 有一次他曾经用斧头威吓我们,像个疯子一样到处乱跳。他口头上答应让我们去耕种萨拉第(Szalajdy)的田地,但因没有[书面]遗嘱,约瑟夫拒绝接受。我想自己去收割我已播种的庄稼,但我不知道今后会怎样。约瑟夫劝我甚至连这些也不要做,但对我来说,这样做似乎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因为父亲

---

⑬ 这是对家庭解体的感觉的一种表达。"背着别人干"是家中没有真正团结的一个明显证据。在早期的农民家庭中,没有哪一个家庭成员能对其他成员保守任何秘密;纯粹属于个人的事物是没有的。

⑭ 同神父一起去,和这些人一起去,这些行为表明:从总体上看,父亲的行为在道义上是错的,因为他应该站在家庭而不是个人的立场上。

随后便会为自己辩护说他给过我们，但我们都不接受，他会毫不犹豫地出卖更多的土地。我们还把图鲁斯(Trusie)[继母家的人]从父亲家赶了出去，因为他们已把全家都安顿在这里了。现在他们最多只能多来几趟。要写的太多了，可能需要整张的新闻纸。因此，这封信就不多谈其他事了。可以说，我唾弃所有这一切。如果他决定浪费这一切，那他就这样做好了。如果他自己的孩子不亲近他，那就只有别人的孩子亲近他了，因为对于外来者而言一切都是免费的。

狂欢节结束时，约瑟夫·拉巴把女儿嫁给了来自林基(Lynki)的佛尔图斯(Fortus)的儿子。我们没有参加婚礼，但父亲带他的克里姆西娅去了，他喝得酩酊大醉，结果是躺在了篱笆墙的下边。次日，他邀请了大约有一半的来自戈兹吉(Gozdziki)的人，但不包括我们在内。虽然我从未忽略过父亲[在我的邀请名单中]，但他总是避开我们，就像躲避敌人。好了，我要搁笔了，因为我讨厌这一切。

瓦乐利·乌洛布列夫斯基

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弟弟们：

……你们要我、你们亲爱的哥哥，写写关于父亲的情况。我可以说，虽然我们的住处相距不远，但我对他的情况一无所知，因为他从不到我们这里来，我们也绝不到他那里去。为什么要去他那里，既然他已声明与我们断绝关系。他说他不需要我们家庭教师般的指导，他会过得非常好。确实，他过得相当好，因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说他又卖掉了一些沟谷或小块地。他供养着克里姆西娅及她的子女，他们一直都住在那儿，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到那边去。真是令人悲哀。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只有

在忘却他的时候才能感受到快乐，只有在这时我的心中才不难过。不过无论何时我想起这些，总是非常伤感。如果他是一位热爱自己的子女、而不是热爱他人子女的父亲，我们大家肯定都能过得比现在好得多。当那些陌生的顽童们（bachory，“孩子”的贬义词）像寄生虫那样悄悄地从各个角落向他爬去时，他可以接受，但却不愿意同自己的亲生子女生活在一起。我还没有到他现在的年龄[老年人依靠他们的子女生活是很自然的]，但我同子女们在一起靠他们的财产生活，我并不因此而哀叹。我把自己交给上帝保护，我活的挺好。就我现在所处的真实环境而言，他那样做是很不好的，不过这也许是上帝的旨意。[询问关于弟弟的农场在地图上的准确位置，还有在哪里生长玉米、蔬菜和树木。]我们的村庄和邻居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对你们来说一切都是陌生的。至于弗里克斯，我不知道他的确切地址，因为他根本不给我们写信……

瓦乐利·乌洛布列夫斯基

一九一〇年二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弟弟：

……感谢你的来信，它使我悲喜交集。我高兴是因为我了解了从你的角度来看的一些关于你自己的事情，我悲伤是因为你所描绘的你的真实处境。的确，我对这些情况早有所闻，但直到最后一刻，我都不能相信危险近在眼前。我如何能帮助你呢？或许我只能说如果（过这种生活）你不快乐，就去想想可能还有其他的人，他们的不幸胜过你一百倍；甚至想想那些乍看起来十分成功的人，如果我们更靠近一些去看他们，如果我们能探知他们生活的奥秘，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当中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包含

着一串苦难。如果一个人能够对他要遭受的所有痛苦一目了然，他当然会尽力自愿地缩短痛苦。

不过让我们谈谈自己，而不要总去谈论别人。先从咱们的大哥谈起。瓦乐利幸福吗？他是诸事遂愿吗？开始，我们可能会作出肯定的回答。但是，去看一看他的妻子儿女的健康状况，特别是早年的状况，就足以了解他的成功是怎么一回事了。接着再看看玛丽西娅（Marysia），她正处于人生花季的年龄，她幸福吗？当然不。关于弗里克斯的事，我知道的不多。但是，如果有人命令我成为弗里克斯，变成一只替罪羊，那么，那要给我十个美国我才会高兴。你可能会认为我是在做有关他妻子的推测——对的或不对的。现在再说说你、我以及康斯坦蒂（Konstanty）。我们了解你。至于说到我，我们只能一笑置之。独身生活对我似乎不算什么。我视婚姻为一种艰难的义务，但是不曾经历过婚姻生活的人，就无法对它有所了解。这并非因为我曾作出过错误的选择，而是因为同婚姻缠绕在一起的是一些最令人痛苦、最令人烦恼的问题。我并不是说我的境遇最坏，但远远不能算是好的，我的天空中不是阳光灿烂，而是阴云密布。让我们就谈谈一个最不重要的问题吧。每只野兽都有它自己的巢穴，连狗都有它的窝，而我们却必须徘徊在陌生的角落，为房东的变幻无常所左右，我们甚至不敢梦想能像狗一样有个窝。其他事就不必说了。现在就剩下康斯坦蒂了。我不知道他有多么成功。你在信中说他干得好极了，但我不能相信一个受到谴责、远离故乡的人真的能感受到幸福。[15]

在上一封信中你问我是否已经把你忘了，这个问题让我感

⑮ 此信含义深刻，表现出农民的悲观性。

到吃惊。依我之见，长期忘却自己的兄弟姐妹，等于是长期忘却吃饭。尤其是现在，正当我们的父亲宣布与我们脱离关系的时候，正当我们的父亲试图以各种可行之方式——正像你从兄弟们的信中得知的那样——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大家应该相互靠近，"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如果我们不能在物质上团结一致，那么，至少让我们在精神上尽可能紧密团结，这样一来，担起生活重担将会容易一些，上帝会保佑我们的。[16]

约瑟夫·乌洛布列夫斯基

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十日，星期二

马克威茨家庭系列

马克威茨(Markiewicz)家庭属农民中的贵族家庭，住在华沙省，靠近威斯图拉(Vistula)，与普洛克(Plock)省相邻，但不是像乌洛布列夫斯基家庭那样住在古老的家族起源的地方。这一带几乎没有工业，但这个家庭住所的邻近地区并没有远离文化的影响，因为坐落在河对面的普洛克镇，是一个相当大的学术活动所在地。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生活节奏比属于同一阶层的乌洛布列夫斯基家庭要快得多，这可以用来解释他们生活态度上的差异。与瓦乐利·乌洛布列夫斯基不一样的是，马克威茨一家都是"攀登者"。如果我们能牢记这个家庭的这一基本特征，那么我们能够更深刻、更透彻地理解他们的整体家庭状况，老少两代之间的差别，以及个人之间在性格和抱负方面的差异。在其

⑯ 这是农民对家庭团结内涵的一种很好表述。

他的家庭系列中，我们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形，但都没有如此普遍，如此充分地处于其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阶段，也就是说处于这种时刻：在本阶级内部上升的趋势开始转变为超越于本阶级之上的趋势。因此，马克威茨一家的情况代表了波兰社会中下阶级人民的一般情况。他们的家庭是这样的：带有家庭阶级固定的旧社会特征，和带有个人阶级流动的新社会的特征，按不同的比例混合在一起……两位兄长，约瑟夫(Jozef)和简(Jan)是典型的农民，他们的利益范围被完全包容在旧的社会群体中。他们并不想超越于他们自己的阶层之上，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子女们正在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这种旨趣。他们每个人都想让自己的家庭在社区中占据可能获得的最高位置——是他们的整个家庭，而不只是其中一个或另一个特殊的人，甚至不是他自身，个人的存在同整个家庭的存在是不能相互脱离的。约瑟夫和简所有的努力都集中在这个目标上。他们都竭力积蓄钱财，同时却对他们自己的钱和子女的钱基本不加区分；只要有机会他们就购置田地；他们竭力从每一项收入来源获益；除去传统的当众露面的场合以外，他们绝不去炫耀自己，同时也不把钱用在孩子们的衣着方面，但在操办婚礼时却肯花大钱。他们给子女大量的馈赠，只是想要他们选到佳偶。他们给孩子们以教诲，但这只是为帮助他们在社区内获取更高的地位，并要以不导致违背传统的思想观念为前提。起初，他们不能理解他们在美国的儿子们怎么会不以尽可能地攒够钱以便回家乡购置良田、迎娶富足农家女儿为自己的目标，而去追求别的。当他们开始了解到他们儿子们的兴趣范围与他们自己的兴趣范围不同时，这一发现不是导致悲剧性的起诉，就是或多或少地导致父子之间的全面疏远。

马克威茨家庭成员

约瑟夫·马克威茨

安娜　他的妻子

瓦克劳(瓦修,瓦塞克)　他们的儿子

简·马克威茨　约瑟夫的弟弟

他的妻子

马克斯(马克西米兰)　他们的儿子

第一组信件是约瑟夫和安娜写给他们在美国的儿子瓦克劳的。瓦克劳已放弃了宗教信仰,成了一个社会主义者。

亲爱的儿子:

我们收到你的来信……我们愿你身心健康,因为这是一个男人的卓越之处。第二个年即将过去,而你对宗教或教堂的事只字不提。记住父母对你的告诫吧,因为信仰是头等大事,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不要背离正确的道路。认真考虑一下吧,说不定你会累及全家的。[17]

我告诉你,现在裸麦的价格是七卢布[一蒲式耳]。谢天谢地,风磨房里还有活可做。仓房也赚了几个蒲式耳的粮食[由于出租仓房]。我们尽其所能,为你们[孩子们]积蓄越来越多的[财产]。

亲爱的儿子,仔细想一想,如果你在大洋彼岸工作只是为了谋生[不是为积蓄],那就离开那里,回到我们的身边来

---

[17] 可能的含义是:“上帝可能会因你的罪恶而惩罚全家。”因此,家庭团结一致的情感已被表达得淋漓尽致,已经到了在上帝面前承诺一种共同责任的地步。

吧。[19]如果你手头有了几百卢布，我愿拿出[加上]我的钱，在某处为你买个农场。多布尔基科夫(Dobrzykow)的小客栈正待出售，或许还有其他什么……

约瑟夫·马克威茨
一九〇八年二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儿子：

我收到你的来信。得知你身体健康我非常高兴，但另一个原因却使我们伤心，因为你不愿意回到家乡来。此时此刻，纸在我手中抖动，或者说我的手抄录时在打颤。唔，就连远飞他乡的鸟儿也要飞回家！你怎敢说出如此恶劣[卑鄙]的话来？你应该接受父母的规劝，我从未教过你去批评牧师。你知道，波拿巴特(Bonaparte)在同教会的首脑断绝来往之前曾撼动了整个欧洲，可是，后来——你知道他后来成了什么！好啦，我不提你忘记了宗教，也就是说忘记了最大的宝石，只想说说仅仅才过一年你就要[把你自己凌驾?]于我们之上。你给报纸所写的是令人不快的，很遗憾你竟是这样运用你的知识，因为知识在任何地方对人类都是有用的，但是[你的思想]在那里只对你自己有用，当你回家来时，情况就会不一样……

---

[19] 一种与仅为生存的旧的生活兴趣相对立的新的发展趋向在此被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二十年前，如果在家庭由于过于贫困而不能养活全家时，一个年轻的家庭成员自己去努力工作以养活自己，为家庭其他成员节省开支，会被视为一件好事；当时甚至没有要他为家里增加财富的想法，因为他拿不到现金……但这里就瓦克劳而言，家庭境况依农民的标准衡量已经相当不错了，而瓦克劳依然应增加财富。如果他不能通过在美国工作而做到这一点，他就应该通过在家务农而做到。如果他仅能挣钱养活自己，而不能有其他作为，他就会被认为是在虚耗年华。

目前，我们一切如旧……至于钱，我们绝对不会在你做不到时要求你寄钱给我们，因为我总是力求手头有几百卢布。只是不要忘了你自己和你今后的岁月……

约瑟夫·马克威茨

亲爱的儿子，你为什么如此气愤，为什么这么严厉地答复我们？读了你的信之后，女孩们都哭了，家中的气氛相当低落。做父母的我们，能说些什么呢？你不想回到我们身边来，但我们不认为这是真的。我相信你是爱你的父母和你的故乡的……

[你的妈妈]

一九〇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亲爱的儿子：

……至于你的几封来信，我们只在去年七月我的命名日时收到过一封。我们立即就回了信，并请你再写信来。可是，时至今日，九月七日，我们没有收到你只言片语。亲爱的儿子，你知道吗，我们没有一天不在抱怨你的粗心和你对我们所发的牢骚！既不来信，也不来明信片，至今为止，什么也没有。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只收到了这封信，你告诉我们把它交给[某家报纸的]编辑。至于我，我日日夜夜都在想你，朝朝暮暮以泪洗面。我不明白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家中的每一个人都尽力安慰我，但等待是很痛苦的。你父亲去找简·[马克威茨]，想让他问问马克斯。简一家人说马克斯在来信中写到你已去了某地，但一句关于你自己的话也没留下，但他们不让我们看那封信。

我们这里一切如旧：我们有一匹马，价值一百卢布；有一辆新马车，三头奶牛，两头小牛，四口猪，价值大约也是一百卢布，

诸如此类。今年的庄稼情况一般。弗兰努斯(Franus)[女婿]是[一艘名为威斯图拉(Vistula)的船]的船长。他们家买了六摩肯土地。我们已经给了他们一笔钱,还要再给一些,因为我们至少应给他们五百卢布。特奥西亚(Teosia)和瓦塞克(Wacek)跟我们一起住过一个星期,但他们对贷款的事只字未提,因此,这件事很可能是个谎言。我们听说他们对弗兰努斯说过些什么。他们都是一样的(没有)价值。唔,上帝同他们在一起,我看不出上帝对他们有什么庇护的。[19] 他们只有她[一个女儿],即使如此,他们还是来向我们要一百个[卢布]为她办婚礼……

你的父亲在乌洛拉维克(Wloclawek)……并去看望了埃迪克(Edek)。埃迪克说他春天遇见过你,那时你想要回国。如果你认为回来好,那就回来吧。他说你是个什么老板,挣了四百美元,是真的吗?或许这只是你的敌人们对你的诽谤,我说不好。你的祖母已开始责备我们对你教育不够,说我们给了你那么多的赞扬,但现在你却连封信都不给我们写。我们很是悲伤。其他人都写了信,但我们却得不到任何消息。当别人向我们问[起你们]时,我们是多么难过和痛苦啊。我们最终感到羞愧难当……

[马克威茨一家]

一九〇九年九月七日

第二组信件是在美国的马克斯写给他的堂兄弟瓦克劳的。

---

[19] 我们看到,通过被想像为是上帝保佑的结果,成功可以怎样假定为一种伦理价值观。教会在力图将一切美好事物都归功于上帝时,正是采用这一概念,但其内容真的较为陈旧。繁荣是一种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象征。

即使是初到美国谋生，马克斯身上也没有多少农民味道；而在那里待了七年之后，这种味道几乎荡然无存。他把农民的观念——农业，财产，社区利益，家庭团结——一个接一个地抛弃了（但是没有抛弃同家庭个别成员的联系），并且在继承父亲的攀登趋势的同时，在新的领域内，在一种典型的中产阶级的奋斗生涯中发展了它们。

亲爱的瓦克劳兄弟[实际是堂兄弟]：

命运的安排是如此的出人意料，它把我们两人都变成了在美国流浪的人。因此我感觉到了对你兄弟般的依恋，而且事实如此，这一点会从我给你的信中得到证明，地址是我从家人那里得到的。[20] 我敢说，你可能不很在意同我在美国建立固定的通信联系，不过这只是一种猜测。事实如何，时间将会证明。

因此，我要告诉你我来美国了，也就是在二月十三日到了纽约。然后我便去找在新肯星顿（New Kensington）的朋友们……我在那儿干活一直到五月二十六日。我在一家玻璃厂工作，一天八小时。活儿倒不太累，但是工作环境太热。我每周的收入是十二点五至十四美元，取决于生产了多少玻璃。

因为工厂关闭了，我离开了那里……我去了芝加哥。在那儿我遇到了熟人和我的表亲列奥纳德·卡洛里（Leonard Krol），他是我母亲的叔叔的儿子。和他在一起，我一直在那里生活至今。自从来南芝加哥后，我便同一位波兰木匠一块儿工作，每天八小时。每小时我的报酬是三十五美分。自然，在夏天，我的活儿很忙；而在冬季，活就没有了。因此我希望能去工厂……或车

---

[20] 典型的、乏味的家庭感情的复苏。这并不只是由孤独而产生的结果，因为马克斯是同另一位表亲住在一起的。

辆厂干同样的活。本月二号，我收到家中的来信，那真是妙极了，同时也得到你的地址。于是，我想知道你的情况：你在做什么，住在什么地方，同谁在一起。总之，请告诉我你的成功经历。无论你问我什么，我都将高兴地向你诉说……我给你捎去衷心的祝福，祝你健康，成功，拥抱你，吻你。

你的兄弟，
马克西米兰[马克斯·马克威茨]
一九〇六年八月七日，南芝加哥

亲爱的兄弟：

你的来信太让我满意了，因为你有着很好的工作。我想起了你去年夏天写给我的信，那时我还为你感到遗憾呢，你当时在信中描述你是怎样在一家玻璃厂为一天一点五美元而工作的。你应该牢牢抓住木匠的工作，特别是在车辆厂里的工作，因为尽管其他工作报酬高些，但不如车辆厂的工作牢靠，这是我对你诚心的劝告。此外，如果你学会如何打制车辆，你在全美各地都能找到工作。我将来也想进一家车辆厂工作，因为离我的住处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很大的车辆厂，上千名木匠在那里工作。我听说，它是全美主要的车辆厂，名叫“普尔门”(Pullman)。从那里驶向各处的都是最华丽的车辆。仔细看一部车辆，你一定会在上面看到印有“普尔门”的字样。

斯达秀(Stasio)来的时候，如果你那里没有适合他的事做，就让他到我这儿来，我会尽我所能给他以帮助。不过你也知道，一个刚从我们国家来的人想找到好工作是极为困难的，因为他不熟悉美国的习惯，也不懂语言。因此，我告诫你，初始时不要

让斯达秀太任性。我希望[劝]他也试试木匠的工作……②

马克西米兰

一九〇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弟弟：

---

② 在这封信中，工作问题占据主要位置，所有在美国的波兰人(American Poles)的信中也是这样，而它在波兰农民的生活中并没有扮演相同的角色。就他而言，工作是为他人工作，这仅是一种附加的生存手段，财富才是他主要的兴趣所在。在故乡，通过劳动而得以发达的希望是没有的。劳动只是被作为一种对其他状况下不可能生存的补充手段，而且报酬少得可怜。在这一点上，向美国的移民运动，以其多种可能性及相对众多的好与坏的机遇，在农民的心理上引发了一场深刻的革命。工作问题立刻就成了中心问题。当城市工人的兴趣加上而不是取代农民的兴趣时，其结果是农民出身的工人同世袭的城市工人之间呈现两方面的差异：(1)他对工作本身并无兴趣，工作仅仅是出于对工资的考虑；(2)他蔑视自己的劳动，并不视其为形成其过去及一辈子生活的手段，而是将其当作一种临时的状态，一种获得财富的手段，财富对他而言才是唯一可能的稳定生活的基础。一份好工作，尤其是在美国，对农民来说仅是意味着一次好机会，从中他必须尽可能地获取利益；而对于一个有工人心理的人或是有此种发展趋势的人来说，一份好工作可能是他的终极目标，也可能是获得更好工作的手段。这也造成波兰移民明显的吝啬和低标准的生活，美国工人亦为此责骂他们。有着工人心态的人，把雇佣工作或多或少视为一种永久性状态，努力在自身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生活得舒适快活，因为这种生活在他看来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拥有农民心态的人，把雇佣工作视为一种临时性机会，把生活中的实际需求降到最低限度，将所有的生活享受都推迟至工作结束的时候，因为这种生活对他而言只是暂时的而且不正常的。马克斯的信件给了我们有关这种态度变化的很好的例子。起初，马克斯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农民，懂得节俭，把钱积蓄起来，时刻不忘回归故里，或许还想在家乡购置财产。而后，他动摇了，对回故乡的问题犹豫不定。他尚未决定是否永远做工人，但他的消费方式已经是工人的，而绝不是农民的，只有工人才肯花六十美元买一块手表。然而，他依然惦记着财产，并在信中写到买房子的问题。可是，他终于作出的事是与农民的心理截然相反的：他决定把所有的钱都花在教育上，去大学读书。这证明了财产已不再成为他生活所关心的事，它的地位已被雇佣工作所取代，他在对待经济问题上的农民心态已变成典型的工人心态。

……我想你没有接到我的上一封信……你可能会认为我已把你忘了。但这你就想错了，亲爱的弟弟，我并不想忘掉任何人，尤其是你。至于你认为有某个女人使我头脑发热，你猜得大概不错。但我也知道怎样让女人们头脑发热。不过，我一贯把美国在这一方面的严厉法律牢记在心头。[22] [他的左手轻微损伤，希望能得到保险赔偿。]

马克西米兰

一九〇七年九月五日

亲爱的瓦克劳弟弟：

……我告诉你，我已从南芝加哥迁到印地安那州的哈伯尔，离我的工作地点更近了，因此我现在可以步行去工厂，不再需要每天花十五美分坐火车了。[23]

知道你想学英语，而且还有更高的[目标]，我非常高兴。因为如果你能受一些教育，你会获得一种在这个国家生存的保障。我猜你在后悔没能早几年来美国[在服兵役之前]，后悔没学英语而学习了俄语[在军队里]，今天你可以勇敢地说你在此的生

㉒ 马克斯对待爱情问题的态度已然在一定程度上中产阶级化。在农民阶级中间，爱情总是同婚姻相联，即使在作出最后选择之前会有相当的动摇不定；在中产阶级之间，爱情就是爱情，是一种运动(sport)，每宗打定的婚姻都是这种运动的结果，但婚姻未必是众所公认的目的。当然，由于非婚姻关系男女之间的性行为通常是为中产阶级所排斥的，在这种限制以及和婚姻缺少直接关系的情况下，为使这种爱情关系令人感兴趣，必须要有足够的文化素养，但在一个人不再依靠家庭的时候，这种情况通常也是可能的。

㉓ 他已经这样生活了一年多，就像所描述的一样，为的是能同一个远房表亲相处在一起。

活有了保障。[24]

我也收到了一封国内来信，是爸爸、妈妈和维克托[Wiktor]写的。当维克托还在彼得堡(Petersburg)时，我写信告诉他我要在美国结婚，因此我再不会回去。我请他把我的决定完整地[如我所写]转述给父亲和母亲，但是他没有通过信件转述，而是在他回家时亲口告诉了父母亲。这是他写信告诉我的，他能看得出：我母亲对我的决定感到很不安，听后竟开始哭泣，渴望再见我一面，而父亲却不怎么在意，维克托也注意到了父亲的态度。后来，在给我的第一封信中，母亲恳求我把这些念头从头脑中抹去，回到故乡去，而我的父亲只言未提要我回家的事，只是很高兴地告诉我，维克托很健康地从军队复员回家了。而当初维克托准备抽签以决定其是否需服兵役的时候，据说我父亲曾努力使[他能得以免服]，甚至送给某位官员二百卢布来表示这种意思。因此，如果设在考斯蒂尼(Gostynin)的委员使维克托免于服兵役，我父亲就要花费二百卢布；如果不能，那位官员还要把钱还回来。可是，委员会没能免除维克托的兵役，我父亲又把钱收了回来。因此，他现在写信告诉我[此时，维克托已因健康不佳被从军队送回家]维克托在，钱也在。[尽管]他很高兴，就如我弟弟信中所说，但在复活节时父亲甚至不愿给他买些衣服。总而言之，亲爱的弟弟，我看不出父亲对我有丝毫惦念，现在甚至还不如以前。[25] 与此同时，我也收到一封母亲的来信，是她亲

---

[24] 我们在这儿发现的立场已同农民的传统立场非常不同。“生存”问题已经置于纯粹的个人基础之上；但是这样一种观点尚未被完全接受，就如后边段落中所表示。

[25] 显然，马克斯已迫使他父亲就关于决定让他回国去继承或在其他地方重新建立一个农场的可能性表明过态度，但他父亲的这种不甚恳切的态度，可能对产生此信之前边部分所表现的个人主义情绪有些影响。

笔写的。她为我而哭泣，流着泪水请求我回家去。读着我所挚爱的母亲的信，我心中很难过，我准备在以后满足她的愿望。

关于我如何看待宗教和社会主义的问题，亲爱的弟弟，前者和后者都不是让我伤脑筋的问题。前者不是，因为我对它太了解了，我是个天主教徒，我尽自己所能履行了一个天主教徒的义务。我不够虔诚，因为我没有时间去做礼拜，每个礼拜日我必须去工作——我只告诉你　　我甚至在复活节那天还从早七点工作到下午二点……但是，无论如何，我渴望作为一个天主教徒活在世上，直到死去。

至于政治，我对任何政治问题及党派都没有什么兴趣；当我有点儿空闲时就花一美分买上一份报纸，我读报纸，时间就这样过去……[35]

马克西米兰·马克威茨
一九〇八年四月三十日
印地安那州，哈伯尔

亲爱的弟弟：

……等待六个月之久，我终于收到父亲的一封来信，还有相当喜人的消息……他们一切都很成功，我父亲想以三千三百

㉟ 与马克斯相比，瓦克劳的农民色彩更浓些，尽管他有社会主义思想。受教育对他来说并非是一种获取更高社会地位的手段。对待受教育问题，他的感受远超过农民，并不是以眼下的实用为标准，但也远未达到视其为新生活基础的地步。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他对属于较低阶级尚感满意，仅想使其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与之相反，比较而言，马克斯对教育问题和理论问题不感兴趣，但他比瓦克劳更加超越农民的思维，他能认识到教育是一种新的生活基础，将使他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完全脱离农民阶级。瓦克劳表示他渴求同马克斯做一样的事，但看来他没有实现愿望。

卢布从波利巴尼克（Plebanek）先生手中买下位于多布基科夫的一块带石头房子的农场，但他手中的钱还不够，所以他写信向我求助。我并没有拒绝帮助他，但现在看来我的做法有些欠礼貌。我要求父亲先把一千或更多些卢布的借据寄来，我许诺见借据后马上寄钱。（请告诉我你对借据及寄钱问题的一般看法。）我还补充说，我要借据是因为我生活在美国的这段时间里，已经丧失了对父亲的信任。如你想知道，我可以把这些都告诉你……

马克西米兰·马克威茨
一九〇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亲爱的弟弟：

知你处境如此艰难，我心中很难过。我完全能够想像出你的悲惨情景，我很愿意帮助你，我亲爱的弟弟，同时我也可实现我的目标：和你在这异国土地上同住一处，或毗邻而居。但眼下几乎没有可能。在我干活的工厂里，仅有极少数人有好工作——只有几位工程师和我们三个木工。至于工厂里的普通工人，上帝会可怜他们，他们的工作条件都很糟……我真的不愿如此，不只是希望我的兄弟不如此悲惨，甚至希望俄国［沙皇］尼古拉也能在我的庇护下（帮助下）逃此困境。也许你将来会有机会亲眼目睹，那时你就会同意我是对的……至于车辆厂，它们不在这里，而是在芝加哥附近，但我听说即使他们那里也没有全速开工，正如在塔夫脱（Taft）当选后各家报纸反复报道的那样。如你需要钱，写信给我，我会寄去[27] ……我这里一切均好。我身

---

[27] 他信守承诺，但没有从银行中取钱。

体健康，工作稳定，只是在这里心中烦闷，因为在此小城中我就像置身于大森林中一样孤寂……写信给我讲讲你对波兰国民联盟（Polish National Alliance）和波兰索科尔（Polish Sokols）的看法……

马克西米兰·马克威茨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十四日

亲爱的瓦克劳弟弟：

……我收到父母写来的一封令人高兴的信，除信之外，还收到父母寄来的美丽的礼物，是威考威斯基（Witkowski）的兄弟买的一条金表链，用金色和银色的丝线结成的我的姓名起首字母组成的花押字，还有六条漂亮的手帕，带有标记的。收到这些礼物我非常高兴，因此我便买了一块价值六十美元的金表。我不多写了，因为我想……下星期天去你处……

马克西米兰
一九〇九年八月十六日

亲爱的瓦克劳弟弟：

……我告诉你一个机会，你可能从中受益。我的老板今天对我说，他有很多活儿要做，或许我认识一些木工，如果有的话，我可以介绍给他。我告诉他我有个弟弟，是个木工（就是你），正在这里工作。如果这里工作稳定，我可以介绍他来。他回答说他认为会有稳定工作。因此我建议你来这里，亲爱的弟弟……我们可以在这异国土地上生活在一起……我们可以在南芝加哥见面，边喝啤酒，边谈谈这件事。

马克斯

一九〇九年十月五日

亲爱的弟弟：

……我很高兴得知，你愿把你的钱寄给我保存。我认为你把钱藏得很好。你就寄过来吧，不用担心我是否会接受。来信谈谈那里的工作能持续多久，你们在建造什么，那里生活怎样。我想那边可能很冷，在下雪……当心别感冒，别乱走动[到别的地方]。来信多写写你自己和国内的事。你对你的成功感到满意吗？我这里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

马克西米兰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艾兰城

拉克兹考斯基家庭系列

这一批信件以非常详尽而多样化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迁移对家庭生活的影响。我们看到他们每个人都经历了不同的变化过程，但是有各种因素可以解释这些差异。

一般说来，就如预期的那样，由于移民的结果是个人同家庭和社区相分离，它激发了个性的发展，削弱了初级群体的控制。我们在前面的系列中已发现了这一点。但个性化的等级和种类是众多的。

[亚当·拉克兹考斯基]很快就使自己适应了美国的生活，几

乎没遇到什么困难就成功地达到了物质丰裕的境地，如果用农民的标准衡量，他的成功几乎是灿烂辉煌的。他逐渐不再把帮助家庭视为自己的责任，但他并没有断绝和家庭的联系，而且偶尔还对其他家庭成员的请求作出回应，这部分是出于慷慨，部分是出于表明其个人重要性的渴望。

他的事例说明了各种经济条件对个性的丰富和发展的作用。经济上的成功是产生个人显要感的主要来源之一，因此这种感觉总是普遍地存在于移居美国的移民当中。在同样的影响之下，在相同条件下它也在波兰得以发展。……但是，一般而言，仅仅在波兰经济发展的影响下，个人显要感绝不会像在美国那样迅速发展，也达不到同样的程度。它受到众多社会传统的妨碍。农民在社区中的社会地位不会通过他个人在经济上的进展获得很大的提高，如果他的家庭没有同时在经济上获得进展的话。这种局限性随着传统家庭的解体而部分消失，但是要摆脱另外一个传统——旧式的阶级分层体系（the old hierachy of classes）——对于个人而言是无比困难的。这种阶级分层正日渐被建立在中产阶级原则基础上的新的社会组织所取代，但是它的力量，依旧足以通过数不清的各类琐事，使较低阶级中的个人每分每秒都感觉到自己地位低下，而在阶级分层体系居统治地位的数百年来，其原则就是这样表达出来的。

最后要说明的是，即使是在新的社会组织中，仅凭经济上的发展并不足以使个人得到对其自身重要性的充分体验，因为新的分层体系并不仅以经济上的差异为基础，而且还是，甚至更主要的是，建立于智力文化（intellectual culture）的差异之上。

现在在美国，这些障碍都不存在，至少是到不了波兰的程度。个人几乎完全同家庭团体（family group）相隔离，传统的阶级差别纵然还存在，也不再是很老式的，也不再重要得足以使较

低阶级的人们能够感觉出来。新的阶级组织(new class organization)主要建立在经济的差异上,因此,经济上的发展似乎成为对个人价值的唯一检验标准。文化标准(cultural criteria)是在特定的群体之中发展起来的,但是不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最后,作为其人格的背景,移民不但拥有美国式的生活方式,还拥有自己祖国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现实境况同以往境况及家中亲属们的情况之间的对比,使其对自身重要性的感觉是如此之强烈,甚至到了夸张的地步。

在这个系列中提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美国的波兰移民当中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海伦娜(Helena)在她的信中所抱怨的事态——无法控制其子女——是极为一般的,而且这种情况在波兰人中可能比在其他民族中更为严重。解放的外在因素(external factors of emancipation)对每个种族的儿童的影响都是相同的,我们必须准确了解使波兰人对这些因素反应不同的各种社会条件。可以肯定的是,问题在于做父母的能在何等程度上用他们的权威去对抗由环境带来的分化作用,而这要取决于那些进行控制的手段对周围环境的适应性。在波兰的农民生活中,这种适应是足够的。我们看到……父母的权威基础存在于家庭的整体组织和社区的社会舆论之中,家庭和社区具有足够的阻止孩子反抗的制裁能力,同时也使父母对任何形式的虐待负责。在孩子们的眼睛里,父母的权威似乎不只是可畏和强有力的,而且是正当的并凌驾于个人任意行为之上的。

如果现在我们把家乡的境况和移民们在美国所处的境况进行对照,可以看出,如果做父母的不能找到新的手段以替代旧的手段,那么无法控制子女就是难以避免的了。首先,这是因为在美国,持有传统观念的家庭已不复存在;夫妇两人同子女几乎是完全分开的,父母权威的背景已不复存在。(在一些案例中,许

多家庭成员是居住在同一处的，这种情况下控制强一些。)其次，如果有什么与原属国家的社区等同的地方的话，那也就是教区，但现在的教区远没有原来那么邻近和集中，几乎不可能有同样的影响力。教区的结构是新的、临时的和不断变化的。此外，它由不同成份构成，每种成份都分别以不同的形式受到新环境的影响，接着共同的传统便所剩无几了。再者，同父母一代相比，在新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更可能表现出彼此间的团结，而不是和父母的团结，而家庭中更为年轻的成员相对更多地表现出和父母的团结。最后，经济上的自立比在原来的国家要来得早，这就从物质的角度使得对家庭的反叛变得更容易了。另一方面，父母的权威也不再受到控制，国家对相对罕见影响广泛的虐待案件要实行干预的情况除外。传统上父母行使权威的界限已经消失，父母没有了教育子女的标准，因为旧的社会标准已不再适用，而新的标准尚未确立。其结果自然是使个人的任性与无常自由泛滥，过度的溺爱与无端的苛求交织在一起。因此，在子女们的心目中，父母权威已不再带有道德特征。

一个移民只有在能够用个人权威替代社会权威，而且他的影响不是建立在他作为群体代表的位置之上，而是建立在其个人优势的基础上时，他才能够控制其子女。但是这当然要求个人具有更高水平的文化、智力和道德，这是多数移民力所不及的。相反的案例更为常见，在这种案例中子女具有真实的或臆想中的优势，因为他们比父母受过更高的教育，更熟悉美国的生活方式，等等。

由乡村移向波兰城镇的移民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然而，对家庭生活的社会控制的衰弱既不如此迅速，也不如此彻底，年轻一代的变化并不那么急速，所以移民们享有充分的时间和机会，能用足够的个人权威去替代社会权威中已消失的部分。

拉克兹考斯基家庭的成员

拉克兹考斯基　退休的农场主
瓦兹科娃　他的第二个妻子
弗朗西斯泽克　他的儿子
亚当　他的儿子
海伦娜　他的女儿
蒂奥菲拉　他的女儿

亲爱的妹妹：

……感谢上帝，感谢圣母，我已经同哥哥住在一起。至于工作，我不奢望在秋季之前能找到，因为哥哥自圣诞节起就一直失业，找不到工作，因为所有的工厂都停工了，在秋季总统选举之前不会有工可做。到那时，我们或许会有工作。目前，哥哥的生活也不快乐，因为他们一家五口，加上我一共六口，这些都意味着要花钱。如你所知，在我离开你那里时，既无外衣，也无衬衫；我来到这里，嫂嫂和哥哥立刻把他们的衣服送给我，我们三人又一同去城里买衣服，这一件为工作时穿，另一件为节假日穿，几乎一切都同衣服相关。因此，你能看到，我们购买这一切花了他们约八十个卢布。为去教堂而买的表和套服就花掉了六十卢布。[23] 没有什么可写的了，谨向你们、亲爱的妹妹和妹夫说声再见。我有了工作后，绝不会忘掉你们的。上帝与你们同在。拉克兹考斯基夫妇及他们的孩子也向你们致意。望能尽快回信。

---

[23] 弗朗西斯泽克和海伦娜·布利斯卡两人分担了把亚当带到美国来所花的费用。海伦娜付了船票钱，弗朗西斯泽克资助亚当直至他找到工作。这依然是家庭的团结。

亚当·拉克兹考斯基
一九〇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特拉华州威尔明顿

亲爱的妹妹：

……已收到你的来信，衷心感谢你能给我回信。妹妹，关于你信中表达要我代你向布利斯卡(Brylska)[即海伦娜]致意的愿望，请放心，我已给她写去三封信，她也回过一封，并将她的结婚照寄给了我们。我刚来到美国时，就礼貌地向她致意。然而哥哥和嫂嫂却向我讲述她是怎样惦记[忘记]她的孩子们的，以及她来到美国后的行为及处事方式。她自己却向我们抱怨嫂嫂对她不好！如果换成我，就她的所作所为，我不会容忍她[在家中]待过二十四小时。事实上，哥嫂还是耐心地接待她，哥哥还努力为她找工作。关于她给瓦兹科娃(Wawrzonkowa)[她们的继母]写信并寄钱给她，真是绝了，我真该向她[布利斯卡]更深地致意[我将为此而更加蔑视她]，因为如果瓦兹科娃躺在篱笆下而我正好经过，我会——踢她一脚，绝不会向她伸出手去[帮助她]。[29] [像往常一样的问候]

亚当·拉克兹考斯基

---

[29] 亚当对待曾经帮助他来到美国、对他本人没有什么错待之处的妹妹的态度看起来像是忘恩负义。如果就他们个人之间的关系而言，亚当这样做显然就是忘恩负义。然而，亚当显然并没有站在个人的立场，而是站在家庭的立场上。他并不是从他个人的角度谴责布利斯卡对她自己的孩子、对弗朗西斯泽克和他的妻子缺少家庭亲情，从这一立场出发，给亚当寄船票这样团结性的举动，并不能抵消那些被认为是违犯家庭精神的行为。当亚当责备海伦娜对她的继母——瓦兹科娃——所表现出的团结精神时，这种家庭立场尤为明显，后者在他的眼里不仅不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简直就是一个对家庭怀有敌意的分子。

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妹妹：

……我告诉你，我有了很好的工作。我已经工作了三个月。工作既可心又容易。每周可挣八美元。哥哥也有了工作。至于布列斯卡，我不知她的近况如何，我也根本不去想她。告诉我家乡近况如何，有谁来了美国，谁结了婚，在那里关于革命和战争有些什么说法。我想知道这些是因为我订了一份报纸（订一年），每周可收到两份，[30] 报纸上写的是在我们国家中是一片苦难。报纸上说在华沙和彼得堡正发生可怕的革命，许多人已经丧生。至于钱，我现在帮不了你的忙，我的妹妹。你应该谅解我，因为我有五个月之久没有工作……

亚当·拉克兹考斯基

一九〇五年二月十三日

亲爱的妹妹：

……关于工作，我还在原来的工厂里上班。哥哥也在这里，在他以前曾工作过的地方。至于家乡，哥哥说他不准备回去，因为那里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在那里他没有财产，在美国反而会更好些，因为在家时他甚至挣不到买一只面包的钱。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会回去。如果有一天我能回去，或许会住上一段时间；如果回不去，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在美国所过的日子比在家里强上十倍。现在，我做的比哥哥好，因为我独自一人。

---

[30] 这里所提及的琐事是接触面增多的显著表现，其结果是使个人的人格带有越来越强烈的感情色彩，在他以后的信件中我们也会看到这一点。

至于波尔科威安卡(Borkowianka),[31] 我不知道她是否已来了美国,因为我既没给她寄船票,也没寄过钱。好妹妹,我求求你,帮我去向波尔科夫斯卡询问一下,看她是否想来美国,因为她如不来,我便准备在秋天或在狂欢节期间结婚。[32]

一九〇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亲爱的妹妹:

……至于工作,我还在做,但做得不多,因为我和哥哥所在的工厂星期六(一月十九日)晚上七点失火了,哥哥的木工工具都被烧毁。他损失了五十美元。现在我要谈谈老小姐波尔科威安卡,没有一个想要她。我对她的一切不屑一顾——这个老处女!我写信给她纯属于开玩笑,因为在美国我周围有的是姑娘,都比她强得多,即使是对她们,我也不说恭维话。在我看来,她充其量就像一只破鞋。今天,除了上帝的恩惠,我谁的都不需要。愿上帝继续给我像现在一样的健康体魄。除了上帝的恩惠,我谁的都不想要。至于特奥菲尔[Teofil],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给自己娶这样一个牧羊女。在美国她不会有容身之地,因为在美国人们不牧羊。难道他想牧羊,想养公羊,想做一个牧羊人?这个蠢货,他的理智跑哪去了,在美国年轻姑娘有的是。[33]

---

[31] 一位女朋友。

[32] 这里不存在爱情问题,可能是受到他妹妹的影响,他在思念波尔科威安卡。总之,他只是想结婚。

[33] 这种谩骂性的话语显然是由怨恨所导致的结果,特别是当那个姑娘似乎已对特奥菲尔表示了偏爱之后。(波尔科夫斯卡是波尔科威安卡的另一个名字,前边曾提到她。)但是,这主要表示出这个男性已经达到的自我满足程度。建立在经济成

至于钱，我现在无法寄给你什么，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许多花费，但是在过节的时候我会多寄些卢布给你，你可以等着……

一九〇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妹妹：

……关于工作，哥哥的工作一直很稳定，而自从工厂失火后，我工作一个月，失业一个月。我在同一个工厂中稳定地工作了两年，那时我有钱，但现在，我挣的钱几乎不够生活所需。我和哥哥正在同一家工厂做工。我干木工活，一天挣两美元。工作很不错，工资也不低，但只有当你工作稳定时，你才能享有这一切。愿上帝让我今年整个夏天都能在厂里工作，至少挣够生活费。那么在冬天，我就会有稳定的工作。

收到的你的这封来信，我和哥哥都极为悲伤。亲爱的妹妹和妹夫，你们写信给我们是向我们求助。的确，你们横遭厄运，上帝把苦难降临于你们头上，使你们常常连一口面包都吃不上，但是我们的日子也很艰难。在我们满头汗水地挣到一分钱的时候，你瞧，已经有一项开支正等在那里。我无需把一切都向你阐释，因为你们自己也明白什么叫花费。但是值此厄运之际，我们不能拒绝给你帮助，不能一点儿也不寄给你们，但我们眼下没钱可寄。我们将于一月十五日给你寄去，不可能再提前了。再给你写信的时候，才能告诉你能寄多少……

给我说说咱们家乡庄稼的情况如何，什么长得好，年轻人中谁

功基础上的自傲和自得的感觉，在此与一种独立感混和在一起，这种感觉可能源自对社会传统桎梏逐渐的摆脱，这些社会传统包括家庭、对待婚姻的传统态度、社区权力，可能还有他在服兵役时所感受到的国家权力。

结了婚，我的伙伴们从军队回来没有。向你致意并请尽速回信。[34]

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

亲爱的妹妹：

……我要对你说说我自己，我在美国止怎样生活。我在美国尚未经历过贫困；相反，我还能给哥哥以支持。然而我对没有婚姻的漂泊生活已感疲惫。虽然我能够为我的妻子提供足够的生活费用，但我依然担心贫困会找上门来。若不是为哥哥凑钱买下了房子，我整个冬天什么都不用干，完全可以和妻子生活得像位老爷。但是，现在我把这种生活大大推迟了……

亚当·拉克兹考斯基

愿上帝会让我们活到复活节，复活节之后，我将写信告诉你我会娶哪一位姑娘，我一离开圣坛便会寄一张照片给你。我的女友是我嫂嫂的亲戚，她母亲和我嫂嫂是同胞姐妹。她们都劝我同她结婚，但我还没拿定主意是否会这样做。

亚当·拉科斯基[原文如此]

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亲爱的妹妹：

……我不知道特奥菲尔现在何处，他在圣诞节前曾同我在

---

[34] 这封信的整体口吻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自傲感的减少，可能可以这样解释：(1)糟糕的经济状况和(2)旧的记忆一定程度上的复苏，它们表现为写信者对"故国"的人和状况感兴趣，这些回忆又使他恢复了以前的态度。

一起，当时他正失业，他那时想去煤矿工作。因此，我不知他是否真的去了，因为煤矿的情形是这样的：这个人去了，挣到了钱，而那一个，死了。他愿去煤矿工作，很可能是去了，因为他再没写信给我。至于工作，我已有四个星期没上工了。这里没有活儿做。哥哥依然在工作，但情形也不太好，因为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关闭了。美国现在的状况"真是太美妙了"，以至人们都准备去讨饭了。至于咱们的妹妹，她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因为她不给我写信，我也没给她写过信。

你劝我同科谢兹科芙娜[Ksiezakowna]结婚。除去她之外，我（在此处）还有其他更漂亮的女友，但我对她们都不太倾心。[③]关于依姆尼尔斯赞卡［Imnielsczanka］［依姆尼尔斯基（Imnielski）的女儿］，把她送到我这来，我要娶她，我会把船票钱给你寄回去。目前不是结婚的好时期，因为工作情况不好，艰难的日子就要来临。

亚当·拉克兹考斯基

一九〇八年三月二日

亲爱的妹妹：

……我在圣诞节这一天收到你的来信，但我没能立即给你回信，因为我准备结婚了。因此，我同这封信一起等待婚期的到

---

③ 这是在社会背景已全然改变的情况下，表面依然持有同以往一样态度的一个奇怪的例子。只要这个男子还是家庭中的成员，家庭的尊严就要求他不能表现出对订婚极为渴望——而要或真或假地表现出一种踌躇，要在众多的姑娘中慢慢地进行选择。当一个人独居时，我们认为他会更容易、也更快地作出决策，并且会具有更多的个人倾向性。一般说来，情况确是如此。但是，在此处，个人自傲的感觉取代了家庭尊严所提出的要求，陈旧的行为方式得以继续，而其心理因素却是崭新的。

来，等得太久了。请原谅，亲爱的妹妹、妹夫，别生我的气。现在我终于可以告诉你们，我结婚了。我的婚礼于一月二十四日举行。我的妻子来自普洛克（Plock）行政管区，来自谢尔普兹（Sierpc），在姆拉瓦（Mlawa）那边。我现在寄给你们这封信和结婚照。照片中是我和我妻子。复活节过后，哥哥也要把他和他们全家的合影寄给你们。他现在还不能寄，因为他妻子目前还不能去照像馆。下一封信中，我会把我们的婚礼情况讲述给你。现在我只能提及这些，这次婚礼花了我一百八十美元。单结婚礼服就花去了三十美元，耳环及其他物品的花销我就不提了。我娶她时她是[两手空空]。我还给了她八十五美元的船票钱。下一封信中我会把美国正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你，总之是告诉你所有的事情。我没有什么可说了，谨此向你问候。我拥抱你，并无数次地吻你，我妻子也向你和妹夫致意并亲吻你们。她是对你们怀有敬意的佐莫亚·拉克兹考斯卡。

我请你在接到照片后尽快回信。

亚当·拉克兹考斯基

一九一〇年二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妹妹：

你写信给我们，要我们给你的儿子寄去一张船票。我们劝你让他等到春天，因为现在还不敢确定春天的工作情况会是怎样，他们已经选出了一位民主党的总统，而民主党人当总统时，大家都认为苦难即将来临。让他等到三月份，届时新总统将开始执政，我们也将能看到在他执政的情况下，一切都将如何运作，是好，还是坏。目前工作情况很糟。哥哥在这个厂里已经干了九年，今年自春天起，他就一直闲着，因为工厂停工了。我们

既不是劝告你，也不是在阻止你。小妹想给你儿子寄张船票。[36]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妹妹：

我如今仍在以往一直工作的地方工作，住地离工厂更近了，因此我的地址将会改变。我已寄给你二十卢布，我不知道你是否已收到这笔钱。我不知这会意味着什么。我已给哥哥[亚当]寄去了一张船票，我也不知他收到没有，因为也没有回音。他是否已经启程？你不给我回信是怎么回事？自从圣诞节以来，我没有得到你的只言片语。到底怎么啦？你生我的气了吗？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也许你生气了，或者是不愿意给我写信，或是地址不清楚？我求求你，亲爱的妹妹，给我讲讲我的孩子，我非常想念他们，我比初到美国时更渴望见到他们，因为这里有我们的国家里正处于战争中的传闻。[37] 我们是从报纸上得知的，报纸每天送到，我们什么事都知道。给我写封回信吧，亲爱的妹妹、妹夫，谈谈你们的健康和成功，把一切都告诉我，无论是好是坏，因为现在哥哥离我很远，他去了他岳母家。单程船票是七美

---

[36] 女人的个人情感，绝不像男人那样完全从属于社会团结(social solidarity)的各种形式；而在家庭解体的情况下，女人的个人情感不像男人的群体团结(group solidarity)消失得那么快。

[37] 想见孩子的心情越来越强烈的原因可能同所说的原因不一样。我们看得出这种心情是在不断增强的，直到孩子们的到来，这同任何战争问题或其他令人焦虑的问题都没有关系。初到美国时，一种相对新奇的现实状况，使她从中找到了自我，也看到要让自己适应新环境的必要性，她的心中再也没有地方容纳对子女的惦念和情感。周围的一切越是稳定，生活就越正常，留给追忆过去和梦幻未来的思维空间也就越广阔。从许多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基本上是注重实际的农民来说，回忆过去对唤起一种纯粹的情感的必不可缺性，及这种回忆需要在何等程度上同现实生活的烦扰相隔绝。

元，如果[二哥]已动身来美，我也不会去见他，因为他拿了一张为他们买的船票。[38] 也许半年后我会去看望他们……

海伦娜·布利斯卡
一九〇四年四月八日
康涅狄格州，尤尼恩城

亲爱的妹妹：

你要我给你寄钱。我的回答是，现在不能寄给你，因为工厂即将倒闭，也就是说工人们都要失去工作。因此我担心如果把钱寄回家而工厂又倒闭了，我就会既失业手中又没有钱。我要先看看情形再说，如果情况好转，我可能会寄些给你。我还在原来的厂里工作。亲爱的妹夫，我向你致敬，但不要给我寄照片了。我很了解你，你为什么要为此费钱呢？还不如给你自己买些东西吧。你信中说很少接到我的信，但我是经常给你写信的。现在，亲爱的妹妹、妹夫，我请求你们把我的孩子们送去上学，让他们把眼睛擦擦干净[39] ……

海伦娜·布利斯卡
[无日期]

---

[38] 这种渴望不仅是对孩子们的渴望，一般说来也是对家庭和祖国的渴望。她开始感到孤独。

[39] 因为曾经沉睡，所以清醒之后看得更加清楚。这是一个女农民对待学习态度的一种很生动的表达，这在当时是很有眼光的。受教育是好事，因为它能使[孩子们]普遍变聪明，而并非是为了任何实用性目的而去培养[他们]。这可能是这一事实的后果，即女人的眼光普遍是偏于主观、疏于客观的，受人格的影响多于受工作的影响。同时，男农民所持的态度往往一致，这种态度的确也就是我们自己以往对待“学术文化”(academic culture)、“完美无暇的男人”和女孩子的“精修学校”的态度。

亲爱的妹妹：

……在信中，亲爱的妹妹，你说乔杰克(Joziek)生了眼病。你如果不把他送来，亲爱的妹妹，我会感到非常痛苦。如果他们全都不来的话，[他们的]继父也会极为愤怒和忧虑。他说："我一次次的努力，就是希望他们到这来和我们在一起。虽然我不是他们的亲生父亲，但我却会待他们如我的亲生[子女]一样，这样上帝也不会惩罚我。如果我不为他们做任何事情，[上帝就会惩罚我]。"因此，我恳求你，亲爱的妹妹，让他来吧，因为我已经听到并还将不断地听到丈夫这样说："你为什么不把他们都带在身边？将来，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说自己因为有了继父才成了孤儿，而且也看不到妈妈了。"[40] 因此，还是把他送来吧。如果他病得太重，他们会把他从伊洛瓦(Illowo)送回去，但我认为他们不会送他回去。他们已经订了船票，而且他是来同母亲

[40] 继父把孩子们接来的动机，并不是出于对这些他并不认识的孩子们的感情，而是出于某种超出对妻子的爱恋的原因。事实上，我们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农民的道德义务感(moral obligation)的本质。首先，是出于对上帝的虔诚的敬畏；其次，是唯恐受到被亏待的人可能的谴责和非议。如果通常存在对公众舆论的畏惧，这里没有表达出来，当然它也不会非常强烈，因为这个男人的生活几乎同他的社区完全隔离，而且在正常的农民生活中，这种对公众舆论的畏惧通常是同人的道德义务感联系在一起的。在此，我们见到了很好的证明，即由移民或任何社区生活的解体所引发的危机未必会导致道德观念的崩溃。由社会(或家庭)的解体带来的后果是各不相同的，其原因可能源于这样的事实，即社会的评价并不是对农民的唯一约束，这种约束在不同程度上也同自我评价(self-appreciation)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在一定条件下，对某些个人来说，这一自我评价的因素可以发展壮大，足以完全替代社会评价。因此，正如我们在亚当·拉克兹考斯基身上看到的那样，自我评价以个人自傲感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后者取代了家庭团结，把利他主义从一种义务转变为一种个人人格的体现。在这里，自我评价的形式是在上帝和人类面前表现出的一种正义感。害怕遭到受亏待者谴责的原因同害怕遭到社会谴责的原因是不一样的：首先，一种不可思议的背景依然是很明显的；其次，诸如此类的事物都是无法察觉的。

团聚的，因此我认为不会出现那样的事情。只管把他送来，亲爱的妹妹，他们肯定会让他过来的。求你了。威斯涅夫斯基先生(Wisniewski)，不必过于担心，也不要怕会遇有太多困难。在过边界时，如果你们同走私者达成交易，他们能带十个人过界。为此所花的费用我都会还给你。如果他不来，对我们真是天大的憾事和痛苦，也要花很多钱，因为他们不会把船票钱还回来。我的心中一直充满忧伤，因为我要尽一切努力把这个孩子接过来，但却办不到。记住，亲爱的妹妹，把他给我送来，我向你乞求如[上帝般?]的慈爱。你来信中说要捎给我一条披肩，不要为此给你自己和要来的[人]增添任何麻烦。只要我的孩子们都能来，我再不企盼任何别的什么。既然你为自己的孩子担忧，我也一样为我的孩子担忧。我再一次求你，让我的孩子们都过来，因为我给他们每一个都寄了船票，为的是让他们都能来。我们向你们致意并祝你们一切顺利。我们两人为了我们的孩子们而向你们恳求。我们为此会给你们以回报。威斯涅夫斯基先生，如果在途中他们向您问起什么，只说您是把孩子们带给他们的父母。这就够了，您无须做任何其他解释。再说一遍，如果上帝引导你们幸运地越过海面，他们会要求有个人——母亲或父亲——在纽约迎接你们。到那时，他们会问："他(她)是你们的父亲(母亲)吗?"让他们[孩子们]说："是的，是我们的母亲(父亲)。"并说威斯涅夫斯基是我的弟弟。然后一切就都妥了，不要在我们让你们所做的解释之外，再做任何其他解释。亲爱的妹妹，你信中说他们可能会把他从伊洛瓦送回去。唔，到那时一切都无能为力了。那将会是上帝的旨意，他就会成为一个孤儿，直到死去，再也见不到他的妈妈。上帝啊，那会使我多么悲哀！但或许上帝会愿意让他顺利通过。也许他们会[旅途]顺利，我亲爱的妹妹。我希望他将成功。为你祝福并爱你的，

达布罗夫斯基斯
[海伦娜·布利斯卡结婚后的名字]
一九〇七年四月十九日

亲爱的妹妹：

我像是在给一位姐姐写信，又像是在对姐姐抱怨来自家乡的我的孩子们——那三个男孩子。我没有把他们带在身边，我一直为他们而伤心，现在我的心又因他们而流血。他们不愿意听妈妈的话。如果听话，他们就会和我相处得很好。但是没有，他们只是想到处乱跑，他们差劲的表现，使得我在人前抬不起头。他们来到以后，我送他们去上学，因为这是我的义务。如果你不这样做，老师也会到家里揪着衣领把他们带走。因此他们一直在上学，但是老大对学校很反感："不，妈妈，我不想上学了，我要去工作。"我说："还是去上学吧。"但是他连声说"不！"没有学校的证书，他们是不会得到工作的。我为那两个大孩子搞到了证书："去吧，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他们工作了一段时间，就又对工作厌烦了。其中一个整日同一个犹太人泡在一起[做买卖或是一同消遣？]，已经有几天见不到他的影子了，我还得到处找他。他们三个中间表现最差的是斯达奇(Stach)，另外两个稍好些。开始，他们表现还不错，但现在他们都学会讲英语了，他们的良好表现也就不见了。从他们那里，我根本得不到一点安慰。我[向你]抱怨就像是对姐姐抱怨，也许你会给我以安慰，至少是会有一封来信，你要是能来信安慰我一下就好了，亲爱的妹妹。[41]为你祝福的，

---

[41] 在这封信中，我们看到了整个旧的情感习惯(old sentimental habits)破碎的

H.J.达布罗夫斯基斯
一九〇八年六月六日

亲爱的妹妹：

……我收到你的信和寄来的薄饼，谢谢你惦记我，亲爱的妹妹。亲爱的妹妹、妹夫，如果我没能常给你们写信，请不要为此而生气，因为我不知如何写，当我请到别人代写时，时间也已悄悄流逝了。但至少我还是不时地给你们写信。你曾来信问及我的孩子们和丈夫能挣多少钱。我丈夫在一家铸造厂做工，有时能挣到九、十、十二个卢布[美元]，孩子们能挣四或五个卢布。亲爱的，在美国并不比在我们国家里强；无论在哪里，能做得好，就做下去；做得不好，就要承受苦难。感谢上帝，我还没有遭受苦难，但我也没有什么快乐。我们国内有许多人都认为在美国每个人都很快乐。不，这里和我们国内差不多，教堂也和我们的很像，总之一切都很像。

悲剧。母亲与孩子们之间关系不断被削弱想必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在母亲一方，或多或少相互独立的旧感情习惯与在美国生活和第二次婚姻中获得的新感情习惯共存着；而在孩子们一方，则是从旧的家庭生活向个人独立迅速的、或多或少是完全的变化。我们……从别处也找到……证据证明当孩子们来到母亲身边时，他们发现自己原来的种种期待都落空了。她的一些新特征，使她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几乎成了个陌生人。另一方面，孩子们的纯朴心态，也消失得异常之快、异常之彻底。一段时间之后，做母亲的从她旧有的感情心态出发，开始发觉孩子们也变得陌生了。很可能这种家庭的解体因为没有父亲而加速了。总之，结果是母亲感觉到她自己感情心态中的旧的那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现实的；而她对子女们的失望，使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亲近她的妹妹——她是整个家庭中唯一和她旧时生活依然存在真正联系的人。同时，这也证明了同新的感情习惯相比，旧的有多么顽强；并且也证明了女人在适应新的环境时要比男人困难得多，同她的哥哥相比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为你祝福的，

H.J. 达布罗夫斯基斯

[一九〇九年，一九一〇年或一九一一年]一月十日

感谢上帝，我的孩子们目前还不算最糟糕。[42]

至于孩子们，有两个是表现良好的孩子。一个在做工，并把挣到的钱交[给我]；另一个在上学，成绩也不错；但是第三个则根本不着家。斯达奇变坏了，现在还是很坏，将来也好不了。他年幼时，在家的时候还多些，越长大，就越不着家。我曾恳求他："斯达奇，和妈妈一起待在家里。"不，他跑掉了，并到处游荡。就让他跑去吧。我已尽我的所能把他的眼睛擦亮了[使他受了教育了。他能读，能写，会讲英语，很像一位绅士。你说"揍他"，可在美国是不允许打孩子的，否则会被投入监狱。给他们饭吃，但是不能打他们——这就是美国的法律。什么办法也没有，虽然你建议揍他！我真是一筹莫展。如果他自己不争气，他就毁了。

……我很后悔这么快就把孩子们从国内接出来。在国内，他们可能会受一些苦，在美国则不然，而且正因为如此，许多孩子生活放荡。在美国孩子们生活优裕：他们用不着去牧场放牧，只要去学校读书，而这就是他们全部的工作[43] ……

---

[42] 母亲同孩子们之间重新相互适应的过程开始了，但这个过程远没有完成：母亲无法摆脱陈腐的权威欲和获得美满和谐家庭生活的意向，而孩子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放任自流之后，既不能恢复在原来国家时所具有的那种传统家庭态度，又不能建立一种使个人主义与团结能和谐统一的新的家庭生活结构。

[43] 海伦娜的陈述是对环境变化的很好说明。在变化的环境中，父母的权威被削弱了：在波兰，孩子们要在父母的监护下干一些轻微农活儿，而在美国上学当然就成了一个解脱的因素。

H.J.达布罗夫斯基斯
[一九一〇年或一九一一年]四月五日

……至于我的孩子们,我把麦尼克[Manick]送到一所学校去了,预备让他在那里待上两年。如果他表现好,我[到时候]会接他回来,如果不好,他就要在那里一直待到他满二十一周岁。如果他自己努力并听从教导,很快会让他离开。如果他不服从管教,他们就会让他一直等到二十一岁。我不管他了,亲爱的妹妹,因为他既不去上学,也不听话。我同他之间常常发生矛盾。我不得不把他送到那里去,或许他会变成一个[好]人。在那里,他们会教他读书、写字和各种劳动。他长大了,就不会受苦。我常去探望他。他感觉不错。如果他在那里受罪,我也不会允许的。老大没同我在一起,老二也没有,我曾担心这一个也会离我而去,但却是我把送走了。他很快会变得懂事,他能成为一个男人……

H.J.达布罗夫斯基斯
一九一一年八月七日

波尔考夫斯基家庭系列

波尔考夫斯基个案是一种境遇中特别有趣的例子,在这种境遇下,婚姻群体几乎不再是家庭的一部分,也不再因家庭机制聚集在一处;同时,夫妻间的个人联系也不再牢固得足以使这个群体持续下去。

波尔考夫斯基是城市居民。我们不知道夫妻双方的家庭是

什么时候来到华沙的——可能是三十年前，亦或是三百年前——他们的态度并不能给我们提供什么线索。实际情况是，除了宗教之外，我们在他们身上几乎找不到其他的传统成份。但这很可能是农民的传统在城市中消失的结果，也可能是在现代生活的影响下旧的城市传统逐渐瓦解的结果。总而言之，波尔考夫斯基是一个工厂工人，而不是一个行会成员，因此他身上甚至没有一点手工业者阶层传统的痕迹。如果他是行会成员，他身上就会留下轻微的痕迹，如同我们在他的朋友、斯坦尼斯拉夫(Stanislaw)身上所见的一样。

虽然波尔考夫斯基夫妇在华沙市或在邻近地区内有许多亲戚，但是，双方的家庭成员都不太关注对方。休戚与共的观念已相当淡薄，波尔考夫斯基的弟弟二十年中就没给他写过一封信，否则这些信会同其他来信一起被保存的。我们可以将这种情境同我们在马克威茨一家所看到的进行比较。当他的妻子特奥菲拉发现自己陷入极端困境时，他的亲戚中却没有一个人帮助她。他们甚至避免同她这样一个令人厌烦、贫困潦倒、衣衫不整、诉苦不迭的老太婆发生社会联系。

也没有什么能够取代我们在乡村和小城镇里看到的社区关系。可以肯定，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自己熟悉的交际圈子，在这个圈子里有流言蜚语——对社会舆论的一种拙劣仿效——但是一点也没有村庄里村民之间的那种持久的相互关系，也没有定期的联欢会。因此，社会舆论也就没有力量，缺少持续性和生命力。

很明显，在这种状况下，婚姻就变成纯粹的个人私事，而它社会性的一面则和以下这些因素相关：宗教上的许可，婚姻群体与宽松的社会环境之间不多的简单关系，以及环境和国家对稀有犯罪案件的例外干预(exceptional intervention)。在以这些少

数社会规范为标志的众多限制之内，还是给各种各样的两性关系留出了足够的空间。这种关系的实质，当然要取决于成员们的人格和他们共同感兴趣的领域。在实际事例中，如果夫妇双方的人格中缺少传统性和文化底蕴，那么他们的关系必定相当脆弱。当最初的肉欲上的吸引力消失之后，习惯和日常生活中的共同兴趣就成了两人之间仅有的联系。但是，丈夫的移居国外，把这两个方面都搅乱了，婚姻关系的逐渐解体便成为一种心理上的必然。

我们并不知道丈夫所经历的变化过程，但是从妻子的来信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猜测出来。在美国，他显然发现了新的感兴趣的领域。作为一个虽然没有受过教育但却相对聪慧的男人，他成功地使自己适应了新的环境。他以前在华沙生活时，工作与现在相同，但挣得少，也很少有机会表现自己，这种生活的范围对于现在的他而言显然已经相当狭窄——而且与做农民时的生活相比，和那时村庄生活所能够给予的多种工作和众多具体的社会兴趣相比较，在华沙的生活范围更是狭窄得多。此外，离开了可能年纪大于他的妻子，他似乎在美国找回了自己的青春。他讲求穿着，常剃胡须，正如他妻子所说的那样，看起来年轻了十岁。在当地，他很可能，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已经和另一个女人有了关系。因此，在过了一定时间之后，他的心中对妻子就只剩下了一点旧情，尽管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不断地给她写信并寄些钱，但他这样做一部分是出于怜悯，一部分是出于道义感。他并没有作出什么伟大的牺牲。将近二十年中，他寄给她的钱还不足五百美元，也就是说每年还不到二十五美元。但是我们必须牢记他缺乏任何真正强烈的帮助她的动机，因为道义感如果缺乏社会舆论的支持，便不可能在这个文化层次的男人心中形成一种想帮助妻子的强烈冲动。而且，他越来越感

到他妻子对他来说是一个累赘，这不仅是因为钱，也是因为他显然很想忘却过去的生活，而妻子是他同过去生活的唯一联系，或许还因为她也是他娶其他女人的障碍……

这些信件使我们能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个女人的变化过程。没有家庭群体的支持，她从没感觉到需要丈夫对她忠诚的要求，以及对她提供帮助和保护的权利。显然，夫妻关系的更高层次的道德观念在她心目中并不比在她丈夫心目中更牢固，而且也不会成为不存在的社会规范的替代物。起初，她盲目地认为他移居之后会照顾她，因为他在家时是照顾她的。后来，当她意识到情况有变之后，她所吁求的并不是他对婚姻关系应负的责任，而是他会对她帮助和慷慨相待的许诺。再后来，要求得到怜悯就成了她仅有的对策，当这一点也被事实证明不能得到满足时她便利用其他的争执方式，指望上帝的惩罚，以自杀相威胁，等等。她一次也没有提出对爱情的吁求。她的要求的性质也在改变，最初，她想的，盼的，都是她的丈夫能够回来，而不是把她带到美国去；后来，如果他丈夫让她去，她也乐意去美国，但要在某个人的照护之下（她去美国的心愿还没有强烈得足以克服她对旅途的畏惧）；再后来，她不再期盼去和他在一起，只是希望能再见上他一面；最后，能不断地接到他的来信和寄的钱她也就满足了。

另外一个有趣之处是她同她所处环境的关系。因为作为一个家庭群体的成员，她并无社会地位，她的社会地位完全建立在她的婚姻之上，也就是说建立在她丈夫的地位之上，建立在她丈夫对待她的态度之上，建立在他们有一个家这一事实之上。只要她的丈夫离开了，她的地位立刻就降低了；她没有了家，也不能更多地代表这个家。但是她的丈夫仍然有可能回国或把她接到美国去，因此她的地位还不是非常低下，因为一切还都是暂时

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依然独守空房，她所处的社会环境就不再认为她的丈夫有可能回国了。此时，她的社会地位就完全取决于她丈夫对她的态度：他寄来的每一封信，每一张照片，或每一次寄钱，都会对她的社会地位发生积极的影响，因为这可以证明他依然与她休戚相关；相反，每件他渴望抛弃她的证据都会使她的社会声誉下降。自然，如果她能够为自己的地位抗争，而不仅仅依靠丈夫的所作所为，情况会迥然不同。但是作为一个城市妇女，她害怕繁重的劳动，这不仅是出于对身体劳累的畏惧，还因为她相信那样她的地位会更低。另一方面，她无法以参加技能性工作而使自己有所发展，而且她显然也没有那份精力。由于如此完完全全地依赖丈夫，她希望他心中只有她一个。她似乎感觉到他人格的每次外露都是她的一次损失，她对他的所有亲朋都怀有敌意。

波尔考夫斯基婚姻群体所有的这些特点都是典型的，是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普遍的人格特点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如果他们有孩子，一切都会不一样。的确，在下面的一个系列中我们将会发现[未包括在内——编者]类似的特点和一种类似的社会环境，我们将看到子女会是何等重要——同传统的家庭组织相比较，这种重要性是无法比拟的。

在波兰的妻子致在美国的
弗拉迪斯拉夫·波尔考夫斯基的信件

亲爱的丈夫：

我接到你七月四日的来信，我现在身体很好。到目前为止，我一直都同利比基斯[Rybickis]住在一起。我不是很满意，或许

是因为我多年来已经习惯于同你单独安静地住在一起。[44] 如今我们却天各一方，因此每当我注视着角落[四周]时，渴望和悔恨使我不知所措。我只能宽慰自己：你不会忘记我的，你依然会像以前那样待我好[慷慨]。你要我去找波尔考夫斯基[他的兄弟]。我去了。要是他们自己能问候你就好了！但是，没人提起一个字，只是听我讲述。[45] ……我没有什么可写的了，只是想请求你，我亲爱的，经常写信给我讲讲你自己的事：身体好不好，事业是否成功，这些将是我唯一的欢乐，我再也没有什么其他乐趣了。我仅有一些认为我囊中富有的朋友，不时会有人来找我借上几个卢布……每个人都是借起来没个还，我已深知他们……

现在同你说再见，并且祝你身体健康，安好。只是别把我忘记。

真诚为你祝福的妻子，
[特奥菲拉·波尔考夫斯卡]
一八九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华沙

亲爱的丈夫：

四月二日来信收到，我身体很好，我衷心祝你也身体健康。直到现在，我都认为你仍会回到华沙来，因此而非常高兴；但是

---

[44] 分离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和期待之中的事。在农民家庭中，我们看不到这种现象。当然，婚姻群体总是要有一些隐私，但是仅仅对于诸如性关系之类的事项而言，它们都或多或少地受传统观念的保护，免受其他人的干扰。婚姻群体在家庭内部的隐私权比在社区内的要少得多。简而言之，对农民来说，隐私权只不过是某种被社会所认可的为个体生活的社会属性(social character)所规定的限度。这里却正好相反，它变成了个人从一般社会生活中自愿的隐退。

[45] 家庭的解体当然是真的。即使是在这给定的个案中，笔者也特别强调丈夫的亲戚们的冷漠无情，这一点和她对他独占的意向是一致的。

既然你写信说你不回来了，我也依从上帝和你的意愿。从现在开始，我要计数着每一天[直到你把我接到美国去]。上帝可能会让我的愿望尽快得以实现，因为我实在太着急了。这种倒霉的生活！我几乎无处可去，而你在华沙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过去我们有很多朋友，而且每个人都乐于来拜访我们；可是现在，如果我去找其中任何一个人，他们都唯恐我会对他们有所求，而预先就冲我摆出一幅冷漠的面孔……他们都是这样的，甚至那些以前跟我们关系很好的人也一样。他们现出了本来面目。[96] 你在信中要我到弗拉西亚(Wlazia)那儿去挣点钱。但我从她那里还没有挣到一个戈罗兹。她说人们求她给份工作都仅是为了生存，我除需交膳食费外，还要交上两个卢布住宿费。[97] 因此，我亲爱的，求求你，把一切详情都告诉我：我能随身携带些什么，带什么衣服，是否值得带毛皮大衣、[照片]镜框和其他杂物。我将带上幻想和十字架，但是我听说不许带箱子。所以请确切地告诉我每一件事。

你的爱妻，
特奥菲拉·波尔考夫斯卡
一八九四年四月十二日

---

96 如介绍部分曾提到的那样，对于不作为家庭群体成员的特奥菲拉而言，社会对她的认可只能取决于她自己或她丈夫的地位。她丈夫不在家，她作为妻子所得到的认可几乎消失殆尽，她所处环境中人们如何对待她和她对此的抱怨都说明了这一点。有两种机会使她至少能保住部分社会地位：一是她丈夫的忠诚——给她寄钱、写信、等等——一句话，所有能够表明以下内容的证据：他们虽然分居，但却休戚相关，而且这种分居只是暂时的分离，他可能会回来亦可能把她接到美国去。二是通过她自己的劳动去争得个人的地位。

97 弗拉西娅[Wlazia]是他们的表姐，她有一家首饰服装店，波尔考夫斯基想要他妻子去那里做一名裁缝。

亲爱的丈夫：

……几个月没接到你的来信，你不会相信我有多么痛苦。我曾想我不该为等待你的来信而苟活下去，但当我接到你的来信时，又高兴得落泪了。然而，读完信之后，我又陷入极度的悲伤之中。我感到你已经忘记也不会再写上你的地址。但是，感谢上帝，对我来说，极度悲伤和思念似乎也已过去。今年多布斯卡[Dobska]那里根本没活可做，我也根本没去做缝纫。有的时候我能挣上几个兹罗提，但我每月须付三卢布房租[与三四个人同住一室]，这几个兹罗提又能顶什么用。有一个地方因我无钱付租金，便撤了我的床。我现在是靠借张床过夜。此外，华沙在征收医疗税，每年每人一个卢布，我必须缴纳，因为如过期不缴，要付四倍的罚金。

接到你的来信之前，我曾几次去找领事，求他帮助找你，不知你的情况怎样。但是，我要付上五个卢布，他才肯帮助查找。我没有那么多钱，只好独自发愁。我亲爱的，你要我寄照片给你，但只有你寄几个卢布来之后我才能花得起邮费。不过，我求你尽快把你的照片寄一张给我……

[特奥菲拉]

一八九五年八月八日

亲爱的丈夫：

收到你七月十三日写的上一封来信，我怀着极大的喜悦马上给你回信，因为我想经过漫长的充满哀伤、哭泣和其他不同的麻烦日子后，太阳的光辉又照到了我的身上。但我明白这只是在说笑，我只能继续受罪，直至死亡。直到现在，我还从未打搅过你[因为钱的事]，因为我明白在你做得到的时候，你会寄几个

卢布给我。因此,我求你,如果可能,就尽快寄几个卢布来,我现在无依无靠……

你的爱妻,
特奥菲拉·波尔考夫斯卡
一八九五年十月二日

亲爱的丈夫:

……你责备我没能立刻给你回信。亲爱的,我显然不是因为粗心才没回信,你一定不会相信,我真的无法用言语准确地表达你寄的钱给了我多么大的帮助。你把我从某种陌生的绝望中救了出来,因为我等待这笔钱就像是在等待灵魂的拯救。我用了这笔钱中的十二个卢布交房租,因我每个月必须交三个卢布。现在,他们对每个人的收费不会再少于这个数,因为公寓的租金在上涨。我占有一个角落,在这个角落中,除了床便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落坐。我刚租房子,他们立刻告诉我不能在房中烧饭,并问我是否会长时间待在房中。我花三卢布租金得到的经常就是这些条件,我甚至不能烧些开水泡上一杯茶,只好终日靠干硬的食品为生……

特奥菲拉·波尔考夫斯卡
一八九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亲爱的丈夫:

收到你的来信……还有寄来的照片。你难以想像,在我看到你的照片时是多么的高兴和欣慰。我似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你本人。我于四月一日收到你寄来的钱,一共十二个卢布。我

衷心地为此感谢你。

亲爱的弗拉迪克[Wladek],至于我去找你一事,如果有可能,我会很高兴去做。但是,想想看,我独自一人登上如此遥远的旅途会是多么困难。你知道我的胆子小,亦不善言谈,独自上路会非常困难。[48] 至于拉法尔斯基(Rafalski),他现在不去,他改变计划了。因为你写给他的信只讲到土地,而没有提你挣多少钱和那里有什么工作,他生你的气了。他说:"他曾给予我任何帮助吗?他要等我寄去二十卢布之后才会寄一张船票给我。但是如果我想买票,我可以自己去买。"亲爱的,你问我为什么没在信中提到卡洛尔和他的妻子。关于他们我没有什么可写的,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根本不到我这儿来,害怕我会有求于他们,因此我也不去找他们。自从你走后,他们再没邀请过我参加他们经常安排的节日或小型晚会。你知道吗,弗拉迪克,我一直都在向上帝祈祷,希望他能在你的心中激起回到华沙来的愿望。加冕礼行过之后会有一次大赦,那样你就能回来了,你一定会找到工作,因为工厂在节日期间和夜里都开工,大家都说这种状况要延续几年。因此,亲爱的,你可能会改变主意,渴望回到故乡。我听说你曾向拉法尔斯基做过这样的许诺。我将耐心地等待,我已承受了三年苦难,再多一年我也能忍受。……我一直把那个盒子、圣母的肖像和那些照片作为信物珍藏着。我也没有把你的毛皮大衣卖掉,我保存着它,只因为我想你可能还会穿着它在华沙的大街上行走。虽然我已极度贫困,但是我依旧没

---

[48] 她的无能,同远途赴美甚至同不相识男人结婚的乡村女子的能力形成鲜明对照,这可能部分出于体质原因。

有卖掉它。[49] ……

亲爱的，别把我请求你的事忘了，我非常需要它，而且很紧急……

特奥菲拉

一八九六年五月十三日

亲爱的弗拉迪克：

……我不明白你不给我回信是什么意思，我上封信中对你给我寄来照片和钱表示感谢，你一次寄了十卢布，一次寄了十一卢布，还有一次寄了十二卢布，那是复活节之前的最后一次。我五月十三日给你寄了一封信，几乎是向你乞求几个卢布，我要用这些钱买药和看病，但你不仅一点钱不寄，甚至也不回信，因此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是否是因为我向你索取这几个卢布而生了气。但你自己曾写信说你会按月寄[钱]给我，因此，我斗胆向你要钱[50] ……

始终爱你的妻子，

特奥菲拉·波尔考夫斯卡

一八九六年七月十日

---

[49] 这个女人更愿意要她丈夫回到华沙，而不是她自己前往美国，可能不仅出于对旅途的畏惧，还受另外一些因素的制约。她所想像到的未来幸福生活，只能出现在以前曾幸福地生活过的同样熟悉的条件和环境之下。或许她也渴望从她不得不忍受的屈辱中恢复过来，她要让现在不把她放在心上的那个人成为她胜利的见证。

[50] 她并没有像一般农妇那样把供养她生活视为他丈夫应尽的责任，仅仅是可求他信守承诺。

亲爱的丈夫：

谨告知你我已出院，身体很健康，也祝你安好。我在住院期间收到你八月三十一日的来信。我高兴极了，你的每封来信，都会带给我一整天的愉快，我现在找不到别的欢乐。你责备我写信只谈自己而不谈其他亲戚或熟人，这使我感到异常痛苦，可是，关于他们我又能写些什么呢？与我相比，他们都是 Panstwo[原意指“老爷或太太”，后泛指“上流人士”或“富人”]，而我是那么孤独，没有丈夫，也没有家。当我离开医院时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没有钱，几乎也没有栖身之处。我不知道能做点什么，也不知拿什么应付房租。

我的弗拉迪奥[Wladzio]，不要因为我寄了挂号信而恼怒，你知道你给我的信这么少，我还以为我寄的信没有送到你手上，而我自己又没法了解实际情况，而当我寄挂号信时，至少可以生活在希望里，确信会寄到你手里，而你会回信。我目前正等待着我住医院时给你写的那封信的回音，我想你一定收到了那封信，因为是挂了号的。很明显，亲爱的弗拉迪克，你很生我的气，以至你一连数月也不来信，而我写给你的哪是信，简直是乞讨书。所以，不要对我生气，亲爱的丈夫，除你之外，我还能向谁去乞求？是你自己以前的话给了我胆量，因为你许诺过要给我寄点钱，我并不求多，但至少要有[一点儿]。我再次请求你原谅，弗拉迪克，别生我的气，尽快回答我。至于照片，或许我将能挣到一点钱，但只能等到春天；到那时我会给你寄去一张，而现在，我没有钱，不能去照像[馆]……[31]

---

[31] 在这封信里，妻子对丈夫绝对的、痛苦的依赖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无以复加。

一八九六年十二月二日

亲爱的丈夫：

……你来信说不敢确定，我是否已收到你寄来的钱，因为我没有[亲笔]给你回信，只是由斯利文斯卡夫人[出租房子的房东]代写了。不过你可以像相信我的亲笔信一样地相信这封信。她每次从信箱中取出我的来信，不管其中是否夹带有钱，都立即转交给我，并总是代为回信，他们一家是真正的好人……我是故意请别人代写的这封信，以便你能相信我收到了你寄来的信和钱。我请求你，亲爱的弗拉迪克，勤给我写信，你已经有那么长时间没来信了。亲爱的，写信告诉我，你到底想不想回到华沙来？我经常听到一些男人回家来了，有些甚至举家而返。当听到这些消息时，我的心几乎要炸开了，因为你既不写信，也不想回到你的故乡。为什么不回来呢，你是个波兰人啊！……华沙现在很兴旺，所有的工厂都有做不完的活儿，你回来也有现成的工作可做，回来吧！……

你的爱妻，
特奥菲拉·波尔考夫斯卡
一八九七年五月十九日

亲爱的丈夫：

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务必告诉我你不给我回信是怎么回事？卡维克基[Kawecki]来看我，因为他也给你写了信而得不到回音，因此过来问我你给我写了些什么，想知道你的近况，是否成功。他以为你不给他回信是因为你发了财，他很好奇，不知道你究竟是怎么回事。在我告诉他你已有半年未给我来信后，他也

感到很沉重，担心你出了什么事。我非常伤心，[想]你是不是出了事，因为我每次给你写这些苦苦哀求的信，不相信你会完全忘掉我。我再次请求，尽快给我回信，尽可能给我寄点东西。

我亲爱的丈夫，不要因我如此口吻坚决地给你写信而生我的气，除你之外，我几乎没有亲人。尽管我有许多亲戚，但和没有也差不多。因为你该记得，当你陷于困境的时候，你曾从你的亲戚们那里得到了什么，尽管那时你还只是个孩子……

你的爱妻，
特奥菲拉·波尔考夫斯卡
一八九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弗拉迪克：

我于五月一日收到你的来信，就是寄来十五卢布的那封信。邮递员找了我好几个星期，但没有找到，因为你没有写明要寄给简·斯利文斯基，而是写的特奥菲拉·波尔考夫斯卡。我本来收不到这笔钱……只是因为斯利文斯卡对你几乎一年之久未给我写信感到奇怪，她便找到邮递员，问他是否从未见到过一封由美国寄给波尔考夫斯卡的信。邮递员说几周之前他见到过一封，但找不到[收信人]，便又退回邮局了。随信有两张汇单，一张是给特奥菲拉·波尔考夫斯卡的十五卢布，另一张二十五卢布，也是给特奥菲拉·波尔考夫斯卡的[但地址不对]。邮局拒绝将第二张汇单付给我，说那不是给我的，并把它存在邮局里。由于你没有来信，我自己也不能断定那二十五卢布是否是给我的。因此，求求你，亲爱的弗拉迪克，尽快告诉我这二十五卢布是不是给我的，如果是，须由你亲自更改姓名……可能是我在猜忌你，亲爱的丈夫，我很伤心你已把我忘记，虽然这可能并不公平。

一直爱你的妻子，
特奥菲拉·波尔考夫斯卡
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再见[用英文写的；模仿他的来信]。

亲爱的丈夫：

我首先要衷心地感谢你给了我那么多帮助。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一向只能认为你自己可能也没有钱，所以也无法给我寄。我只有向上帝为你祈祷健康，并保佑你诸事遂愿，因为我知道你不会抛弃我。你果然把钱寄来了，我再次深表感谢，上帝会在各方面给你更多的帮助。

我先是收到了十五卢布，已写信告诉你。而后，又收到二十五卢布，那是在你更改了汇单上的名字之后。现在，通过商业银行，我得到了二十八个卢布，用这笔钱我买了些东西，因为我很久没为自己买点什么了[没有衣服，等等]。这些事都使我感到非常幸福，但如果某一天我们能相会，如果是在华沙，那我就会更加感到幸福。

你问我华沙有什么新闻。你现在会认不出华沙了，因为有太多的变动和工作，几百幢高大的建筑拔地而起。在马尔斯扎考斯卡[Marszalkowska]大街有二十栋非常壮丽的房子，有一座非常漂亮的教堂在吉尔纳[Dzielna]大街上，耶稣医院附近又开始兴建一座教堂，在切尔尼亚考斯卡(Czerniakowska)大街也有一座，华沙开设了一所工艺专科学校，就像以前只有国外才有的那种学校。总之，华沙一派繁荣，工厂里到处都有许多活儿……

特奥菲拉·波尔考夫斯卡

一八九八年九月十二日

亲爱的丈夫：

我四月四日收到你的来信……和寄来的二十卢布及三张照片，为此我在信中捎去我发自内心的“上帝的酬谢”(God reward)。我把谢意一直藏在心底里，记在脑海中，我总是一遍一遍地向众人诉说你的善良、慷慨和始终如一。在众人面前，我可以为你没有把我忘记而感到骄傲，[⑫]上帝会因此而再次酬谢你。我只想祈求上帝赐予我们重逢的机会。给我写信，亲爱的弗拉迪克，我能否如此企盼？当我看到你身着摩托服的照片时，简直不能把你认出，你显得年轻了十几岁。尤其是因为你刮去了胡须。但是，你不为失去美髯而遗憾吗？……

你的爱妻，

特奥菲拉·波尔考夫斯卡

一八九九年五月十二日

亲爱的弗拉迪克：

收到你一月二十五日寄来的信和五十卢布。从那以后，经历了许多麻烦，走了许多路，花掉十个卢布，我终于拿到了那些照片，我要为此而深深地谢你，首先为你寄的钱，其次是为那些照片。你不仅牢记我的所需，而且还为我带来极大欢乐。然而，为照片而谢你的只是我一个，因为卡洛尔[兄弟]和洛迪亚[侄

⑫ 我们看到她的社会地位(或许社会身份)的高低完全取决于她丈夫对她是否善待：她自己不能依靠个人力量成功地为自己获得地位，甚至不敢一试，她把自己绝望地系于唯一的一根线上，以免堕入乞丐和被弃者的阶层。

女]根本不满意,他们宁愿要二十乃至四十个卢布。[13] 亲爱的弗拉迪克,我已有很长时间没给你写信,因为,实话对你说,我不敢经常地向你提出要求。然而是你授予我这一权利,你来信中说过不论何时,只要我需要钱,就给你写信。因此,亲爱的弗拉迪克,我现在又给你写信了……

我不会再同卡洛尔夫妇住在一起了,因为在他们看来,既然我与他们同住,他们就应该靠我为生。但是由于我不能把你寄给我的钱都交给他们,他们便开始以恶劣的态度对待我,及至最后竟想要动手打我。因此,现在我已经移居别处……

哦,亲爱的弗拉迪克,如果有那么一天,你能回来把我接走该多好!因为我自己没有能力孤身一人去寻你。或许你有什么人[家人或朋友]会去美国?那样我将乐意随他一起去找你……

你的爱妻,
特奥菲拉·波尔考夫斯卡
一九〇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亲爱的丈夫:

我收到你的来信和六十卢布……我一方面感到高兴,另一方面也很伤心。相信我,亲爱的弗拉迪克,我有这样一种不祥预感。在我与别人分享复活节彩蛋时,我哭了,我总是想着你离我是那么远,孤独,没有家庭,一定是常常感到悲伤,就像我一样,或许还生病,身边没有亲人照护。我正不断地这样想着,突然斯

[13] 她再次有意或半有意地试图进一步削弱他丈夫和他的家族之间的联系,以便由她自己独自占有他。这种做法显得不明智,如果把这种情形同农民的信件相比较便可以看出来。鉴于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牢固,比较合适的举措是尽可能地强化他同家乡之间的各种联系。

利文斯卡给我拿来一封信。真的，我的预感被证实了。相信我，亲爱的弗拉迪克，接到你寄的钱我甚至并不那么高兴，因为我伤心地得知你病倒了。你在那里经常生病可能是气候对你不适。我每天都祈求上帝给你健康并使你生活愉快。你还年轻，至今为止你尚未过上美好的生活。因此，我们的上帝会为了你善良的心而赐予你美好的一切，满足你对他的所有希求。[54] 上帝会因你给我寄钱而酬谢你！除为你伤感之外，我还有另一件不幸事，我的弟弟伊格内西死了……我不知你是否还记得他。我家的人就这样开始死去……

特奥菲拉·波尔考夫斯卡

一九〇四年四月二十三日

亲爱的丈夫：

看在上帝的份上请回答我，你目前的情况到底怎样。这是我第四封请求你给我一个回答的信，但你甚至连一个字也不给我写。我相信，亲爱的丈夫，你可能对没完没了地写信和寄钱已感到厌倦。然而，上帝可能很快就会使你解脱。我自己这样祈求，因为我也对在这个世界上为自己焦虑也为你担忧的生活感到厌倦。虽然你并没有让我感觉到这一点，因为你很善良，然而我自己还是感觉到了，每当我接到你寄的钱时，我都落泪，因为我是你的一个负担，除去祈祷上帝保佑你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之外，我再不能给你任何回报[55] ……

---

[54] 这明显是一种对永久性分离的主张的屈从，或许也是对他移情于另一个女人的可能性的屈从。

[55] 同上一封信相比，在这封信中她更多地表达了对自己命运的确定感。一次次地使她能继续活下去的简短来信和一点点钱即是她所能要求的一切。

你真诚的爱妻，

再见　　　　　　　　特奥菲拉·波尔考夫斯卡

一九〇四年八月八日

亲爱的丈夫：

首先，愿上帝重重地酬谢你，酬谢你的善心和对我的关照，除了上帝通过你给我的关爱之外，我真的是一无所有了。我手中的钱不足一个卢布，更惨的是我病得非常厉害以至在昏迷中被送到医院；甚至在我的熟人中也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稍稍有点恢复之后，便请修女给斯利文斯卡打电话，她在来看我的路上遇到邮递员，他给了她一封信和七十个卢布的汇单……

也许你永远不会到这里来，亲爱的弗拉迪克，但至少你可能会来看看华沙和你的朋友们，于是，上帝会可怜我，我将能再见你一面。[⑥] ……

特奥菲拉·波尔考夫斯卡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亲爱的丈夫：

又有几个月没收到你的信了。你在芝加哥时我似乎感觉你离我较近。但现在[你在加利福尼亚]我觉得你离我是那么远，甚至超出了我的思维之所及。哦，我亲爱的弗拉迪克，你难以想像一个被众人所遗弃的女人，孤寂地活在世上是多么的悲惨。一个贫困潦倒的女人根本不会有朋友，就连她的家人都会避开她很远。我一次又一次见到的只有斯利文斯卡，再没有别人会

⑥ 完全的退却，把自己同丈夫的朋友置于同一基础之上。

到我这里来。

你的爱妻，
特奥菲拉·波尔考夫斯卡
一九〇七年三月一日

亲爱的丈夫：

看在上帝的份上，请你告诉我出了什么事？你去年六月写过信寄过钱……十二月份又第二次寄钱，但没有信。

求求你，亲爱的丈夫，别生气，但我要恳求你尽快寄点钱来，尽你的可能。亲爱的弗拉迪克，我知道你拥有数千美元，这是K先生告诉我的。因此你至少能够来华沙看看，让你自己、让我，让你所有的朋友都感到快乐。现在的华沙非常平静。

再见，亲爱的丈夫，请上帝赐予你最美好的一切。

你的爱妻，
特奥菲拉·波尔考夫斯卡
一九〇九年九月二日

亲爱的丈夫：

我挚爱的弗拉迪克，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愿给我写信。你显然是不愿意写，我已连寄四封信，求你甚至哀求你哪怕只给我写几个字来，但你根本不想写。在这许多年中，还没有过这种情况。目前，我的生命正在走向尽头，而你却一年零八个月都不给我写一封信。这到底为什么，你是可以挤出一点时间给我写上几个字的！你在一年零两个月之前给我寄过钱，但即使是在那时，你也没写上一个字。很明显你不想再关照我了。我现在该

怎么办呢，不幸的女人，我没有能力挣钱养活自己。在这里有数以千计的年轻人因没有工作而游荡，对我来说，以我已经不再年轻的年龄，找工作就更困难了……

特奥菲拉·波尔考夫斯卡
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日

亲爱的丈夫：

我很不好意思写这封信，但绝望的处境追使我向你直书。我恳求你，亲爱的弗拉迪克，求你看在上帝的份上给我一点怜悯，给我寄点钱来，我已没有出路。我试图每个月从慈善联合会得到哪怕只有几磅面包票和几品脱面片粥票，但都被他们拒绝，因为他们知道我有丈夫。他们说在他们看来丈夫在华沙还是在美国都是一样的，关键是我有丈夫。因此，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我没有工作，现在就连一个贫穷的女佣也想[把她的裙子]用缝纫机绣上不同的花饰，这是时髦。可是，告诉你实情吧，缝纫和哭泣使我开始丧失视力……

亲爱的丈夫，写信告诉我你是否某一天会来华沙？不错你手头是积蓄了一些钱，但另一方面你远离你的家庭和土地。给我写信吧，亲爱的弗拉迪克；至少让我对将来还能见到你存有一丝幻想。

特奥菲拉·波尔考夫斯卡
一九一〇年八月六日

亲爱的丈夫：

几星期前我给你寄去一封信，或更确切地说是一份哀求，请可怜我并寄些钱来。但是，你，弗拉迪克，一个字也没有回答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我认为你对长期以来一直照顾我可能已感厌倦。但你要可怜我并给我寄点什么，别把我忘记。也许很快我的一切都会结束，我将从你的道路上走开。给我写封信啊，亲爱的弗拉迪克，告诉我你的近况如何。你也可能是因为生病而没有给我回信。回答我，我最爱的，我的保护人，并且寄点钱……

特奥菲拉·波尔考夫斯卡

一九一〇年十月十三日

亲爱的丈夫：

我给你写了四封信，在每一封信中我都恳求你至少要给我写几个字来，但我的话对你不起作用。亲爱的丈夫，可怜可怜我，我在向你乞求，再给我寄一点钱，我的头部有一些奇怪的变化，直说吧，是由饥饿造成的。长期以来我手中没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硬币，只有几个借来的卢布，一次借上几个兹罗提。由于在别人看来你将不再给我寄钱，因此我也不敢再向别人去借，他们也就以此为由，不愿再借给我钱。所以我恳求你，尽快寄钱来，不然我将会生命不保。复活节时，要不是斯利文斯卡给了我少许干面包，我就什么也吃不到了，她自己也是一无所有，仅仅是依靠子女们的接济[⑰]……

特奥菲拉·波尔考夫斯卡

[⑰] 下一封信，此处略去了，表明他给她寄了一些钱。——编者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日

亲爱的丈夫：

给我些怜悯吧，我现已然赤足裸体。他们把一切都拿去抵房租了，甚至把枕头也从我头下撤走，只把一个小的留下。可怜可怜啊，亲爱的弗拉迪克，给我寄点钱！你是不会让我饿死的，因为我知道你有一颗仁慈而又高尚的心，只是可能有人在对你进行挑唆。唉，我在世的日子不多了，如此挨饿受罪，我坚持不了多久。亲爱的丈夫，我求你，给我一点怜悯，听听我的哀求吧，我每天向上帝祈祷之后便为你祈祷。

再见，亲爱的丈夫。愿你幸福。

你的爱妻，

特奥菲拉·波尔考夫斯卡

一九一二年七月十二日

第三部分　美国社会的解体

这个章节里记述了芝加哥慈善机构的两个案例：一个涉及经济不自足或福利问题，另一个涉及婚姻破裂问题。虽然这些案例文件本身已弥足珍贵，但每个案例后面所加的分析也极为有意思，它们强调了与波兰社区功能的强大相比，美国社区功能的薄弱。在二十世纪后半叶，政府行为对家庭生活的削弱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对这种关注，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表面上表示认同——但是在社区纽带仍保持牢固的范围之内。

迈耶的家庭

迈耶先生，德籍波兰人，父母均为农民，二十三岁时[一八八六年]来到这个国家。他的哥哥早他几年来到美国并在芝加哥郊区的一个农场安顿下来，凭借着辛勤劳动和精打细算，现已拥有八十英亩良田，过上了舒适的生活。不用说，他是一个受尊敬的公民。做兄长的给我们的迈耶先生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为了让他也能有个机会。时至今日这笔钱也没有归还。

初到时，迈耶先生得到了在兄长处寄宿的机会，但大城市的诱惑力是那么大，尽管迈耶先生无一技之长，他还是留在芝加哥

从事普通的体力劳动，在一个多少有些拥挤的街区住了下来。很不幸，对他同一位二十五岁的德籍波兰女人结婚以前十年间的就业记录，我们一无所知。迈耶太太是一位不识字的妇女，成婚时她已在美国居住了六年。结婚前已有两年的家务劳动经历……

第一次救济申请是一八九八年[婚后两年]提出的，当时是由迈耶太太到芝加哥救助会(Relief and Aid Society of Chicago)请求房租救济。迈耶先生已失业三个月。他们有了一个十三个月的孩子[玛丽]。

这一次似乎什么都没有办成，其他的孩子陆续出生。蒂莉出生于一八九九年，西奥多生于一九〇三年，布鲁诺生于一九〇八年，埃迪生于一九一一年。

一九〇八年一月三十日，迈耶太太来到联邦慈善会的办公室。丈夫轻度精神失常，已有四年不能工作。她一贯工作努力，但近来靠乞讨为生。玛丽在铁道拣煤……[受到联邦慈善会和县农业家政顾问的帮助。]

一九〇九年一月三日，家访。男主人在家，他说在妻子外出工作时他要照看孩子们。告诉他必须立即去工作，因为医生说他可以从事工作。[数年前他严重跌伤，致使局部麻痹，但医生却报告说这个人最大的麻烦是懒惰。]……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一日，坎贝尔小姐，她的母亲已雇佣迈耶太太好几年，在办公室里问我是否可把这个男人送到布莱德威尔[教养院]；并说这个女人来干活时手臂上总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是被打的……迈耶太太说她男人在她们十九年的婚姻生活中只工作了两个多月；他还以他待在家里而她必须工作这样的事实来羞辱她。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三日……迈耶被送入布莱德威尔六十

天。

一九一一年一月十三日，视察员听说……这个男人在除夕之夜喝了石碳酸。向女主人询问，起初她不愿说，但最后她承认有此事；说他喝的相当于二十毫升毒药，是在她外出工作时喝的。在他摔倒的时候孩子们惊叫起来，房东闻声而入……他好多了，又回家了。这个女人说他男人白天睡觉，夜间不睡，严重地打搅了她，使她也经常失眠。他还同她吵闹，并当着孩子们使用邪恶的语言。

一九一一年一月十六日，迈耶自己向办公室要求拘禁，他说他不能再同妻子住在一块儿[对未婚男人来看望他妻子感到妒忌]……[他抱怨妻子从联邦慈善会办公室拿回来一些衣物，她在那里做看门人。]迈耶太太承认做过此事，并说是她男人告诉她把能接触到的东西都往家拿，因为她所得的工资抵不上她的劳动。……在妻子出去工作的时候，迈耶把床上用品、花边窗帘、女儿在圣诞节时得到的新面纱、保险单、所有他能找到的妻子的衣服和孩子们的部分衣服都烧掉了，他还打破一只钟，并咬坏了妻子的结婚戒指……

一九一一年三月七日，迈耶被送到布莱德威尔达一年之久。[视察员收到他写于一九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的信如下]亲爱的朋友：……我感谢您把我关到这里。我学会了怎样工作。请去看看我妻子，告诉她如果她愿意把我接出去，我将会照顾她和孩子们。我对自己并不过于在意，但是非常担心她和孩子们。我原来不知道珍惜每天能够见到妻子和孩子们的日子。她这一次如果能把我接出去，我会懂得怎样去照顾她。我不想让孩子们在幼年便沦为孤儿。[一九一一年五月五日的信中说，]我认为一年的拘禁对我这个年龄的男人来说是太长了。而且我也根本没有过错。因此我想请你帮忙尽力将期限减至六个月……您该

明白这是我在芝加哥生活二十年以来第一次被拘禁。我认为我有权利得到一次机会。……[另一封写于十二月二十三日的信是这样的：]请您发发慈悲告诉我妻子我病了，住在这里的医院，让她来看看我并把我的小儿子布鲁诺带来。我非常想见到他。我已有那么长的时间没见到他了……您一定要原谅我把信寄给您，并给您增添那么多的麻烦，只是因为我在这儿待得太久，已经把我家的门牌号忘记了……

一九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迈耶在慈善会办公室，他是从布莱德威尔直接到办公室去的，连家也没回……转告他说他妻子不愿意让他回家，而且他必须找到一份工作，并连续工作一至两个月，把钱送回家里，联邦慈善会才能同意他回家。[他在基督教工业联盟待了几天，然后拒绝再待下去，于是去找他的妹妹。]

一九一二年二月五日，视察员拜访他妹妹……她说她不愿意让迈耶住在她家里，因为他有妻子和子女，应该回家中同他们团聚。迈耶说他要通过法院来得到布鲁诺，并说当他从布莱德威尔被释放出来的时候，想到不能与家人相见简直要发疯了。

一九一二年二月八日，迈耶太太来到慈善会办公室：她说迈耶昨天中午回了家……孩子们让他进了家门。她回家后，迈耶跪在她面前，吻她的双手，哀求她允许他住在家里。由于他自卑到给她下跪的地步，她的心软了，告诉他只要去工作就可以住下来。

一九一二年二月九日，迈耶到慈善会办公室去申请衣服，并说他找到一份每天挣一个半美元的工作。说他没有鞋子，但又必须在户外的湿地里工作，他的脚受了伤。[一周后他辞了工作，而且似乎也没有尽力去寻找新的工作，尽管联邦慈善会警告他如不工作还会被拘禁。]

一九一二年三月十四日，玛丽一大早来到慈善会办公室，诉

说她父亲昨夜把好好一件外衣撕成布条，并投入火炉烧了；当天早晨，当家里人都在房中熟睡之际，他把窗帘扯下来，剪成碎片，几件女装被割成碎条，羽毛床垫上被泼上煤油，餐厅中四把椅子的皮座垫也被割破，类似的损坏还有一些。[还威胁说要买枪杀死迈耶太太]……迈耶太太又害怕又紧张，各种损失使她心痛欲碎……[过了一阵玛丽给办公室打电话说他爸爸回到家里，正在厨房里静静地坐着。]视察员前去视察。迈耶先生宣称他没有什么可为自己辩护的，只是想说他妻子"占尽了好处，一切都遂了她的愿"。他说他知道巡察员是为他而来，并愿意为妻子修复损坏的东西。他修好的还不多，但已经修了一些。他所采取的态度是出于怨恨，而他妻子对他的态度却是极好的。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不愉快的事，她还是相当文雅，在陈述案情的经过时态度几乎是悲悯的……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五日，案件经法庭审理。迈耶先生在法官面前提不出什么理由，也不试图为自己辩护，只是说"上帝在上"。他被判处罚款一百美元并付诉讼费；然后送往教养院……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一位邻居来电话说迈耶先生回了家，由于迈耶太太想再度把他赶出门，所以他残忍地揍了她[用拨火棒]。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迈耶太太说她男人被捕了……约瑟夫·迈耶对审判法官是这样陈述的："昨天，一月十九日，是我与妻子玛莎的结婚二十二周年纪念日，由于她的一个在家乡时的同学和朋友两年前从德属波兰来到这里并赢得了我妻子的感情，我便成了一个被遗弃者。我妻子和那个男人在没有事实基础的情况下，合谋把我送到布莱德威尔。法院从没有为我提供过翻译，好像我妻子的陈述就能构成充分的证据，使我被判服刑第一次两个月，第二次一年，第三次六个月……我妻子常

说她在给有钱人家工作，可以凭借他们的影响随意对我进行处置，因为她只需用五分钟时间进行指控，其余的事都会由他们来处理。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妻子拒绝对我承担做妻子的责任。而在我第二次从布莱德威尔返回家中的时候，她又生了个男孩，是刚才说过的那个男人的，并冷酷地解释说这不关我的事。她把感情倾注于那个男人身上，对我的孩子们不管不顾，混淆了他们的道德标准。我现在好了，可以工作了，我渴望为上帝赐予我的孩子们的幸福而工作。但我妻子试图再次把我判刑，以便除掉我这个障碍，使她自己能追求她的新生活。我前边说过，由于我没有机会在法庭上通过一位翻译来为自己进行辩解，我被从家中驱逐，并在前面所述的时间里一直是个囚犯。当然，我在布莱德威尔期间是有记录可查的，记录表明由于我的模范行为，我得到了五十四天的减刑。我从不酗酒。我也不需要为我写这封证明信，因为我对法院没有好感，但我必须寻求得到正义的途径。"[刑事法院的法官在接到县监狱狱医开具的迈耶先生精神错乱的证明后，便把案子移交给拘留法院(detention court)。迈耶先生写信给诉讼救助协会，请求得到一名律师为他辩护。]在同他谈话之后，对方感觉他的精神不很正常，便请精神病医生为他进行检查……

一九一三年二月十四日，到拘留法院探望。迈耶已被送往坎卡基的[精神病院]。在判决宣布之后，迈耶太太和玛丽像歇斯底里发作一样，她们坚决不愿意让他走，还说法院若不把他释放她们就待在法院不走。迈耶太太的亲戚告诉摩尔先生玛丽现在没有工作……她使她妈妈的生活更加悲惨。[她十四岁开始工作，但因为不诚实及偷窃一些小东西和钱而被玛丽克兰保育院解聘，联邦慈善会在给法院的情况概述中是这样陈述的。]玛丽……开始表现出她父亲某些喜怒无常的性情。……孩子从未

得到过信任。她总是站在父亲一边，妈妈为她着急，觉得她靠不住，因为她脸上涂脂抹粉，下班也不先回家。迈耶太太喜爱家里的器物，其程度并不因其所遭受的家庭困苦而减低，这是她天生就有的风流娇媚的一面。我们相信这是一种无辜的属性，而她丈夫称她不守妇道的指控全属猜忌，纯粹出自他因二十年来无所事事而导致的对性问题的迷醉。毫无疑问，他的精神不正常。

一九一三年四月三日，迈耶太太说玛丽当天没有去上工，说是油漆使她恶心。应她的请求，我们通过电话向公司进行了查实。玛丽曾去法雷尔小姐处取允诺留给她的套服，但没有见到法雷尔，于是便坚持买一件外套，并同意按分期付款，而且计划现付八美元。一位经办人到家里来索要购衣款，玛丽表现得很坏，又哭又闹，直到迈耶太太最后给那人两美元。玛丽后来从法雷尔小姐那儿拿到了那件套服，迈耶太太希望她把这件外套退回去，但遭到玛丽拒绝。[玛丽已从目前的岗位上被辞退，因为有证据证明她偷了别的女孩的东西。玛丽拒绝干分派给她的家务活。]

一九一三年六月九日，迈耶太太在慈善会办公室里，表现得极度悲痛，她说玛丽根本就没有去制帽厂上过班[她是假装去上班的]，她一直同一个曾在那儿做过工的姑娘在一起。那里的姑娘们说雇主是个邪恶的男人，他拿了本支票簿给她们，说她们可以随意取钱，玛丽[拒绝让他亲吻但]偷了这本支票，并于二十九日伪造了一张十二美元的支票带给她母亲，说是她的工钱；二日，她又造了另一张十一美元的支票；把其中六美元给了她母亲，自己在里佛维尤(Riverview)公园花掉了五美元。…… 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九日……缓刑犯监视官说玛丽是在二十五日失去工作的，因为一位姑娘曾借给玛丽一枚戒指，当该归还时，玛丽找不到它了……[一封来自坎卡基的关于迈耶已逃跑的报告

及所附信件,说]"他于一天晚上逃脱,但于就寝前后自行返回,从那时之后一直待在那儿……"

一九一四年一月十七日,玛丽于十四日带回家六个美元,但坚持要自己留下四个美元。她用这钱买了一顶精巧的帽子,黑天鹅绒面料镶着金色花边。同玛丽谈过话。她表现出很强的反抗性,说要把钱都花在衣着上,直到有衣服穿为止。她不满意联邦慈善机构发给的从旧货店买来的衣服。她说她要把钱攒起来,买一件新式的外衣。告诉她如果她那样做,联邦慈善会就不会再为她提供食品帮助。

一九一四年一月二十二日,迈耶太太泪流满面。玛丽工作的商店女领班来电话说玛丽当天已在法院登记结婚——玛丽称她的生日是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代替一八九六年],并自行签了宣誓书。

一九一四年一月三十日,家访。要求迈耶太太找一份工作……建议让玛丽留在家中照顾孩子们……玛丽刚开始非常不情愿这种安排。来访者还没走,安德森[玛丽的丈夫]先生走进来,他对此计划表示赞同,至少是暂时赞同。

一九一四年二月四日,迈耶太太在慈善会办公室。诉说她目前的工作太繁重,她挣的钱也不够养活孩子们。玛丽不得不给她些钱,她为此感到惭愧和不安。她感到精神压力太大以至无法工作,希望联邦慈善会把迈耶先生从收容所放出来以便能帮她养家。她的侄女杰妮带她去探望过他,发现他穿着整齐,神志清醒,正和同事协同作业。他发誓决不再喝酒,要帮助养家。

联邦慈善会一九一四年六月十六日写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发现她今年春天精神反常,我们以为,这是严重的挫折和对生活的失败感所造成的。她的所有家具都是破损陈旧的,因为她无力更新。她一向是一个特别关爱家庭的女人,渴望把室内布置

得雅致得体，以便与其曾帮佣过的那些家庭的室内陈设相比不致显得过于寒酸。我们感到，如果我们能帮助她补足亚麻布制品并应付家里的衣食所需，就有可能使她们度过沮丧的阶段，就能帮助她重新感受到生活之可贵……”

一九一四年八月十九日，迈耶太太和玛丽来到慈善会办公室。[玛丽穿着很体面，住在她自己的公寓房里。]玛丽说她一直在衣食方面周济她母亲。她丈夫每周挣十九美元，但她要交十七美元的房租，每周还要付五美元的家具费。她还必须积蓄点钱，因为她已有几个月的身孕。她丈夫要她请个医生。而她则盘算着请一位接生婆，因为这样会便宜些。建议她不要那样做……在她丈夫失业的那段时间里，她拒绝按妈妈的建议去申请救济，因为她的骄傲感不允许她那样……

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菁丽依然每周挣四美元……必须要买新衣服[拒绝穿慈善会发给的衣服，因为式样太旧——同玛丽一样]。因为没有满意的衣服，她已三个星期没去教堂。迈耶太太担心如若不让她买她想要的衣服，她会与教堂脱离。她[迈耶太太]的想法越来越反常，她说她真的希望她死去，她拥有的只是烦恼。

在过去的一年里，教堂[指爱尔兰教堂而不是波兰教堂，因为后者总是收钱但不提供帮助]对迈耶太太有一种明显的影响。她的子女在教区附属学校读书，神父对他们的福利状况给予积极关注……她们的家住在一个不很拥挤的区域，虽然迈耶太太依然非常紧张不安并经常报怨，但她家的总体状况已有了改变。她对去年冬天开始的家庭烹饪班很有兴趣……并且正在跟她十二岁的儿子学习写字……如果迈耶先生继续待在坎卜基，孩子们也不出事，我们肯定这个家庭将会逐渐达到自给自足。就他们的生活水准而论，这肯定是最高点……县里现行的救济体制

只会伤害受接济家庭的自尊心,对那些必须经常陪妈妈去领救济品的孩子们来说,尤其伤害他们的自尊……玛丽是一个很不错的家庭主妇,也是一个通情达理的母亲。她很知足,很愉快,有了更高的目标,一切都直接起因于她的丈夫。

引自《芝加哥联邦慈善会档案》

[类似这样的案例]若在波兰则一般不至于导致偏常行为。不管一个人身体残疾到什么地步,……在农民的家庭经济生活中总会有他的一席之地,哪怕只是在父母外出时帮助看看孩子。他的地位可能低于其他家庭成员,但这并非反常现象,因为他对家庭经济所做的贡献低于他的实际生活花费。即使他完全不能工作,他的依赖性也仅限于对家庭的依赖,而且他是其中合法的一员。他对家庭的依赖是一种简单而普通的社会事实,供养他的人不觉得为他牺牲了什么,他也没有丝毫的屈辱感。另一方面,也不存在夸大自己的残疾程度以便逃避劳动的倾向,因为每个人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使全家受益,都愿意尽可能多做贡献。

美国的社会环境是截然不同的。在这儿,残疾人除了慈善收养院之外是没有其他去处的。但是在农民的传统意识中,慈善收养院意味着贫穷,所以有残疾的人只要还有一些自尊心,就会拒绝到收养院去。当美国的有关机构强行送他去收养院时,他感到自己被降到正常的经济水平以下。作为一种反应,他可能会不再顾及一切准则,去乞讨或偷盗,以便逃避那最后的屈辱。即使暂时的残疾也会强化美国社会条件所造成的普遍的不安全感,从而形成一种消沉沮丧的心态,甚至导致自杀。在我们知道的一些案例中,自杀的原因皆出于此。

美籍波兰人的社区通过一种互助性质的健康保障体系来抵

制上述引起经济道德败坏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一保障体系，占相当比例的暂时性残疾病人将由此走向经济堕落。但是在没有疾病救济或救济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虽然部分残疾但残疾却属于永久性的情况下，社会没有提供任何预防机制。即使个人在这个国家中有亲戚，在社会关怀这个问题上大家庭已经失去其传统含义，而美国机构迫使亲戚们对残疾者提供帮助的尝试也完全是徒劳无望的。原因很清楚，在原来的国家中，经济生活是被包容在社会关系之内并从属于社会关系的，经济上的休戚与共是大家庭高度一体化的必然要求，这样的大家庭意味着共同的责任和荣誉、相互呼应、共同的传统、相似的职业——一个复杂而不可分割的观念体系。而在美国，经济利益已变成同其他利益相脱离的且个人化的利益，大家庭的共同荣誉也无须再谈，从社区的角度来看，大家庭已不足以构成一个单位，因为其成员已是四处分散。每一个成员都有其自己的行为方针，有不同的利益倾向，因此，无论什么样的社会凝聚感，都不足以诱使个人或婚姻群体去违背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去向那些残疾的亲戚们提供支持。

在精神异常的病例中，社会环境和个人态度所起的作用比其在身体残疾的病例中所起的作用要明显得多。例如，倘若在波兰有稳定规律的传统型农民生活中，一个农妇智力上的缺陷不会将她迫入困境。她的缺陷并不妨碍她获取与她的家庭地位相适应的最低限度的各种习性，而且大家庭还可以帮助她把她的地位调整到与她的个人能力相适应，不管她的能力有多么低下。在美国，是她所必须面对的新情势把她神智上的缺陷变成了一种导致经济道德败坏的原因。当然，迈耶或多或少属于精神异常，如果他还是在波兰生活，这种异常会对他经济上的成功和家庭生活的和谐造成相当的干扰。然而，他无疑会成为他的

群体中的一名极为稳定和可控制的成员，无须对他使用任何非常措施。相反，在美国他的精神异常不仅成为一种几乎是无法逾越的障碍，阻止他在没有社会帮助的情况下去建立一种新的、长久而又适应新环境的经济生活结构；而且，他所遇到的一切超出他早已习惯的传统秩序范围，使他更加无力把握他生活历程中波动起伏的情境，击碎了他身上所剩无几的正常习性，最终使他精神混乱、感情绝望，事实上濒于疯癫。难怪乎拘留所和精神病院最终受到欢迎，因为它们用一种简单而又有规律的生活组织方式来实现安宁与解脱，使其在任何阶段都不再有新的无法理解的问题等待解决。

米切尔斯基的家庭

明尼和斯坦利·米切尔斯基很年轻时就结了婚。他们婚后不久，斯坦利的朋友、一个叫弗兰克·考内基的年轻人来看望他们，他大约来过五六次。一九一二年一月的一个星期一，他于中午时来访。年轻的米切尔斯基夫人正独自在家洗衣服。很难说清他是否强迫她同他发生了性关系。她后来称她进行了反抗，但是他用一只手紧紧捂住她的嘴使她不能呼叫，而且因为怀有五个月身孕她不敢用力挣扎。她没有把发生的事告诉丈夫。孩子生了下来，取名海伦。

同年八月的一个星期日，考内基同米切尔斯基在一家酒巴中赌博。米切尔斯基赢了八美元，这时半醉的考内基提出要告诉他"一点儿秘密"，代价是还回那八个美元。他随后便说出与米切尔斯基夫人性交的事。米切尔斯基几乎发疯一样地回到家，扼住妻的喉咙，直到她吐出实情。他怒不可遏，他不能相信她在这件事中没有过错。他命令她以强奸罪名使考内基受到逮

捕，并且拒绝同她一起生活，除非他的朋友受到惩罚。然而，他们的申诉遭到了拒绝。他愤怒至极，因为强暴是发生在她怀孕期间，而且她此时又再度怀孕，并且做了流产以对他进行安慰。于是，他允许她回来并一同生活了两年。尔后，他离她而去，许诺每星期付给孩子五美元的生活费。

米切尔斯基夫人请求法律救助协会(Legal Aid Society)帮助她从丈夫那里多要一些钱。米切尔斯基当面回答了协会的来信，并给访查员留下极好的印象，访查员是个新来的缺少经验的姑娘，对他"深表同情"。他坚持说很爱他的妻子，但不能一起生活。她已承认她同某个男人发生过两次性关系，他简直无法把这些忘记。除此之外，每次他带她外出，都想像她会同男人们调情和约会。他在结束谈话时答应带妻子到协会办公室去"把事情说明白"。这一点他做到了。但他拒绝给予更多的钱，并敦促米切尔斯基夫人同他离婚，还高姿态地答应出示他自己对她不忠实的真凭实据。

然而，米切尔斯基一家又一次尝试着生活在一起，租了一套房子，买了新家具。两星期后，斯坦利·米切尔斯基离去了，他妻子去法律救助协会抱怨他同另一个女人混在一起，每周只给她五美元。她现在愿意离婚，但此后什么进展也没有。六个月之后，她再次向协会求助，因为就在前一天夜里，他丈夫来到她的住所威胁要杀死她和海伦。他把煤气灶打开，试图使她中毒昏迷，但她的大声尖叫使他害怕并溜掉了，他抓起墙上挂着的他的照片并带走了孩子。米切尔斯基夫人叫来了警察，把他逮捕，并把孩子夺了回来。

此后不久，已经成了他所供职的公司的经理的米切尔斯基，给他妻子在他的办公室中找了一份每周七美元的工作——这样就可以免去为孩子支付生活费。她很快又失去这份工作，他也

没有恢复支付赡养费。法律救助协会派人去找他。他说他已不能工作，从他与之同居的另一个妇人身上感染了梅毒，正在接受治疗，很可能要进行手术。他坚持认为他妻子不道德，说有一次他和一名警察去她那里时，发现内室中有一名半裸的男人。他想逮捕那男人，又恐把他妻子牵扯进来。几个月之后，米切尔斯基到法律救助协会办公室索取案卷记录。他想知道记录中是否有他妻子对不道德行为的招认，旨在利用这种招认作为离婚的基础。当这一要求被理所当然地拒绝之后，他变得非常激动，指控法律救助协会总是“袒护女人”。

又过了六个月。离婚被无争议获准。出示的许多证据表明米切尔斯基人格完好，而米切尔斯基夫人却是行为不端。米切尔斯基的弟弟和一位年轻姑娘证实，一天晚上，他们边喝酒边玩捉迷藏，这时米切尔斯基夫人邀请了一名十八岁的男子进入她的卧房，并同他性交。起初米切尔斯基夫人对此否认，并提出要把涉及的那名男子带到法庭进行反驳，但是，经过诉讼救助律师进一步追问并言明发伪誓的危险性之后，她承认那事儿是真的。但她乞求协会要法院别把孩子的监护权判给父亲一方。她眼中噙着泪水说，在这个世界上孩子对她意味着一切。几天之后，当米切尔斯基从她手中把孩子领走之时，她是那么绝望那么可怜，以至法律救助协会决心为她提出对离婚判决的抗辩。已经提出的判决被搁置了，其理由是米切尔斯基的坏习惯正初露端倪。在准备终审判决的过程中，诉讼救助律师访问了那位使米切尔斯基离开自己妻子的姑娘。她对建议她去法庭讲述她同米切尔斯基的关系并不反感。她“同情可怜的米尼，愿意帮她的忙”，但当时时机不利，因为她正起诉她自己的丈夫，要同他离婚。她不想被置于如此境地，即在审理米尼的案子时对法官说她自己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而在她自己的离婚案中却要对同一法官说

她是个无可指责的妻子，她的丈夫配不上她。最后她同意如果她自己的离婚案"进展顺利"，她愿意考虑帮助"米尼"。但是，她决不能被传讯，如果她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去作证，她甚至会说米尼和她丈夫都不应该拥有这个孩子。几星期之后，米切尔斯基夫人说斯蓓拉拒绝帮助她，因为斯坦利已许诺如果她得到另一份离婚判决书他就同她结婚。这并不是斯坦利在他的离婚判决尚未下来之前所做的唯一的结婚许诺。

米切尔斯基夫人得到法院的允许去看望孩子，但立即将孩子诱拐。法律救助协会从法院为她获取一项裁决，允许她把孩子带在身边。米切尔斯基和他的律师均未提出异议。

取自《芝加哥法律救助协会档案》

一种全新的成份通过国家干预而被引入波兰移民的婚姻生活，从他的观点来看，这种成份不仅包括法院和警察行为，也包括美国的私人与半私人机构的活动，因为他很难把一个纯粹的社会机构同一个国家机构区分开来，尤其是当前者利用或能够利用，或至少被认为是有能力利用法院和警察的时候。在致使婚姻解体的其他因素中，没有哪一个对婚姻具有同等的和普遍的破坏作用。在对数千个案例进行仔细研究之后，我们没有发现一例因官方干预而得以巩固的婚姻关系。如果在机构干预之后偶尔有某种改进出现，也并不是因为干预的原因才出现，而是尽管有干预但改进依然出现了。有的时候，这种现象要归因于某些积极的经济影响或社会影响，有的时候则是因为实际情况在公之于众时并不像原以为的那样糟，况且自发地进行调整又是可能的。然而，在绝大多数案例中，无须详尽的分析就能发现，不管是实际运用或是预示要运用国家干预都对婚姻关系有着直接的和额外的影响。

对这一点进行解释并不难。在迁出国,由家庭和社区将婚姻置于社会控制之下,它们把婚姻视为一个单位并关注其存续。社会环境的作用不是要介入夫妻之间,把他们当做彼此分离的个人来对他们的要求进行公断,而是在婚姻关系受到任何一方行为的威胁时去支持这种关系,让有过错方认识到错并不是错在同对方的争议上,而是错在违犯了婚姻的神圣上。因此,原来的社会环境所实施的控制提高了婚姻关系在制度上的意义。与此相反,美国机构的干预意味着在夫妻之间进行仲裁,将双方正式或非正式地视为相互抗辩的当事人,认为在他们之间,就像在任何两个人之间一样,可以判出个公平来。这样一来,在移民的意识中,整个事情就一下子被置于斗争的基础上,而不是置于团结的基础上。在斗争中,每一方都想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从对方获取最大的好处。由于干预机构是官方的并且来自社区之外,这就强化了斗争的概念。结果,任何呼吁团结的要求都失去意义,因为社会工作者或法官自身并不是社区里的一员,婚姻关系的存续不关系到其直接的重要的利益。此外,美国机构的行为在本质上不同于波兰社区的行为,它是不连贯的,而且将事情置于理性的基础之上,而原来社会环境的行为是持续的,借助情感建议而非推理论证。

因此,直接或间接的国家干预不可避免地要削弱婚姻的制度含义及其传统的社会神圣性。即使在国家干预是发生在为数甚少的对实际情况有相当知晓的案例中,这种干预仍然对婚姻关系产生削弱作用。但实际情况往往是由于对波兰农民的传统和道德观念的无知而使情况恶化,而这种无知正是大多数善意的、理想主义的社会工作者和法官们的特征。当然,在那些幸运的少数案例中,如果美国机构的代表不够练达又缺少人情味,情况甚至更糟糕。当权者犯下的任何错误或作出的不公正行为,

都可能被当事人夸大和引起误解，进而在移民社区中引起更为荒谬的舆论误释。

这还不是全部，美国机构在干预婚姻生活时所表现出的某些主导趋势，已经在波兰移民当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态度，这种态度往往导致婚姻纠纷的恶化。除了美国婚姻不稳定（这是实行世俗婚姻和离婚的结果）这一看法外，最重要的是，女方夸大对男方的强制权的感受，而男方则相应地认为婚姻义务属于法律强制而非道德责任。

对女方来说，觉悟到她能够在她愿意的任何时候以指控丈夫有不履行抚养义务、行为不端、或通奸等过失使他受到逮捕，是她的一种全新的经验。虽然在以往的制度下，她事实上几乎同男人平等地参与对共同事务的管理，可是在出现明显分歧的时候，男人便拥有对她正式的强制权，而她则只能提出建议和规劝，或者向大家庭求助。现在，大家庭解体了，男人所拥有的唯一实际的强制手段——利用体力优势和克扣生活资料——已被法律所禁止。女方不但能对强制予以抵制，而且还能利用丈夫的暴力、醉酒、或经济疏忽行为作为口实，从而迫使丈夫按她的意愿行事。难怪每同丈夫发生口角时，她便试图运用她新获得的这些权利。而她的女友及熟人，出于女性间的团结一致，经常鼓动她动用诉讼手段。当然，这种手段是彻底违背婚姻的传统意义的，然而婚姻的传统意义是脆弱的，在怒不可遏的时候很容易被忘在一边，何况维系其传统意义的大家庭已不复存在。诉讼手段一旦被使用，再想挽回就不可能了，因为做丈夫的绝不会忘掉或彻底原谅把外在的官方干预引入其婚姻隐私的行为，那伤害了他的男性尊严，把他等同罪犯一样予以逮捕。如果逮捕起因于未婚女子就私生子问题提出的指控，那么问题还不那么严重，因为它无损于家庭的完整；女方也没有顺从的义务，而且

在多数此类案件中，整个关系在实施逮捕前已经进入争端阶段。当然，在这种情形之下，若双方得以在法庭上成就婚姻，这桩婚姻通常也没有好的结局——如我们的资料所表明的——但是，如果女方闹得不是很凶，也没有坚持她的权利，双方过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建立关系，出于自愿并无须履行法律程序。反之，婚姻关系则会由于丈夫被捕而实际上破裂。男方可能由于害怕而屈从，但婚姻关系在他眼中已不再具有家庭团结的含义，也不再是自愿的结合，而仅是一种被迫的同居和经济上的贡献，二者加在一起，使他的身份很像一个奴隶。很自然地，一遇机会他就要走掉的，除非他对子女恋恋不舍或惰性十足。这种事实和心态在移民中传播的结果，使男人们放弃对婚姻的永久责任观念成了一种趋势。在这方面，试图要移民接受正式的契约观念，认同男人一经结婚就要承担某些终身义务的原则，是完全徒劳的，因为只有当义务是他所从属的那个基本社会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时，对于他才是有意义的。美国法律将他和他妻子视为彼此孤立的个人，而不是基本群体的成员，在两个孤立的个人之间，正常的意识上的联系并不被视为一种约束乃至违背某一方意愿的契约，而是可依任意一方的愿望随时解除的自由联系。

因此，一般而言，当用婚约的永久性和排他性标准去进行评价时，美国波兰人中间婚姻关系显得相当令人绝望。造成日渐增多的一夫一妻制婚姻群体解体的原因有许多，没有哪一个是显著地带普遍性的可以改造的因素。如果在农民背景的移民中，婚姻解体同其他方面的道德堕落的关系不那么紧密，对孩子们的影响也不像实际上那样，那么，这一进程或许不会构成一种社会性危险。因为正常的社会生活可以和不以一夫一妻制婚姻为基础的家庭生活形式共同存在。但是要让美国波兰人社会以某种形式的一夫多妻制婚姻为基础创立一种新的家庭组织形

式，显然是不可能的，首先因为这个社会没有足够的凝聚力，其次因为美国的社会法律制度不允许这种公开的、由社会进行调整的一夫多妻现象。无论在美国波兰人中一夫多妻的做法在事实上有多么普遍，它们肯定总要表现出秘密通奸的明显特征，并因此不仅被官方认为是普遍的不道德风气的标记，而且还在实际助长这种普遍的不道德风气，即个人生活组织方式的堕落。抵制这种婚姻退化的唯一可行的途径，是向美国波兰人社会注入新的家庭生活理念或帮助其发展这样的理念。这一点只有在美国波兰人社会真正溶入美国社会，而不只是溶入美国的国家和经济制度时，才能得以实现——如果美国社会真能提供充满生机的家庭理念的话。

第四部分　种族问题探讨

文选的最后部分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对种族社区的描述。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主要目的是要美国人相信这些波兰人不仅变成了美国人，而且变成了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的与众不同的独特的美国人——美国波兰人。在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看来，波兰人没有简单地"重复"他们在波兰的文化，而是将之加以改变，使之成为在美国环境下仍然可用的文化。

美国波兰人社区

通常的假定是，移民现象的主要问题是个人的同化与不同化问题，这似乎是一个先验的问题。既然移民已不再是他所来自的那个社会的成员，既然他已生活在美国社会之中，既然他已通过经济契约及对其制度的依赖将自己同这个社会连在一起，那么，他唯一的发展道路是：逐渐地用美国人的文化价值观替代波兰人的文化价值观，用适合于他在美国所处环境的生活态度替代他从原属国家带来的生活态度。这一替换可能很慢或者很快，而且各种不同因素——以及种族群体之中存在的其他因

素——亦可能会影响替代的速度；移民(或移民的后代)要么被视为在传统和道德方面依旧是个波兰人，要么已然是个美国人，要么是正处于从波兰式向美国式转化的过程中，而他如何进行这一转化被认为是需要研究的本质问题。

但是，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是从波兰或美国民族利益的立脚点而是从一种客观的社会学调查的立脚点去看待美国波兰人，我们便会发现个体同化问题在当前完全是一个处于第二位的并不重要的问题。当然，有许多波兰人——有一些是第一代移民——更多的是第二代移民——已经作为个体被美国社会所吸纳，现已或多或少地被完全同化；但是，对照在这个国家中的波兰人的总量，此类实例数量在过去五十年中已经急剧下降。在这段时间里，一直在进行的基本过程是在那些同波兰社会相分离的零散移民中，组建一个新的美国波兰人社会，并使之植入美国社会。的确，作为一个整体，这个美国波兰人社会正缓慢地从波兰式社会向美国式社会转化，如事实所展现的，其成员，特别是那些第二代移民，正在继续获得更多的美国人的心态，受到更多的美国文明的影响。但是与之发生在一百年前的捷克人社会的渐进式德国化过程相比，或同十八世纪波兰、沙皇俄国和德国贵族对法国文化的采纳过程相比，这种“同化”并不是一种个体现象而是一种群体现象。在美国，移民个人并不是孤立地站在一个与之文化相异的群体中，他是处于一个与他同质的群体中。这个群体与美国文明接触，其所有成员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也即我们调查的中心对象，是这个凝聚的群体是由起初并不凝聚的成份构成的，这个社会的建立在结构和主流心态方面既不是波兰式也不是美国式的，而是属于一种特殊的新型产品，这个产品的原材料部分取自波兰的传统，部分来自移民们所生活的新环境，还有一部分来自经过移民们的观

察与解释的美国社会价值观。构成这样一种社会环境的是这个美国波兰人社会，而不是美国社会，来自波兰的移民联合进入了这个社会，但他们自身又必须去适应这个社会的标准和制度。

这样一种演变从社会角度看显然不可避免。个体移民带给这个国家的是他旧有的传统心态，而决不是他原属国家的社会体制。他带有一种与来自相同社会背景的人相联合的趋向，而且一旦他们结成一个群体，旧有的制度便同时开始再现。然而，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它们在此地不可能将其本来的内容和含义全部复苏。首先，这种重建，是对原有社会价值的本能需求的后果，而不是要实现重建旧制度的清醒计划的后果，它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然而，尽管大多数移民是农民出身而且因此相当保守，但他们原有的心态在新的环境下必然随着时间一同改变，他们对旧有价值观的要求也会变得不那么迫切和明确。其次，移民们在此地组成的群体显然没有在欧洲时的社区那么有凝聚性；在一个历史一般不长（在一些实例中仅可溯及三代）的长驻居民核心周围有一个变动的人群，不断地从外来人员中得到补充，这些人或是住上一个不长的阶段之后离去或是准备随时动身，至少是要离开几年。此外，鉴于农民社区或小市镇社区多数能自给自足，其成员的大部分需求可以在群体内部得到满足，美国波兰人社区只在诸如经济给养等基本事务方面依靠外部世界，社区成员从美国的商店或工厂获得收入，消费的几乎皆为美国制品。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尽管有直接来自波兰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流入，尽管充斥他们头脑的对原属国家的回忆使他们对传统制度的兴趣不会完全消失，但是，他们在这里自发地发展起来的社会机制必定只能是旧有波兰原型的一个很不完善的仿制品。这种社会机制依然以家庭和初始社区（primary community）为中心，人与人直接团结的原则和顺从社会舆论的原则

依然受到承认;但是,在将这些制度变得如此内涵丰富和充满活力的那些彼此相异却又凝聚一致的信念和习俗中,多数不是被全部忘却就是毫无效能,甚至显得荒谬。而且,无论已经确立了何种新的信念和习惯性行为模式,新的社会条件在普遍性、数量性、稳固性和约束力方面,还是不足以完全取代已被湮没的传统。

公寓和工作

波兰人侨居地的出现和发展的过程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可以被观察入微。当一个波兰移民在一处尚没有波兰定居者的地区找到一份收入不错且有望长期稳定的工作时,他通常试图立即把他的朋友及亲属们从其他美国波兰人社区吸引过来。他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他已经习惯于这样的社会呼应和社会承认,因为只有一个带有旧的社会联系和相同态度的初始群体(primary group)才能够给予他这种呼应和承认。而且,无论他对美国的经济与政治条件多么适应,他都难以立即就被接纳为一个美国基本群体的成员(或被一个其他国家移民的初始群体所接纳),即使他会被接纳,他也会留恋他在自己的群体中已经习惯的那种坦率与温暖的社会关系。的确,有的时候他并不能成功地将其他人吸引过来。这时,如果他不为孤独所驱使而离开这个地方,他就会逐渐地被美国的社会环境所吸纳。然而,通常的情形是他很快就组成一个波兰工人的小型群体;他们的第一步行动便是搞起一个波兰人公寓,这一部分是出于经济原因,一部分是出于社会原因。经常是由他们中间某一位有一些钱、妻子亦在美国的成员采取主动,在他自己的情形似乎稳定下来之后便立即将妻子接过来,租上一大套公寓,让其他人作为房客或寄宿者也住进来。若某寄宿的单身房客娶了一个他所认识的波兰

姑娘，事先达成的理解是该房客婚后仍继续寄宿。鉴于这种安排，有人甚至会把妻子或未婚妻从欧洲接过来。然而，通常情况下，建立波兰公寓的主动性往往来自群体而不是个人；工人们都拿出一些钱用于租公寓和购置家具，并劝导他们中间那位有妻子或未婚妻的成员把她接来。这时，他们自己买自己的食品，那个女人只负责做饭和打扫照料房屋，对她提供这种服务的补偿是每个人缴一点费（每周一至二美元），另外，按照不成文的协议，她和她的孩子们一起分享寄宿者们多余的食物。

如果这个地区有一种持久的工业，这个小小的波兰人侨居地便会不断壮大，一部分人是应邀而来，另一部分人则是不邀自到。几乎每一个个体或小家庭一旦安顿下来便会从外部吸引新的成员，不论这个侨居地已有多大规模，只要经济景况宜人便会有人前来。在已有一个波兰人群体形成的情况下，其成员依然邀请他们的朋友和亲属前来的原因同样可以归结为他们对社会呼应和社会承认的渴望。只要这位波兰移民是孤立地处于在美国人或其他异族移民之中，他便会欢迎任何波兰人的到来。

家庭体系

新移民的流入往往一度成为[一个社区发展]的最重要因素。社区明确建立之后，婚姻和生育——起初相对不重要——便逐渐占据首要地位。

在这方面必须记住的是从传统家庭体系的观点来看，家庭群体倾向于成员多多益善，这一旧的观念同天主教会的看法极为吻合，根据这一观念，子女众多被认为是“上帝的恩赐”。当然通过移民过程，家庭体系失去了许多权利，但这个体系依然十分强大，至少在第一代移民中，足以抵御上述态度以任何方式迅速衰变，这是一种最古老、植根最深的家庭态度。我们要补充一

点，即个体移民除堕胎和节制性生活外，几乎不懂得其他任何节育的手段。堕胎被认为是羞于见人的事——可能是因为堕胎者多为未婚姑娘——而仅为控制家庭人口而节制性欲又被农民们视为是根本不值得去做的事。此外，这里的经济条件有利于大家庭的生成。因为，孩子们虽然不能像在波兰的农场上那样很早就能派上经济性的用场，但把他们抚育长大却没有任何实质性困难，因为一个移民的平均工资肯定足以养活一个大家庭，其规模，即使不是更大的话，也等同于他在原属国家时所习惯的规模。当孩子们长大之后，对他们的要求是他们至少能做到将他们的大部分收入交由家庭专管，并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家庭的团结稳固。因此，家庭在他们达到劳动年龄之前所支出的养育费用，均被视为一种来自家庭基金的投资，这种投资期望回报。而且，大家庭被认为是正当的，因为在这里第二代移民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很可能会高于第一代移民。而在移民的原属国家中，一个家庭若分成太多的小家，就往往意味着财产要被分割成很小的份额，致使子女们难以保持他们父辈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如果我们能意识到教区在这里的势力比在波兰大，而且教区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希望人口快速增长，那么，我们就不奇怪社会舆论依然维护旧有的"人口繁殖"标准，而且一个家庭群体的尊严随其子女数量的增长而增长。当然，在个体分解的情况下，所有这些因素都会不起作用。然而，一般而言，在使波兰移民至少能像原在国的农民一样多多生育方面，这些因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生殖问题作为一项爱国义务近来在波兰和在美国的侨居地都受到进一步强调。

互济公会

伴随新的侨居地的增长，同一性和凝聚力也在增强。起初，

波兰移民群体的地域分布自然地呈不同程度的分散状态，尤其在当地有若干处工厂和矿山的情况下，因为每一个工人都愿意住在他工作场所的近旁。除去个人之间的关系、婚姻群体中具体成员之间的友谊及种族团结的一般情感纽带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利益能把人们聚在一起。然而，每个群体中总会出现一些这样的个人——这些个体通常是那些对其他美国波兰人侨居地有所经历的人——他们的种族团结感，或许还加上些对扮演一种公众角色的渴望，就形成建立一个关系更为紧密的群体的动因。每当侨居地的成员达到一百人至三百人的规模时，一个“公会”便一定会建立起来。

通常建立这样一个公会的首要目的，是在紧急情况下（疾病、死亡及较为罕见的失业问题），成员之间能够相互帮助。因为在新的侨居地建立之初，无论成员之间的种族团结关系会是何等暧昧，在某个成员死亡的时候，这种关系都会自行表露出来。通常情况下，一次严重疾病，或是致人以残的事故，亦能激发成员之间的同情心和伸出援助之手的愿望。和上述家庭增殖问题的情形一样，在号召社区团结方面，在美国波兰人侨居地的环境中，有一些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及一定时间内抵消新的社会环境所带来的具有瓦解作用的影响。没有生产性资产而又被按周雇佣的工人在遇到灾祸的时候，其所受影响明显严重于按年雇佣的农工或庄园里的什役。然而在繁荣时期，他的赚钱能力增大，使他在别人需要的情况下更有可能也更加愿意提供帮助，因为对他来说，金钱已经不如他在原在国时那么有价值，特别是在他把自己的收入仅视为维持生计而不是实现财富增值的手段之后，金钱就更不那么具有价值。而且，构成一个美国波兰人侨居地的工人群体是孤立的，与所有更广阔的社会环境相分离。它不像在波兰的劳工群体那样，构成支配一定财富的较

大社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波兰的农村地区，富人的私人慈善捐助依然是紧急情况下获取帮助的宝贵来源，而在美国，由于上述现象，这种捐助必定是极为有限的。至于公众慈善捐助，就是在波兰，向慈善机构提出的求助也被视为是社会地位跌落的标志；在美国波兰移民的心目中，由于社会环境强加给他们的，或被认为是美国社会环境强加给他们的群体责任感，这种求助被视为一种莫大的耻辱。

在美国波兰人社区发展的早期阶段，相互帮助是随机的、就不同事例个别进行的，采取的手段是大家共同集资对遇到不幸的家庭给予帮助。自然，社区中比较稳定比较富裕的成员承受了较重的负担，他们渴望以一种规范的死亡与疾病保险互助体系取代这种不规范的志愿援助方式，为此他们很想建立一个能减少他们风险的协会。当然，建立这样一种互助调节机制的必要性已表明，原来的比较幼稚且缺乏深思熟虑的模式已被彻底更改。在原来的模式中，每一个个体都有权要求其他成员根据他们之间社会联系的紧密程度给予相应的帮助。事实上，大多数在旧体制下可能成为第一个提供援助的成员——近亲或旧邻——都不在这里；他们的功能应该说是，至少有一部分是，由一些如果在波兰绝对不会被要求参与干预的相对陌生者所替代了。在这些人看来，他们所必须付出的帮助不是一种天然的、不假思索就履行的义务，而是一种由于非常条件所导致的人为义务。这种态度逐渐传播开来，甚至传给那些在旧体制下往往属于乐于提供帮助的人，如朋友或近亲。对帮助别人的义务是不能完全予以否认的，因为遇到不幸的成员至少还是自己的同胞，但是，这种义务已同社会生活的实际基础没有任何联系。共同保险是针对这种困难产生的比较清醒的解决办法。一方面，旧式的社区团结的基本观念，因为群体责任感而被强化；另一方

面,个人不再情愿承担提供帮助的义务,因为这种求助与在波兰的性质已不再相同。共同保险是解决这两种基本态度之间冲突的最好方法。既然旧式的社区团结曾经是普遍存在于波兰农民当中的一种社会制度,而在所有的移民侨居地中又兴起了新的个人主义态度,那么,显然,共同保险机构作为旧制度和新态度相结合的结果,必定会在美国波兰人社会中到处可见。

教　区

在新侨居地中建起的波兰人公会远胜过一个共同保险机构。它不仅把侨居地内散居的成员定期地聚在一起,因此积极地促进了社会交往,而且还成了社区中的社会机关,是产生各种倡议的源泉,也是实施所有计划的工具。这或许是它最重要的功能。在一个农民村落中并不需要这样的机关,因为村庄地域分布集中,又有紧密的社会凝聚力,使个人直接动议和即时自发的群体合作成为可能。对原在国的乡村社区,即由若干村庄组成的奥考利卡而言,现有的公社机构,在某些问题上还包括教区,完全能够在实现诸如使社区获合法权利及能够实际引入传统制度等转变方面发挥影响。因此,波兰国内虽然也有与在美国的波兰人公会相当的合作性组织,虽然它们也能对其所处的初始社区施加强烈的影响,但却很少作为社区机关对整个社区提出规划并付诸实施。当然,涉及它们特别利益的方面例外,如建立公用合作商店和艺术表演设施等。相反,美国的波兰人社区,从社会组织和地域分布两方面都过于松散,以至离开一个机关就无法运转,而且,也没有以往能承担这一角色的政治或宗教中心,比起各项活动都能沿着传统体制下的既定渠道长期地、基本顺利进行的传统波兰社区,就更需要有组织的主动性。

因此,在新的美国波兰人侨居地中,公会通过组织舞会、野

餐等活动满足群体的娱乐兴趣，通过举办戏剧演出、邀请演讲者、订购期刊来满足群体的求知兴趣，通过从建立时间较长的波兰人侨居地邀请神父主持宗教仪式来满足群体的宗教兴趣。对新来者、来访者和旅行者来说，公会是一个信息中心；它把有关当地可以为波兰移民提供的各种机会的消息告诉新闻界。在同美国波兰人社会的各中心机构的往来关系中，它充当侨居地的代表，实际上，也同出于政治或社会目的而努力接近波兰社区的美国机构打交道。因此，所有为争取波兰基金和美国自由公债(American Liberty Loan)的游说活动都是由这些社团组织在小社区中进行的。小社区公会最重要的工作是最终建立一个教区，通过建立教区，公会确保了侨居地长久的社会凝聚力，为自己获得了极高的威望和保障，但同时也放弃了它独享的领导地位。

在对这一重要的美国波兰人机构进行研究的时候，我们还应注意不要过度地把它的重要意义归因于它的外在形式和官方目的。正如同互济公会决不仅是个共同保险公司一样，美国波兰人教区也决不仅是一个在牧师领导下一块儿做礼拜的宗教社团。教区在美国波兰人生活中拥有的独特权力甚至比在最保守的波兰农民社区中都要大得多，这一点不能用宗教兴趣占主导地位的事实来解释。这些兴趣，像其他所有传统的社会态度一样，随着移民现象而被削弱，尽管宗教兴趣的主导地位将是最后一个完全消逝。的确，教区就是一个旧式的初始社区，不过是经过重组和集中而已。就其总体而言，它既是范围较窄但凝聚力很强的村庄的替代物，又是范围较宽也很分散、轮廓不清的奥考利卡的替代物。在其机构设置方面，教区行使的功能，如果是在波兰，要分别由教区和公社来行使。它不像以前波兰社区那样对其成员的生活进行高效的控制，这首先是因为它基本上不能

完全控制特定的地域，而且也不能强制居住在这块地域之内的每一个人都归属于它；其次，它为社会所能提供的被认可的规则和行为模式数量较少；第三，其成员的态度在新的条件下进化得过于迅速；最后，作为更为广大的社会的一个部分，教区自己的强制性措施得不到来自社会的支持。但是，与在原在国里的教区或公社相比，它的行为要广泛复杂得多。

社区中心

若认为由美国社会机构所建立的社区中心以其现有形式便能够大致履行一个波兰教区的社会职能，那是错误的。这个中心是由外部强加的，而不是在人民自己的倡议和合作之下自由发展起来的，这一现实，再加上中心所带有的种族陌生性，足以阻碍它发生深刻的社会影响。中心的管理者们通常对他们所必须面对的人们的传统、态度乃至本族语言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因此在任何环境下都不会成为名副其实的社区领导人。这个机构以俱乐部的形式为基础，波兰农民对之完全陌生。它所致力开展的所有公共活动总是千篇一律的闲暇娱乐活动；虽然这些活动无疑符合于社会的真实需要，但这些活动自身并不足以把社会聚合在一起，而只应被视为一种有待建立在坚实的经济合作基础上的、理想中的上层建筑。美国社区中心对移民社区提供的任何实际帮助，都采用个案式的工作方法，这种方法直接地、分别地同个人或家庭打交道。虽然这种方法能给个体带来暂时的有效帮助，但不能对社区的社会进步作出贡献，也不能对社会组织的瓦解产生较强的预防作用。这两个目的，只能在合作的基础上，通过组织和鼓励社会性自助来实现。最后要谈的是，在同移民的关系中，美国的社会工作者们往往有意或无意地采取一种善意的、保护性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有时，他们还带

有专制主义的倾向，虽然这不常见。这种态度可以被刚从原在国到这里来的农民所接受，在那里他们在同更高的阶层打交道时已经熟悉了这种态度，但是，这种态度易于在那些已在这个国家居住较久的波兰农民中引起义愤，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种较高的种族意识和个人意识。这两种情形的最后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在同美国机构建立联系时，移民个体有一种受屈辱感，要自愿或不自愿地顺从，而在同他自己的波兰机构打交道时，不但其自我意识受到尊重，而且还可以期望并比较容易地得到对个人的承认。当然，他的神父的态度也很傲慢，但在农民的心目中，这种傲慢态度同他的神圣地位完全相称。

社区的发展

当教区组织起来之后，互助协会当然也就不再是社区的中心机构和唯一代表机构，因为领导权自然要转移到神父的手中。但是互助协会并没有完全放弃它的社会功能；它一方面同神父，另一方面同当时已接连出现的其他协会，共同享有对共同事物的倡导权和对社区的代表权。教区的建立开辟了社会活动的新领域，拓宽了兴趣范围，并提倡更多更好的社会合作。**社区发展的理想**，在社区机构出现之前并不清楚，在当地的互助协会承担领导角色的时期，这种理想只是一种模糊的时断时续的意识。现在，它已成为由整个群体明确表述并不懈追求的共同理想。以教区形式出现的永久性社区组织框架的存在，既带来了一种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组织框架的趋势，也带来了一种增加社区的成员数量、财富、凝聚力及社区活动的复杂程度的愿望。虽然个人主义的动机——依赖波兰人侨居地生存的人的经济原因，及履行公共职能者要求更广泛的社会承认的渴望——可以为有助于实现社区理想的个人活动提供额外的强烈刺激，但是，实现

理想的主要基础还是社会性的。同样，正是这种社区精神使移民把个人利益同群体利益在"我们"这一感觉中统一起来，也是这个原因使每个国家的人群都渴望扩大其规模。我们将会发现，这种使自己的群体扩张的渴望，在所有美国波兰人机构的发展中都在扮演主要角色。

神父不仅不限制这些当地协会的活动，反而非常赞同它们的发展，并坚定不移地利用它们作为实现所有教区发展目标的手段。而在波兰，乡村教区涉及教会事务方面获得社区合作的主要办法是向广大教区居民直接发出呼吁，或通过教区理事会，波兰城市的教区则以教友为主要渠道帮助举办宗教庆典或参拜仪式、修缮教堂、发展教堂音乐和歌曲以及组织慈善捐助活动等。在美国，有组织的群体合作体系是向两个方向延伸的。第一，除了由神父本人主要倡导和完全控制的、纯粹为了宗教目的的教友会之外，非宗教性的、不同程度地独立于神父控制的经济或文化团体，也被要求为教区的发展目标作出贡献。第二，这些目标不再局限于祭仪或捐助事项，而是包括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

教区学校

教堂一旦建成，甚至在其建成之前，教区学校就已组建起来了。通常教堂被设计为二层式建筑，底层包括教室和小型会议厅。有的时候是租借或购买私人房屋作为学校用房。两种安排均属临时性的，因为教区的发展迟早都会促使专门校舍的修建。许多教区——在芝加哥就有五个——其所办学校的在校生超过二千人。学校的教师主要是不同品级的修女，有时、特别是在较大的侨居地里，也由教士或不是信徒的人任教。波兰文和英文同时作为教学语言，在不同学校中所占比例不同。

至于教区学校和公立学校在教育质量上孰优孰劣的问题，

已经有许多讨论，我们不在此处进行研究。无论是好是坏，教区学校终归是移民群体的社会产物，它满足了群体的重大需求。教区学校的最根本意义，既不在于它们的宗教属性，也不在于它们使原在国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在年轻一代中得以保留，而在于它们作为移民侨居地社会团结的元素的功能，和使这些侨居地一代代地延续下去的功能。学校是移民之间的一种新的、具体的机构纽带。它的第一个效果是从地域的角度把移民聚在一起。人们认为，离学校近——孩子们每天必须去那里——比离教堂近更理想。此外，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同宗教兴趣一样，是全体成员的共同兴趣，学生家长们通过参加学校庆典和节日活动而形成一个集体。但是，比这种老一代人之间的团结更为重要的，是教区学校在老一代人和年轻一代人之间建立了纽带。而到公立学校上学的孩子们则变得同父母很疏远，如果这些孩子是移民，教区学校会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这种疏远，尽管事实上它的课程在许多方面同公立学校基本一样。这不仅是因为教区学校使孩子们熟悉他们父母的宗教、语言和民族历史，而且因为它反复教育孩子们要尊重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和他们自己的民族。除此之外，学校不仅是老一代成员之间的共同纽带，而且也被年轻一代视为他们自己的机构，因此，培育了他们对美国波兰人侨居地事务的兴趣。教区学校是移民社区自我保持和自我发展倾向的必然体现。

结　论

因此，各种地方协会所带有的波兰民族主义倾向并不具有政治含义而是具有种族含义。它们的目标是保留移民带到这个国家来的文化体系——语言、道德、风俗习惯和历史传统——以便维护波兰民族群体的种族团结。这与他们的政治信念没有关

系，也和把他们个人同其所处的美国社会环境连结起来的任何经济、社会和政治纽带无关。这些地方组织并不是要割断其成员们同他们所在的更广阔社会环境的联系，也不是要把他们的各种兴趣都局限在地域有限的波兰人侨居地之内。相反，它似乎对任何可使其成员参与美国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活动都予以社会承认，并且对他们在美国社会各领域中得到的任何承认都感到自豪。然而，它的前提是每个成员都应最珍爱、也最倚重他自己的波兰社区给予的承认，特别是他应该渴望得到来自波兰人的社会反响。在同美国人的关系中，成员本人决不允许同样地投入他和波兰人相处时所表现的热情和直接的社会感情。与美国人的关系被认为是完全非个人的、是机构性的（如果我们可以使用这一术语的话），而一切纯粹个人化的接触必须被局限在他自己的种族范围之内。这一区别可以被准确表述为，一个波兰移民唯一应当保持的初始群体层次的联系，应该是他的种族群体所提供的联系，而他同种族相异的社会成份之间的关系必须毫无例外地归入次级群体（secondary group）之列。这种心理状况，类似于一个家庭或老式乡村社区同现代更为复杂的社会组织形态进行接触时的心理状况；一个这种基本群体的成员在其群体之外可以随心所欲地活跃，可以成为不为其初始群体所知，而且也不包括其初始群体的众多经济、政治和文化关系中的一个链节，但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人，他始终要从本质上把自己视作这个初始群体而不是其他群体的成员，在群体之外，无论做什么，他都要做得像这个家庭或社区的一名成员，而不是个孤立的个人。同样，美国波兰人可以在美国的社会生活中承担他所愿意承担的任何角色，只要他是以一个波兰人的身份。唯一受到社会谴责的参与形式，是那些势将把他纳入美国人的初始群体、使他同他的波兰民族相分离的形式——即婚姻、个人友谊

及各种意味着直接个人化的团结的交往方式。

这种地方性群体对其成员的作用，在于加强种族团结，防止在不同种族背景下可能会发生的种族解体。这种协会以现成的方式向个体提供各种机会，满足他们对得到承认和响应的渴望。这个机构很小，小得足以使每个个体都彼此熟知，使每个个体能对别人的事情感兴趣，也能引发别人对他自己的事情的兴趣。这个机构又很大，大得足以使个体感觉到它对自己的承认与否是件很重要的事情。它很团结，致使它的意见统一而有分量，同时又很松散，不构成压力，亦不会引起任何激烈的反抗。

依照它的功能，它主要的内部活动是正式的聚会或社会娱乐活动，从纯粹客观效果而言，这些看起来要么是从属于别的目的的活动，要么是纯系出于偶然的活动。正式聚会的重要意义，并不完全表现在该群体所讨论和决定的事务上。至于其产生的心理影响，最重要的便是，基于大家聚在一起进行讨论这一事实，而在成员之间建立起来的现实而又直接的社会联系。

结 束 语

埃利·扎列茨基

借助上一代社会史学家的著作，我们可以通过重现移民们成长为工业无产阶级的场景，对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研究成果，加以补充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更正。首先需要理解的是家庭经济的意义——家庭成员把他们的资源聚在一起这样一个事实。这是当时波兰的现实，在那儿，典型的农业家庭都要拥有最低限度的土地，从这块土地上获得的收入，需要有从其他方面赚取的工资予以补充。既然农民人均占有的土地在减少，他们面临的危险便是家庭将会失去土地。非技术性劳动力在美国的工资比在波兰多出八倍，首批波兰移民，被称之为 za chelbem（"为了面包"之意），他们的目的是要帮助他们的家庭保住土地。[1]

百分之八十的波兰移民在不断扩展的大工业生产中充任非技术性劳动力，包括在钢铁厂、机械工厂、码头、食品加工厂、纺织厂和煤矿做工。最不稳定的工业劳动力是那些聚集在矿区、船舶或伐木营的劳动力，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单身汉。[2]在新兴的

---

① 维克多·格林：《波兰人》（Victor Greene, The Poles），见《哈佛美国种族百科全书》（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哈佛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798—799页。

② 克拉克·克尔和A.J.西格尔：《跨行业罢工的倾向：国际比较》（Clark Kerr and A. J. Siegel, The Interindustry Propensity to Strike—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载于《工业社会中的劳动与管理》（Labor and Management in Industrial Society），

工业企业中，波兰移民接触到少数当地出生、年龄较大的技术工人阶级——往往是英国、爱尔兰和德国人的后裔——他们有很强的自我意识。在十九世纪的工厂中，技术工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生产的过程。他们往往自己拥有工具，为自己的技艺而自豪，并有着强烈的个人权利意识。通过辛勤劳动、积蓄及家庭合作，他们一般都已成家，并成为社区中活跃和受尊敬的成员，能够在罢工一类的事件中[3]获得来自工人以外的支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波兰移民尚处于早期大工业生产的附庸地位，不能支配周围环境、人员及自己的劳动成果。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返回波兰，他们倾向于住寄宿公寓，雇佣一个看家人，并且尽可能多做工时以便多赚些钱。

一八八〇年至一九二〇年间，由于美国的基本工业结构已经形成，当地出生的人同外来移民之间的区分已经变得不太重要了。一八九二年，当位于霍姆斯特德的卡内基钢铁厂企图解散钢铁工会时，三千名不是工会会员的非技术工人(多为移民)站在工会一边。虽然霍姆斯特德的罢工最终失败，但煤矿、钢铁、肉类加工行业——这三个行业在一九三〇年以前便进行了组织行业工会的努力——的工会领导者们学会了移民们的语言(读和写)，尊重他们的习惯，并鼓励从移民内部选举领导人。在宾夕法尼亚的无烟煤矿区，当紧密结合的东欧人自治聚居点能

克拉克·克尔编(New York: Doubleday, 1964)。也可参见《工业革命中的工人》(Workers i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彼得·N. 斯特恩斯和丹尼尔·J. 瓦尔科维茨(Peter N. Stearns and Daniel J. Walkowitz)编(New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1974)。

③ 大卫·蒙哥马利：《美国的工人管理：关于工作、技术和劳工斗争的历史研究》(David Montgomery, Workers' Control in America: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Work, Technology and Labor Struggl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13—14页。

够动员公众舆论，并能对罢工者实行纪律约束时，工会化便得以成功。[④]在匹茨堡的琼斯洛夫林钢铁厂里，波兰人多在锻造厂，德国人多在木工厂，塞尔维亚人多在初轧厂，但是每一个群体都同当地工人具有相同的工人阶级价值观。大卫·蒙哥马利是这样说的："农民移民们那种在有权威人士在场便猛干一阵，他一走开便开始磨蹭的冲动心理（在钢铁厂这一倾向很强），在煤矿或汽车厂里很快就转变成技术工人们拒绝在老板的监督之下工作的伦理观念。"[⑤]

渐渐地，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波兰移民结束了在美国的暂住状态。因为妇女开始从波兰向外迁移。美国波兰工人的家庭和社区生活在美国发展起来。在芝加哥的帕金镇（Packingtown），

---

④ 彼得·罗伯特评论道："当他们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的行动就变得一致了，而这很少被意识到。"《无烟煤行业》（Anthracite Coal Industry, New York: Macmillan, 1901），第172页。

⑤ 蒙哥马利的《工人的管理》一书，第42—43页。见大卫·蒙哥马利的《劳动场所的减少》（David Montgomery, 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Labo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约翰·波德纳：《工人们的世界：工业社会中的亲属、社区和抗议，1900—1904》（John Bodnar, Workers' World: Kinship, Community, and Protest in Industrial Society, 1900—1904,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波德纳：《移民和现代化：斯洛伐克的农民在工业化的美国的个案》（Bodnar, The Case of Slavic Peasants in Industrial America），载于《社会历史》（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第10期（1976年秋季），第44—67页；波德纳、米切尔·韦伯尔和罗杰·西蒙：《迁移、亲属和城市适应：匹茨堡的黑人和波兰人，1900—1930》（Bodnar, Michael Weber and Roger Simon, Migration, Kinship, and Urban Adjustment: Blacks and Poles in Pittsburgh, 1900—1930），载于《美国历史》（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第66期，第548—565页；塔玛拉·哈里温：《新罕布什尔和曼彻斯特的劳工们，1912—1922》（Tamara Hareven, The Laborers of Manchester, New Hampshire, 1912—1922），载于《劳工史》（Labor History）第16期（1975年），第249—265页；波德纳、罗杰·西蒙和米切尔·韦伯尔：《他们自己的生活：匹茨堡的黑人、意大利人和波兰人，1900—1960》（Bodnar, Roger Simon, and Micheal P. Weber, Lives of Their Own: Blacks, Italians and Poles in Pittsburgh, 1900—1960,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2）。

每一个街区都居住有不同的民族群体。一九〇四年，整个社区都支持联合肉类加工行业工会掀起的争取非技术性工人最低工资限额的运动。这次运动之后，家庭购买力上升了，犯罪率下降了，被遣送回国的人也减少了。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开始在街上（人们到街上去是为了暂离拥挤不堪的合租住房），在临时工介绍所和酒吧中相互接触。当时的酒吧是各民族举办婚礼、舞会、兄弟联谊会乃至政治性集会的中心。一九一八年的工会运动得到每一个社区的支持。在取得暂时胜利之后，街区公园中的长椅被命名为"八小时长椅"，因为男人们第一次有时间能同他们的家庭在一起。[6]

置身于美国工人阶级当中，波兰农民的家庭经济也得以重建。"['工作']一词在一八九四年便成了我知道的词汇"，在聚居区做房屋清洁工的玛丽·麦克道威尔于一九二八年写道，"而且从那时起它几乎成了一个神圣的词汇……这是移民们学会的第一个词，孩子们发音不清地说它，老人们临终前念着它：……'请给我一份工作！'"[7] 其原因是很清楚的。一八七七年至一九一〇年间，美国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是每周十至十一美元，而维持一个家庭的最低收入要每周十五美元，这还不包括婚嫁、事故、丧葬的费用，当时还没有政府社会保险。[8]

结果，移民们转向了能够把男人和女人的就业结合在一起

---

⑥ 参见詹姆斯·R.巴雷特：《残酷竞争中的工作和社区：芝加哥屠宰厂中的工人，1894—1922》（James R. Barrett, Work and Community in the Jungle: Chicago's Packinghouse Workers, 1894—1922, Urban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⑦ 霍华德·威尔逊：《我的邻居：玛丽·麦克道威尔》（Howard Wilson, Mary MacDowell, Neighb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8），第69—70页。

⑧ 巴雷特：《残酷竞争中的工作和社区》；安德鲁·格拉齐奥西：《普通劳动者，非熟练工人，1850—1915》（Andrea Graziosi, Common Laborers, Unskilled Workers, 1850—1915），《劳工史》第22期（1981年秋季），第518页。

的区域(如:煤矿和纺织厂),并为女人们寻找可以在家里完成的工作:缝衣服边,组装情人节礼物,用碎料缝制地毯,包裹棒球,烫衣,捆扎内衣,在家里为别人洗衣服,特别是接待寄宿者等。[9]上述种种考虑决定着孩子们在什么年龄就要进工厂做工,以及他们应该从收入中拿出多少交给家里。把工资收入汇集使用的需要,助长了波兰移民当中获取房屋拥有权的倾向,房主们把最好的房间出租给别人居住,把最次的(经常是楼顶间)留给自己使用。拥有房屋为寄宿提供了方便,也为防止非技术性工人过早衰老提供了帮助。当寄宿者的流入被第一次世界大战阻断之后,已婚的妇女们便只好去工厂里找工作。一九一八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这些妇女多数带有孩子,每晚睡不上几个小时,在有衣服洗的日子里根本就睡不成。一九一八年大罢工期间,塞缪·阿尔斯舒莱尔法官访问过一个波兰工人的家庭,他发现当仅有六岁的孩子便开始照看婴儿。卷心菜和发了霉的面包是唯一的食物,窗户上还贴有政府的宣传画,告诫人们"不要浪费食物"[10]。

《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出版期间——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也正是二十世纪初期大规模群众运动失利的时期。这时,在外来种族中诞生了一个笃信"美国价值观"的中产阶级。国旗制定日游行,购买公债运动,用移民们本族语言写就的反布尔什维克的美国式传单,同"购买波兰"运动混合在一起。然而,

⑨ 卡洛林·戈拉布:《工业化经历对移民家庭的影响:对聚集人群的再思考》(Caroline Golab, The Impact of the Industrial Experience on the Immigrant Family: The Huddled Masses Reconsidered),载于《工业化美国的移民,1850—1920》(Immigrants in Industrial America, 1850—1920),理查德·L.埃尔利希编(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7),第9—10页,第19—25页。

⑩ 巴雷特:《残酷竞争中的工作和社区》。

多数波兰人依然属于工业工人阶级。在二十年代，一种保守的、以家庭和社区为中心的工人阶级文化发展起来。一位史学家写到："许多孩子把他们的移民父亲首先看成一个勤劳的工人。"如果要描绘父亲在儿子心目中的形象，那么不可避免地要包括体力劳动这一生活侧面。的确，父亲们是"永恒的榜样"。一个美国波兰人这样描绘他的父母：他们信奉的只有"工作，工作，工作，还是工作"……他们不知疲倦，总是担心失去工作。因为他们无处投奔。[①] 另一方面，一九三〇年之后波兰方面发生战事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政治气氛和政府变更的情况下，已经非常明显。美国波兰人社区后来的大部分历史要取决于同其他民族群体的关系，特别是同美国黑人的关系，以及同妇女解放的关系。这些问题，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几乎没有触及到，目前正由社会史学家们进行研究。

---

① 波德纳：《移民和现代化》，第 56—57 页；波德纳、韦伯尔和西蒙：《移民、亲属和城市适应》。关于第二代美国波兰家庭真实的全面的描述，参阅阿诺德·格林德《个人崇拜和性关系》(Arnold Greend, Cult of Personality and Sexual Relations)，载于《精神病学》(Psychiatry)第 4 期(1941)；以及《中产阶级的男孩和神经病》(The Middle Class Male Child and Neurosis)，载于《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第 2 期(1946 年 2 月)，第 2 页。